中国青铜文化

张颖 / 主编

时代出版社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中国青铜文化》前言（1）
- 《中国青铜文化》前言（2）
- 《中国青铜文化》前言（3）
- 《中国青铜文化》前言（4）
- 第一章 中国青铜器概况与青铜时代（1）
- 第一章 中国青铜器概况与青铜时代（2）
- 第一章 中国青铜器概况与青铜时代（3）
- 第一章 中国青铜器概况与青铜时代（4）
- 第一章 中国青铜器概况与青铜时代（5）
- 第二章 青铜器的分类与功能（1）
- 第二章 青铜器的分类与功能（2）
- 第二章 青铜器的分类与功能（3）
- 第二章 青铜器的分类与功能（4）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1）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2）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3）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4）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5）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6）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7）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8）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9）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10）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11）
-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12）
-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1）
-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2）
-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3）
-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4）
-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5）

-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6）
-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7）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2）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3）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4）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5）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6）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7）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8）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9）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0）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1）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2）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3）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4）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5）
-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6）
- 第一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1）
- 第一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2）
- 第一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3）
- 第二章 夏代青铜器的发展（1）
- 第二章 夏代青铜器的发展（2）
-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1）
-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2）
-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3）
-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4）
-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5）
-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6）
-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1）
-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2）
-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3）
-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4）
-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5）
-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6）
-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7）

- 第五章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发展（1）
- 第五章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发展（2）
- 第五章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发展（3）
- 第五章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发展（4）
- 第五章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发展（5）
- 第六章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1）
- 第六章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2）
- 第六章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3）
- 第六章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4）
- 第六章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5）
- 第七章 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发展（1）
- 第七章 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发展（2）
- 第七章 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发展（3）
- 第七章 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发展（4）
-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1）
-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2）
-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3）
-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4）
-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5）
-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6）
-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7）
-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8）
-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9）
- 第九章 华夏族以外地区的青铜器（1）
- 第九章 华夏族以外地区的青铜器（2）
- 第九章 华夏族以外地区的青铜器（3）
- 第九章 华夏族以外地区的青铜器（4）
- 第九章 华夏族以外地区的青铜器（5）

《中国青铜文化》前言（1）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我们不难发现，每一项重大发明与创新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程。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有了发明和创新才得以发展壮大的？就我国而言，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历经夏商周三代、秦汉隋唐，直至宋元明清，这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历史行程中都有发明与创新贯穿始终。在历史上，文字、铜器和城市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彻底摆脱了原始生活，人类社会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中，青铜器作为人类最早发明的金属器，是人类学家公认的三大文明起源之一，与文字、城市并肩齐名。如果说文字的出现代表着人类智力发达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城市的兴起意味着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那么青铜器的发明则象征着人类技术创新的一次巨大飞跃，预示着中国古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的巅峰。古往今来，中国青铜以其无比灿烂辉煌的文化之光，在世界铜器之林独树一帜，让西方文明不断投以羡慕的目光。

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当世界上的许多民族还处于野蛮时代时，我国就已昂首跨入了殷商的青铜文明之门。不但如此，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历史之长，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仅就青铜容器来说，其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后经过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而不断发展繁荣。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中国，带动某个时代经济革命的动因往往是对生产用具的改革，青铜器当然也起到这种作用。那时，青铜质生产工具的出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业收获，还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对农林家而言，坚固了他们所使用的刀、犁、铲；对渔猎家而言，尖锐了他们所使用的矛、箭等。依靠它，先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并逐步趋于安定，社会秩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并由此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青

铜时代的两大主角——商、周两代，发展成为当时最强盛的王国。史学家王贵民在一篇题为《商文明在古代世界的位置》中提到：商代和同一时期的几个世界文明区域其实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只是互有高低、各有特点。但商文明与其他文明相比具有几个显著的优越之处：首先是青铜文化创造出全国统一性和地方特殊性相结合的整体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所拥有的辽阔疆域，在古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体现了青铜文化的多样化。其次，商文明持续了500多年，其历史长久、发展稳定也是举世仅见的。最后，不管是青铜铭文，还是与其有很大关联的甲骨文，都说明了古文字的进步性及其使用时间之长和空间之广，这是商文明的又一优异之点。

《中国青铜文化》前言（2）

毋庸置疑，青铜器自产生之时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时代内涵，更承载着灿烂的中国青铜文化。这既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在我国众多物质文化中，尽管不乏玉器、瓷器、书画、丝绸、家具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载体，但它们都无法与自成谱系的青铜器相比。

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青铜礼器占有很大的比例，其担任着绝无仅有的角色。作为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器具，青铜礼器在每一个奴隶制王朝都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待奴隶主死后则与其同葬于墓中。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是鼎之类的重器多被人们看作是社稷的象征、权威的体现。古书就记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鼎在当时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它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已转换了角色，成为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特别是西周时期，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青铜礼器已非一般的实用器，不适于在生活中使用，其形象已被先民们制度化、神秘化和权力化。各级奴隶主贵族把他们的信条与期望都铸刻在青铜礼器上，以此来反映他们的思想观念。由此看来，我国古代的青铜器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这恰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

中国青铜器如此奇妙，那么它究竟有多少呢？没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原因就在于它的数量太庞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单就陕西一省而言，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先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就达3000余件。在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县出土的微氏家族铜器群中，一个窖就藏有103件精美的青铜制品。而且，像这样成百件青铜器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并不鲜见。据统计，从汉代至今出土的青

铜器中，仅有铭文的就在一万件以上。实际上，有铭文的青铜器仅是少数，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传世的青铜器，这个数字更是无法估量。

《中国青铜文化》前言（3）

然而，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还在于它的品质。其不但种类繁多、形制瑰丽，而且花纹繁缛、制作精湛。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可以分为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单从酒器类来说，就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等20多个器种，而且每一个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风采，甚至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样式也多姿多彩，犹如百花齐放，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认为：我国“形状奇伟、花纹瑰丽”的商朝青铜器，是“上古文明世界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在商末周初，中国青铜器制造处于顶峰阶段，其器以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虎食人卣就是其中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以虎的两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作虎踞坐形；虎的前爪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给人一种威胁的紧迫气势，造型相当逼真生动。其提梁至三个支点间布满了花纹，铸造精致，给人以美的享受。但这些优点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难度，而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情趣，进而使得青铜器更具吸引力了。

青铜器的艺术魅力除了表现在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上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中国古代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青铜器一个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古代中国，统治阶级在青铜器形制与纹饰仍无法完全表达自己想法以及期盼时，便想到了将其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为数众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从最初开始的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至商代晚期逐渐增多，但最长也超不过50字。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不仅数量多，还有不少长篇巨制，如著名

的毛公鼎铭文达499字，是我国青铜铭文中最长的。春秋以后的铭文慢慢呈现衰弱的趋势。到了战国时期，铭文往往是“物勒工名”，长篇铭文极为罕见。总之，青铜器上的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

归根到底，这些精美的青铜器还是与高超的铸造技术分不开的。外国铸造青铜器多用失蜡法，特别是印度用此法做出很多细巧的东西。失蜡法的范可以用几次，由此可生产出一批形状花纹完全一样的青铜制品来。中国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有着自己的特殊传统，除铜镜常用失蜡法外，其余大都用合范法。合范法的特点是一范只做一件，所以在青铜礼器中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青铜礼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在许多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中屡见不鲜。这种铸造技术无疑增加了中国青铜礼器的艺术观赏价值，拓宽了艺术欣赏的视野，使其精品迭出，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青铜文化》前言（4）

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就是中国高超铸造技术的物证。四羊方尊是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 3厘米，重34 5公斤，全器通体以细雷纹为地，线条光洁刚劲。尊的颈部铸有体部为夔形纹、底部饰有兽面纹的蕉叶；肩部有四条龙蟠缠在四周；腹部分别铸有四只大角羊，卷曲地突出于尊外；羊的背部和胸部饰有鱼鳞花纹，连铸在一起的两只前腿和尊的底部上也都铸满夔形花纹。为了遮蔽合范时可能产生对合不正的纹饰，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间合范的地方都铸有棱脊，使得造型在气势上增强了不少，整体形象在宁静中透出威严感。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如果没有高超的合范技术，整个器物浑然一体的效果是很难达到的。

由于青铜铸造技术的不断成熟，青铜器在我国分布的地域广泛，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了青铜器或青铜遗址。其中，中原地区是中国青铜器的集中地，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比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有些地区的青铜器体现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艺术风格，如分布在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属于“鄂尔多斯文化”的青铜器就是其中一种。除了以羊首、马首、鹿首之类的动物头像作为装饰器物外，还有别具一格带有异域风格的短剑、短刀和饰牌等，体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多样性。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中国的青铜文化，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经典文化，我们特别编撰了这套经典文化丛书，以飨读者。本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丰富的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以及大量有关中国青铜器的研究资料，对中国古代青铜器做了全景式介绍，展现了我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优良品质。全书以古代青铜器的艺术风格为线索，将青铜器置身于它们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从青铜的文化历史、器型纹饰、鉴赏收藏三个大方面介绍了我国各个

历史时期青铜文化的发展、艺术魅力、种类和艺术价值，收集了从夏、商、周时期至清代晚期的相关青铜器精品图，以求读者更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接受我国的青铜文化。

由于本书编写时间仓促，加上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朋友和专家批评指正。

编者

2008年9月

第一章 中国青铜器概况与青铜时代（1）

第一篇 青铜器与中国文化

青铜器在我国历史悠久，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国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了青铜器时代，气势雄伟的司母戊鼎、精美绝伦的四羊方尊就是那个时代伟大的杰作。此外，我国青铜器上有许多花纹与铭文，而铭文作为了解青铜器和远古人类生活的一把钥匙，是我国独有的。虽然世界各文明古国都经历过青铜时代，但是只有中国赋予了青铜器以重大的社会意义、深厚的精神内涵，以及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使之成为杰出的艺术典范。

第一章 中国青铜器概况与青铜时代

第一节中国青铜器概况

中国有着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史，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中国出土了大宗形态各异的青铜礼器，它们在当时社会精神文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国青铜器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密切相关。礼器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古代贵族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是贵族的专利，它作为维护奴隶社会宗法礼制的工具被当时的统治者神圣化了，这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青铜文化的显著特点。

青铜器的铭文是考古人士关注的另一个热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铭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是中国文物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世界人类文

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的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与周围地区存在接触，如曾与北方蒙古大草原和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进行过交流，晚期与东南亚青铜文化有过密切联系。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经历了约1600年，大体上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时间相当。中国青铜器源远流长，以夏、商、周三代的为代表，其种类丰富、数量较大、分布地区广，另外青铜器造型雄伟、文饰精美、铸造精良，如勾践剑、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司母戊方鼎、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等。此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握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第一章 中国青铜器概况与青铜时代（2）

中国青铜器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堪称空前绝后，佳妙至极，所以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历代收藏家更是把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代相传。对于我国而言，早期文明中的青铜文明意义重大，对后期华夏文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中国青铜器的出现

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精华，自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因此，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中国青铜器的发明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在我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的生产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到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是最主要的文化因素。追根溯源，青铜器的出现有着历史必然性。

通俗地讲青铜器主要是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制作的器物，包括工具、用具、礼器、兵器、饰物等。考古学上的青铜器则特指先秦时期质地以铜为主，加入少量锡、铅浇铸而成，表面呈青绿色或青灰色的器物。

大自然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物质宝库。一直以来，自然界就存在大量铜矿石。孔雀石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颜色呈翠绿色，因上面有像孔雀尾羽的花纹而得名孔雀石。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非常喜爱这种矿石，把它采集来制成项链等装饰品。在以后的使用中，人们又在无意中发现孔雀石如果掉在炭火中经高温燃烧会熔化成铜液，且冷却凝固时还可随意成形。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不知重复发生了多少次，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终于，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发现并掌握了用孔雀石加木炭来冶炼并铸造红铜的技术。从此，红铜器普及开来，人类最早的铜器由此产生了。所以，这个时代又被称为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用红铜制成的铜器，是在土耳其南部发现的、制作于公元前七八千年

的铜针和铜锥。而且据考古资料证明，埃及也在公元前3500—前3100年的格尔塞文化时期有了冶铸的红铜刀、匕首、斧和锛等。中国最早出土的铜器则是在山西襄汾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被发掘的、约公元前2085年冶铸的红铜铃。

第一章 中国青铜器概况与青铜时代（3）

那么红铜与青铜有什么不一样呢？一般来讲，红铜硬度低，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后来，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又发现了锡矿石，并学会了用它加木炭冶炼出锡。在此基础上，人们又进一步发明了用红铜加锡熔炼成青铜合金的技术，并认识到青铜比红铜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青铜是红铜和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化学性能稳定的特点。例如：铜与铅的合金为铅青铜，铜与锡的合金为锡青铜，其他还有铅锡青铜、镍青铜、磷青铜等等。青铜的优越性首先体现在硬度大上。红铜的硬度为布氏硬度计的35度。如果在它里面加锡5％，其硬度就提高为68度；加锡10％，即提高为88度。而且经锤锻后，它的硬度还可进一步提高。例如：加锡20％的青铜，经锻锤后硬度可增至228度。其次，青铜溶液具有很好的流动性，凝固时铸造收缩率也很小。因此，青铜能够铸造出刃部锋利、轮廓分明、花纹纤细的器物。第三，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可以长期使用与保存。第四，青铜合金的熔点较低，青铜器损坏以后还可以回炉重新铸造。

由于青铜具有以上优点，所以适合于制作生产工具、武器以及生活用器。因此，古代人在发明了青铜冶铸术以后，就开始广泛地使用青铜来制作各种生产工具、武器以及生活用器等，使人类社会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首先，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给农业及其他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锐利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和手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以致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都有了提高；第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生产关系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进步，政治、军事、文化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面貌大为改观。可以说，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即从石器时代飞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

二、中国青铜器的特点

我国古代青铜器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源远流长。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青铜器，是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一处房屋遗址中出土的约为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小刀和一些铜器残片，其属于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在较晚一些的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北、辽宁、内蒙古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也普遍发现了青铜制造的工具、兵器、装饰品等。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知，虽然中国的原始文化发展不平衡，各地区有着很大区别，但不少地区的先民还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熟知了铜的特性，初步掌握了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并表现出相应的装饰技巧。

第一章 中国青铜器概况与青铜时代（4）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二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它不仅显示出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而且体现出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风格，并以雄伟的造型、精湛的铸造工艺、古朴的纹饰和丰富多彩的铭文著称于世，堪称中国文化宝库的艺术瑰宝，更是世界艺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从制作工艺上来说，中国的古代青铜器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首先，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合范法，在中国古代就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也非常成熟。而随后发展出来的不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更是显示出我国青铜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另外，在很早的时候，青铜器上还出现了为增加美观度而镶嵌的装饰。至于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是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等，经鉴定铁刃均为陨铁所铸成；第四种是红铜，即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第五是用金、银来做镶嵌，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青铜器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铭文（也就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中国青铜器所独有的。我国的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有1—2个字，到商代晚期逐渐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个字。西周时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进入大发展时期，但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做法开始逐渐减少，至战国已经罕见长篇铭文。我国青铜铭文的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同时也是我们研究青铜器的历史，及为其断代与鉴别的重要依据。

三、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发展轨迹，青铜器也不例外。总的来说，我国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高峰→转折停滞→再出现高

峰→衰退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可细分为萌芽期、育成期、高峰期、转变期、更新期五个时期，存在于大约在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

夏代时，青铜制品数量不断增多，尤其是形制复杂的青铜容器，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青铜礼器组合，反映出夏王朝的国家制度已经成熟。商代早期，青铜文化全面繁荣，青铜铸造工艺相当成熟，青铜器类别及数量不断增多，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器在商王朝统治阶层的生活中被广泛使用，并随着商王朝势力的扩张而出现在其周边及更远的地区，致使周边青铜文化与商代青铜文化交互影响、不断发展。到了商代晚期，中国青铜文化进入鼎盛阶段，出现了精美的青铜礼器、武器和工具等。商代之后的西周，继承了商代青铜文化的繁盛，创造出发达的西周礼乐文明。到了春秋晚期，铁器得到一定的发展，它开启了中国冶金史的大门，却没有立即导致青铜工业的衰退；相反，由于战国时代生产技术的普遍提高，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大约到了战国晚期，高水平的青铜铸造业因冶铁工业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社会形势的逐渐稳定，最终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但人们所偏爱的青铜器并没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某些特定产品领域，如铜镜、铜币等，它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章 中国青铜器概况与青铜时代（5）

第二节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

青铜时代是人类使用以青铜为制作材料生产工具、武器和生活用器等器物的时代，虽然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为1975年于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刀，其时间约为公元前3000年，但是普遍认为公元前约2000年时的夏代之前铜器冶铸技术较原始，规模也很小，铜器数量少而且多为红铜器，同时石器还在大量使用，所以我国当时还没有进入青铜时代，只是处于铜石并用时期，也可以说是我国青铜时代或青铜文化的萌芽时期。我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终止于公元前5世纪，大体上相当于文献上记载的夏、商、周到春秋时期，前后共经历了1600年左右。

前面讲了红铜的发现和使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其实青铜器的出现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国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前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技术和经验积累过程。在西安半坡和临潼清退寨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成分不纯的黄铜片，但考古学界却对其年代和真实度有过不小争议。无独有偶，山东胶县三里河距今约4000年的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两件铜锥，据分析其成分为铜锌合金，并且探明这一地区存在铜锌矿或铜锌铅共生矿，先人们用一种简单易行的特殊方法即能冶炼出黄铜。从不经意的黄铜冶炼到提取较高纯度的红铜，再到有需求的青铜生产，古人对青铜性质的认识，从偶然到必然，从懵懂到熟识应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商代·司母辛鼎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初期。在这一阶段，器物以青铜、红铜、黄铜为铸料，同时存在热铸和冷铸两种冶铸方法。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早在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我国就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如夏“铸九鼎”的传说在《汉书·郊祀志》中有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洲。皆尝亨上帝鬼神。”新中国建

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据文献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所在地——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公元前1900年（夏代初期）的青铜容器残片，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资料的真实性。这里所发现的青铜容器残片高5厘米，宽5 5厘米，厚0 11—0 15厘米，重35克，表面有绿色及黑褐色锈，呈弧状，下部有弯折，可能是铜鬶的腹底部残片。经过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研究室进行金相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分析证明：这是一种含锡7%的青铜制品。并且，在河南临汝煤山夏初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已使用多次的熔铜坩埚残片，这就说明我国青铜器的铸造在夏时已不偶然。尤其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相当于夏代晚期及商代初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青铜鼎、爵、斝等多件器具以及青铜冶铸作坊遗址，这种作坊生产的形式说明当时青铜器的生产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以上这些考古发现均有力地说明：我国在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

中国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在商周时期达到顶峰，就连一向严谨不苟的青铜器专家们都忍不住频频用“鼎盛”、“繁荣”等来描绘那个“唯铜是崇”的时代。美籍华人、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曾自豪地、高度概括性地给那个时代冠以令人振聋发聩的名称——中国青铜器时代。

第二章 青铜器的分类与功能（1）

第一节 古代青铜器分类及命名

青铜器已经是从质地和审美观点上划分出来的一类器皿，本身没有从质地上再进一步细化的必要，因此我们现在研究青铜器的分类主要是为了清楚区别它的性质和作用。商代晚期·司母康方鼎

一般来讲，青铜器的主要类别有工具类、武器类、食器类、酒器类、水器类、乐器类以及装饰类等。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涵盖全部青铜器品种，如居家使用的灯、炉、车马器等，商品交易中所使用的铸币以及铜版地图、象棋、铜碑等。

这样以源自器物实际用途的分类系统，既要充分考虑到由于时代性和阶段性而导致的青铜器在功能、数量、使用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又要顾及各类青铜器身上所映照的社会背景。

在对青铜器的各种繁杂的分类中，器物的命名是一个关键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名从主人”是青铜器研究中约定俗成的原则，即器物名称的确定要依照器物原称，也就是从器物铭文本身来考虑。宋代的王黼在《宣和博古图》中所定的青铜器名称，实际上许多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如鼎、簋、钟、壶、盘、甗等名称都是如此，一直为现代人沿用。但青铜器中没有铭文的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处理该种情况时，常常采用类比的方法将器物归类到已经定名的器物种类里，如果没有同类器物可以参照归并分类，便暂定一个名称。暂定名的确定通常是根据器物形态特点以及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器物类似之处，借名称之。如“舟”，原器上并没有舟名，但由于它的形状像一叶小舟，故称舟。后来又发现了形状类似并带铭文的器物，铭文中称其为“”，所以考古学家舍弃“舟”，而改之为“”了。这样的问题还远远没有下面的复杂。有些青铜器的用途历时不变，其名称却随着时代更迭而不断变更。如方形壶，战国自铭为“壶”，汉代就改称“钫”或“枋”了。再比如青铜的灯具，战国时无自铭，汉代开始自铭“锭”或“镫”，

到南北朝以后一般诗文则写成了现代人通用的名称“灯”。还有些两周时代的短剑，秦时就直接以匕首相称。有些器物虽然用途不同，名字却一样。举个例子，周代青铜乐器有的称为“钟”的，而汉代的青铜制圆形壶也称为“钟”。诸如此类的青铜器名称问题，都需要在分类时加以认真考虑。对想要学好青铜器鉴定的人士而言，较好地掌握一些青铜器分类和命名原则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二节古代青铜器的功能

目前比较通行的青铜器分类方法是按照青铜器的不同用途，把青铜器物划分为工具类、武器类、饪食器类、酒器类、水器类、乐器类、杂器类等。但这样的分类很明显地存在不少误区和盲点，有辩证和补缺的必要。

第二章 青铜器的分类与功能（2）

首先来介绍一下工具类青铜器。“工具”概念本身范畴很大，但在中国青铜器中却又算不上是一个很大的门类。原因是我们的先人们不舍得浪费过多的贵重稀有的铜用来铸造工具，考古所发现的数量自然而然也就多不到哪里去。过去，很多考古研究即使提到青铜工具，也主要是指商周时代直接用于生产的农业工具，如砍伐工具中的斧、斤，翻耕工具中的耒、

商代后期·父乙铜簋

耜，锄草工具中的铲、锄，收割工具中的镰等，其他工具则极少言及，商周以后的工具更是被忽略到了几乎不计的地步。其实仅就商周时代的工具来看，除了上述一些用于农业的以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工具用于手工业。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陕西省凤翔县战国秦墓的一个车马随葬坑，坑内出土了一整套备以修车用的工具，如铜钳、斧、凿、锛等，另外还有铸铜时刻画范模的刻刀、切割时使用的锯、称量用的度量衡等，以上这些都是当时各种生产和生活中无法替代的工具。汉代以后，虽然工具多转为铁质器，铜质工具逐渐减少，但仍有一些铜制工具被人们使用或收藏，如常见的有钻、锥、钉、镊、针、鱼钩、顶针、耳勺、锉、取火用的阳燧、文房用的铜砚滴和书刀、碾药用的铜杵臼、熨斗、柄刷等。有些工具还有着向机械化或大型化方向发展的态势，如计时用具漏壶、天文仪器、圭表、地震仪等。

春秋中期·人形定敦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兵器类青铜器。兵器是自进入商周以后历代都不可缺少的重要装备。先秦时代，青铜质兵器是仅次于容器类的礼器青铜器的主要铸造对象之一。人们过去一直认为兵器是作战武器的认知传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兵器还在不少场合使用，如祭祀礼仪、日常生活和捕获野兽等。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青铜质武器中主要以冷兵器为主，包括勾杀用的戈、戟、殳，刺杀用的矛、剑，砍

杀用的钺、刀，射杀用的弓弩和箭镞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兵器中，箭镞明显地属于一种消耗性的武器，基本上是放出去没有收回来的可能。所以，一场战争所消耗的箭镞多少是和战争国双方的财力有着密切关系的。在先秦时代，铜是贵重金属，只有拥有大量财富的国家才能维持战争的胜利。与以上攻杀性冷兵器相配套的还有防御性兵器，如胄、甲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个类项——容器类器皿，中国秦汉时代以前的最高工艺设计能力和技术发展水平，都在它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容器类器皿包括：鼎、鬲、甗、甑、釜、锅、鋬等烹饪器；簋、、簠、豆、敦、盂、碗、钵等盛食器；爵、尊、觚、觥、瓿、蚕、觯、角、壶、罍、卣、彝、盉、耳杯等酒器；鉴、洗、盆、盘、匜、缶、瓶、缸等水器；禁、俎案、匙匕、箸筷、斗、勺、盆架等与日常生活用具相配套使用的工具类。

商周时期的礼器种类很多，主要存在于中原地区，周边地区不单数量少而且品种单一。青铜质礼器持续的时间较长，有些甚至到了明清时期还在生产和使用，这里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春秋早期·垂鳞纹铜方彝

第二章 青铜器的分类与功能（3）

比较有趣的是，个别器物还具有一器多用的功能。春秋时期出现的形似大盆的鉴，其用途达到了三项：一是盛水当镜照容；二是盛冰以防食物腐坏；三是洗漱沐浴之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盘是与匜配套使用的盛水器，后来逐步向大器型方向发展，用作澡盆，供人们洗去污垢，功能与鉴相似，后来盘发展到唐宋时期多做托盘之用，已经失去了盛水这项基本功能。再比如：鼎最初是烹煮肉食的炊器，到了商周时期多用于祭祀和宴享时盛肉，成为一些重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器，甚至还象征着立国建邦和统治者的权力。“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成语就是说明鼎在人们的心中是与权力威信相提并论的。秦汉以后，历代仍有铸鼎的习俗，延续至今而不衰。现代，鼎多用于宗教寺观，或作为某些重大事件的象征性纪念物。1997年我国向联合国赠送过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纪宝鼎，以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近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大发展，街头广场上竖立的大鼎小鼎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时的鼎所起的多半是装饰功能。因此，可以说鼎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造型变化最大、所兼功能最多的一种容器。青铜器中发展比较晚的缸，是近现代仍在使用的少数几种实用器之一，如清代为防火在故宫庭院中置放了贮水用的巨型大缸，重达2000多公斤，外表鎏金，尽显皇家气派。

春秋·编钟

与匜造型相似的还有一种叫“虎子”的铜器，流行于汉代。它呈伏虎形，上有提梁，虎嘴圆张，虎内中空。关于这种器物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已争论了几十年，至今尚无定论。在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中，有一幅厕间浣洗图，一仆人执帚扫地，旁边就放有一件虎子。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亵器，可也有的专家认为是水器，或者是茶具。

青铜乐器也是青铜器中一个大的类项。较常见的有秦汉以前的青铜乐器，如铃、鼓、磬、铙、钲、傅、编钟、勾、于等礼仪用乐器，

而且编钟还分傅钟、钮钟和甬钟之别。属于军旅用的乐器有铃、鼓、铙、钲、铎等。钟常用于寺庙。锣、钹、唢呐、喇叭、号等功能更是多样化，广泛地用于梨园戏剧、迎亲送葬、军战攻防、娱乐游戏、礼宾游行等各种场合。勾和于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南方地区使用较为普遍。作为敲击乐器的鼓有中原和南方之别。中原产的青铜鼓仅见于商代，多横放在支架上，可两面敲击；西南地区的没有可以放置的支架，只立置于地上，所以只能一面敲击。

第二章 青铜器的分类与功能（4）

青铜器中的装饰品，在青铜器发展至鼎盛的商周时代少有发现，在以前的著录和研究中也很少提及。但古往今来，不少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装饰品不断出现在大型文物展览会、古玩市场或是拍卖会现场上，其数量及质量是不可小视的。这些饰品中既有普通百姓的日用品，也有王公贵族的随葬珍品。身份高贵的人佩带贵重的饰品，像铜丝网冠、铜缕玉衣，而普通人则佩带簪、钗、环、戒、钏、镯、坠链等等。除了人体佩带的服饰、头饰等装饰品外，也有与人们起居生活、社会活动等息息相关的室内外装饰用品。青铜雕塑是这类装饰品的主角，造型有人像、动植物像和几何形等。人像以可移动的鎏金佛造像为主。另外还有形态各异的青铜面具，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的青铜面具，引发人们对那个时代及当时人们审美观的猜测，其中的植物铜雕枝形灯、摇钱树更是精美绝伦。动物雕像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后来历代皆有制作，如西安南郊的唐代铜鎏金羊和鎏金铁心铜龙，甘肃天水出土的明代铜牦牛，清代的各种鹿、龙、凤、鹤、龟、狮等供欣赏把玩的艺术品。到了近现代，随着人文历史气息的浓郁，铜雕人像较为多见，几何形的铜造像更是扮演着带领时尚的角色。

汉代·汉鐎斗壶

目前，考古学家们又把杂项类的青铜器归纳为生活用具、车马器、货币、度量衡、符印等几个亚项。其中，生活用具因器物用途的多样化而比其他杂项还要繁复，可以再被分解为镜、带钩、灯、炉、洗、耳杯、樽等项。这里有着明显的分类不均的现象，其实一些类项是可以归并的。最明显的就是作为称量用具的度量衡，完全可以归入到工具类当中，而不必因其出现较晚、数量较少而成为独立的一项。洗、耳杯、樽等也是如此，它们或为水器、或为酒器、或为炊器，自应并项。其他的诸如车马器、货币、符印等，因用途专一、数量大、沿用时间长、已成专门之学等原因，应独立出来另立新的大类。这

样，杂器所剩的种类就不是太多了，基本上只是一些数量不多的日常小器物。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1）

第一节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

青铜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青铜器以其雄浑古朴的造型、绚丽精美的纹饰，弥漫着远古的气息，给人以深沉凝重的历史感。而青铜文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揭示的青铜时代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这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青铜时代的遗物，主要是指青铜器，此外还有陶、瓷器、木漆器以及玉器、石器等等；另一个方面是当时人们活动留下的遗迹，包括房屋、村落、城址及墓葬等等。除物质文化以外，也包括当时人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例如文字和艺术等。中国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第二节中国青铜文化的特点

世界各国及各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仅不尽相同，而且各地的冶炼铸造技术水平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很先进，有的很落后。曾是世界文明最早发祥地的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最早使用青铜器，距今约有5000多年的历史。其次是欧洲地区，公元前10世纪前后，欧洲人已用失蜡法铸造铜器。再次是与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年代相仿的、约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代印度。在印度河流域，青铜铸造技术显示出了高超的技艺，匠人们熟练运用热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术制造青铜器具。非洲地区稍晚，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埃及在公元前1567—前1085年之间已发明了较为先进的冶炼设备——脚踏风箱。美洲的青铜史大约是公元以后的事了，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所以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早的，而且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与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相比，中国的青铜文化还有其他两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具有“藏礼”作用的青铜礼器体系。

在我国出土的青铜中有大宗的礼器，这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我国青铜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奴隶制社会中，青铜礼器被统治者用来祭天祀祖、歌功颂德、宴飨宾客，同时它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陪葬品等。可见，青铜礼器在我国早已被权力化、制度化、神秘化了，它早已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

在中国历史上，“以礼治国”是古代政治独特的领导艺术。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仪体系，贯彻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2）

在中国，把奴隶主贵族制度以物质化形式来体现的青铜礼器，鲜明地以器的多寡与不同的组合形式来区分不同的地位、身份和价值，如天子九鼎之类。“九鼎”就是指青铜礼器在使用与陪葬时相互之间的组合关系。商代盛行以一觚和一爵配对组合。奴隶主贵族墓葬中发掘出的“觚与爵”组合的，套数越多就代表身份越高。西周盛行鼎和簋的组合，尤其盛行“列鼎”制度。天子是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卿大夫是五鼎四簋，士是三鼎二簋，由高到低，由多到少，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种青铜器组合形式体现了一定的等级功能，了解这一点对于分析青铜器本身及其文化背景都有重要意义。

第二，大量青铜器上铸刻铭文。

这就是中国青铜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青铜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世界各地的古青铜器绝大部分都没有铸刻铭文。只有印度河流域等古代文明发达的地区曾发现有少量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这与中国有大批铸刻铭文的青铜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由铭文来体现。众所周知，商周时代距今已很遥远，由于历史的变迁，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极少，只有《尚书》、《诗经》和《春秋》等几部。就是这仅有的一些书籍，经过历代传抄，也早已不再是原有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据这些书籍资料对上古历史有一个比较真切的认识，是很困难的事情。而青铜器铭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它们没有经过后世的修改，保留了当时真实的面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中所言：“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著录先秦有铭青铜器近12000件的《殷周金文集成》一书，是目前收录古今中外金文资料较为详备的著作。据1985年版《金文编》统计：先秦的金文单字3772个，已识字2420个，未识字1352个。

第三节中国青铜文化的分期

一般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萌芽期、鼎盛期和转变期。萌芽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有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为1600余年；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初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的礼乐兵器而演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3）

一、萌芽期

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史前时期，这个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期。传说自黄帝以来，相继有颛顼、帝喾、尧、舜等人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后人盛赞的五个圣主，即五帝。据现在的研究，五帝时代就是中国古史上的英雄时代，诸如黄帝、炎帝和蚩尤等，其实并非实指具体的个人，而是当时一些族或族团的名称，有关文献记载实际上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族团及其互动关系。其中黄帝、炎帝属于华夏族团，蚩尤则是东夷族团的代表。

据古文献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几十处遗址里，考古人员都发现并挖掘出了青铜器制品。

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萌芽期的铜器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红铜与青铜并存。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了刀、锥、钻、环和铜镜，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在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煅烧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都比较先进。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了两件带孔红铜牌饰；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了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了黄铜残片等。

第二，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占多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类别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不可否认，当时的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仿金属柳钉。如果可以认定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及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那么当时的青铜器已经正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第三，青铜器还没有等级之分。这时期的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可见当时普通居民也用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几何纹饰，绝无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也就是中国青铜时代，延续时间约1600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在所有青铜器中，礼乐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纹饰种类也较多。这些青铜礼乐器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而是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带有一定的神圣性。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

1 夏代的青铜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首领大禹，因领导各族人民疏导治理洪水获得成功，被推戴为天下的共主。禹废止“禅让”制度，死后传位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中国古代社会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器以藏礼”就是把形制有别、大小各异的青铜器皿通过不同的组合与搭配，用来规范不同人物在社会中的地位，显现贵族的权威和等级规则。这时，作为财富象征的青铜器，既是社会等级和身份的象征，被广泛地用于祭祀、征伐、宴享、婚冠、丧葬等活动，又成为夏代礼制形成的标志。夏代礼制的形成，开创了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礼制文化。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4）

商·青铜螭龙圆鼎

2 商代的青铜文化

在公元前16世纪，夏代的最后一个王——夏桀十分暴虐，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首领汤乘机起兵灭了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商代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城市规模逐渐扩大，中国的青铜文化于商代晚期攀越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奴隶主贵族的葬墓中随葬了大批青铜器，主要的器物种类有了一定发展，其中礼器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造型浑厚、纹饰繁缛，酒器更是让世人刮目相看。

虽然农业和手工业依然用石制工具，但是青铜制工具得到广泛的应用，促使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商代的青铜生产工具主要包括斧、锛、凿、锯、刀、锥和钻等。斧：一般为长方形，下端为双面刃，上端为长方形銎，用以装直木柄，然后再在直木柄上安装横木柄，木柄与刃向一致。它为砍伐工具，使用方法和现在的斧子相似。锛：古代又称为斤，体呈窄长方形，下端多作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曲折形木柄，特点是木柄与刃向垂直。它用于砍削木料，起到类似于现在的刨子的作用。渔猎在商代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考古发现用青铜制作的渔猎工具主要有鱼钩及镞。

商代的青铜器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与高度发展的青铜冶铸业是分不开的。在安阳苗圃北地发现的商代晚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广阔，达1万平方米以上，出土的熔铜炉直径已达0 83米。此外，还出土了1 9万余块的陶范及陶，主要是做青铜礼器的范，其中一件鼎壁范长达1 14米，比著名的司母戊鼎还要大。

商代的青铜文化还远不止上述的情况。在距离遥远的巴蜀地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西10公里。三星堆遗址中出土文物总数达数千件，其

中各种人物、动物、植物青铜像是中国所见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青铜雕像群。物之精、之奇、之妙、之美难以用语言来表现，现仅介绍其中之一二。

三星堆出土巨型青铜面具共3件，其中2件略小。比较大的一件堪称经典，其宽1 38米，高0 65米，重约80千克。人物面具略带微笑，显得很神秘。粗粗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睛部横着向外突出，高耸的鼻梁，阔宽的嘴唇，轮廓分明的唇形，微微上扬的嘴角，离奇的大耳朵，在正中额部、两侧部均有长方形穿孔。在这样一个睛部突出的巨型面具，研究者会很自然地将其与蜀王蚕丛的形象联系起来。据《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为石棺椁为纵目人家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面具的制作是以夸张的手法塑造了蜀王蚕丛的形象，说明这个古蜀国的开国之王死后有着神一样的待遇，被人们敬畏和尊重。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5）

三星堆出土铜立人像1件，通高2 62米，约重180千克，真人高低相仿。该铜像与上述的人物面具相似，同样是浓眉大眼、高鼻阔嘴，但未刻眼珠，只用黑彩绘出瞳孔。他头戴高冠，双手举于胸前，呈持物状，身穿华丽的左衽长衣，赤足。对此人像的身份认定，学术界尚不一致，或认为是蜀王、或以为是巫师、或以为兼而有之。三星堆还出土了比例近似的数十件铜人头像，或戴冠、或露发辫、或平顶、或秃顶，还有的脸部戴金面罩，部分可见彩绘，尚残留深蓝色的眉和眼眶、宽而长的朱唇。个个是浓眉大眼、大耳，神情肃穆。头像颈下中空，原当插于木质或其他质料的柱、柄之上，由此说明这些原本都是陈设于庙堂之上的神像。

三星堆还出土铜神树2株。一株残高3 9米，枝分3层，每层3枝。树下有圆形底座，树干挺直，上爬一个头向下而尾朝上的龙，枝上各立一鸟，树上还挂有被研究认为是文献记载的扶桑或若木的象征：铜铃、铜花、铜贝、金叶等物。比如：《山海经·海外东经》就记载了扶桑的形状："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柱三百里，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坠形训》说若木是"赤树，青叶赤华"，"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扶桑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神话画像里也出现过。帛画右上角树枝柔蔓的扶桑，间有或隐或现的小太阳，顶上则有一个内栖金乌的大太阳，树间缠绕巨龙一条。三星堆的扶桑竟会与相隔千里、时差1000多年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如此相似，真是让人费解。那么这些扶桑或若木有何用呢？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它就是古代巫师通天的工具或阶梯，即沟通天地的媒介。

三星堆窖藏坑的这些造像展示了一个神的世界，说明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经比较发达，其艺术造诣及人们的观赏能力已上升到了很高的水平。

3 周代的青铜文化

周灭商及东征胜利后，大规模将封地连同居民分赏给王室子弟和功臣。此后，分封制度逐步规范和完善，成为巩固周王朝政权的重要举措。这项制度也深深影响了青铜器的制作。

关于西周分封诸侯的史实，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出土于江苏丹徒的西周早期宜侯矢簋上的铭文就记录了宜侯受封的情况："佳（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卜于宜，人土（社），南乡（向）。王令虞侯矢曰：迁侯于宜。……锡在宜王人又七生（姓），锡奠（甸）七伯；厥卢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十六夫。"这条铭文不仅介绍当时该侯分封的经过，还验证了诸侯可以改封的事实。除前已提及的宜侯矢簋、康侯簋外，还有燕侯旨鼎、燕侯盂、鲁侯熙扁、邢侯簋、苗公鼎等等。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周代众多诸侯国的遗存，如河南浚县辛村的卫国贵族墓地、河南三门峡的上村岭貌国贵族墓地、山东曲阜鲁国都城及其贵族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都城及贵族墓地、陕西宝鸡弧国贵族墓地、山西翼城、曲沃交界的天马—曲村晋国都邑及贵族墓地、河南平顶山注阳岭的应国贵族墓地等遗存，尤以上村藐国公族墓地、天马—曲村的晋国墓地所描述的情况最为清楚。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6）

伯晨鼎的铭文则清楚地纪录了新诸侯的即位也要与官吏一样得到周王的重新册命和赏赐。铭文说某年八月丙午，周王册命伯晨继承其祖、父的侯位，并赏赐有相应的物品。《诗·大雅·韩奕》篇也记载了继任的韩侯被重新册命的情况，周王让他“缕戎祖考，无废联命，夙夜匪懈”，并赏赐有介圭，以及“淑旅绥章，覃茹错衡，玄衮赤舄，……修革金厄”。

4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西周末代君王幽王是个暴君。公元前771年，申侯、吕侯、曾侯联合少数民族犬戎灭了西周，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东周又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现主要讲一讲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春秋晚期的铁器开始逐步得到广泛应用，不仅为发展迅速的农业提供了锐利的农具，还为各种手工业，包括此时已经发展成熟的青铜冶铸业提供了坚韧的工具，促使各种手工业迅速发展，青铜冶铸业也借此东风有了新的飞跃。

青铜器的纹饰发展到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中、晚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代经常见到的兽面纹等纹饰此时已很少见到，西周中、晚期流行的窃曲纹等也被蟠螭纹和蟠虺纹取而代之。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出现了以人们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青铜器纹饰，有宴乐舞蹈、水陆攻战、狩猎、采桑等纹饰。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已经不再给人以神秘悠远的遐想，其简约、明快，或纪事、或抽象，成为一类纯粹的图案性的装饰。比如：蟠螭纹和蟠虺纹，这两种纹饰是分别由两条或多条螭或虺相互缠绕而组成一个纹样单位，然后作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来为器皿做整体的布局造型，增添美感。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我国金属货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山西省保德林遮峪商代后期的墓葬中，曾发现铜贝109枚。中原地区

使用铜币是在春秋后期。侯马晋国铸铜遗址不仅发现了铜币空首布的成品，而且发现了大批空首布内范。河南汲县彪镇第一号大墓中曾发现这种空首布674枚。侯马上马村第十三号墓发现铜贝1600枚，包金铜贝32枚。辉县琉璃阁甲墓和第六十号墓也各发现包金铜贝1000多枚。在古文献中，公元前524年周景王“铸大钱”的记载，也证明了这点。以上情况都说明铜币已经代替了贝的使用，并于春秋晚期在经济生活中较为广泛地流通了。

5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社会局面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小诸侯国家被吞并，比较强大的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成为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家，被后人称为“战国七雄”。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够拥有与战争紧密联系的大量兵器成为各国占据军事优势的有力保证。此时的青铜器依然保持着春秋时期的稳健步伐并不断向前发展。同时，冶铁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战国中、晚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已经较为广泛地应用铁质工具，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7）

三、转变期

战国末期至秦汉初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转变期。战国末期各国的革新派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礼仪制度已经彻底瓦解，铁制品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虽然形势不利于青铜器的发展，但人们仍未减退对青铜器的热爱之情，青铜冶铸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和进步。青铜冶铸业继续发展的原因有三：第一，虽然此时的铁制品有了长足的进步，铁质兵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武器仍然是以青铜质武器为主，并且由于此时战争的频繁与激烈，不仅青铜武器的数量激增，而且出现了杀伤力很强的木弩，其主要构件的材质为青铜；第二，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青铜货币与度量衡器迅速发展起来并广泛流通与使用；第三，铜镜、带钩、铜灯、玺印与符节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了一定发展，并且出现了镶玉嵌琉璃及漆绘等工艺高超、十分精美的产品。具体到青铜器，也有许多精美的作品，但大多数礼器已经是素面且没有纹饰。此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简短，其内容多为制作年月、地点、督造官、工官及制造者的姓名，或是标明器物的重量与容积等，目的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吕氏春秋·孟冬纪》）。

第四节历代关于青铜器的著述〖1〗

一、宋代以前关于青铜器的著述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起源很早。早在汉代，人们就把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西汉初期，随着大量古文经书的重新出现，这种在当时已不通行的“文章”逐渐被一些学者拿来研究。如《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武帝时，“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汉书·

郊祀志》还记载了汉宣帝时，美阳县(今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附近)出土了一件铜鼎，献给皇上以后，王公大臣一直为其如何安置而苦恼，大臣们有的认为应该把它好好地供养于宗庙。但当时研究青铜铭文的专家、时任京兆尹的张敞释出了鼎上的铭文，其中几句是“王命尸臣：‘官此□邑，赐尔旗鸾黼黻王周戈’臣尸拜手稽首曰：‘敢对扬于天子丕显休命。’”张敞认为该鼎出于歧东周人旧居之地，并且断定此鼎记录了周王褒赐大臣的内容，大臣的子孙便刻铭颂扬祖先功烈，所以此鼎不宜存之于宗庙，而应该藏于家庙之中。可惜此鼎后来失传，现已无法核校。但张敞释读了铭文，而且据铭文内容研究铜器的过程却载入了史册，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位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专家。

《后汉书·艺文志》杂家类中记有“孔甲盘盂”铭文二十六篇，可见班固也是比较重视古铜器的。《后汉书·窦宪传》还记载了和帝永元元年九月，窦宪伐匈奴，南单于漠北“遗宪古鼎”，该鼎上的铭文为“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很重视前代的青铜器铭文，他所著的《说文解字》收有四五百个古字，并且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东汉时期的又一位学者郑玄著有《三礼图》，现在已经失传，这本书也应当有一部分是有关先秦青铜器的。北宋初年，聂崇义根据郑玄等六家旧图，加以集注的新定《三礼图》中所绘商周铜器多与实物不合，是否与东汉郑玄的《三礼图》有很大的出入已经不得而知。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8）

因为南朝梁武帝时倡导学术，一些学者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当时的古文字和古青铜器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梁书·刘显传》载："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凝，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梁书·刘杳传》记载了刘杳和沈约讨论宗庙牺樽问题，沈约用郑玄旧说认为现无此种牺樽上刻画凤凰尾的器物。刘杳却认为："古者尊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物，知非虚也。"刘杳根据出土的先秦古青铜器驳郑玄之说。梁虞荔的《鼎录》和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辑录了有关铜器的一些文献记载及传说材料。

到了唐代，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呈现出鼎盛的局面，不仅经济上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史学、经学等文化艺术方面也出现了令人满意的成就。其中，与经学组成部分——古文字有不可分割联系的古铜器及其铭文，更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玄宗时的史学家和经学家韦述在其《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中云："江南铸器多铸银，罢官无物唯古鼎。雕螭刻篆相错蟠，地中岁久青苔寒。"诗中所述纹饰与东周铜器的螭纹大致吻合。《新唐书·杨收传》载："涔阳耕者得古钟，高尺余。收扣之，曰：'此姑喜角也。'即试，布刻在案两栾，果然。"杨收先是从音乐的角度来研究古钟上的铭文再验证其推测"果然"。

总结来看，自汉唐以来，不断有人对先秦青铜器进行一些初步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为铭文的载录，如《后汉书》所载仲山甫鼎铭；二为铭文的考释，如张敞对尸臣鼎铭文较高水平的考释；三为古铜时代的考证，李少君曾以铜器所载的铭文考定到了"齐恒公十年"之器，张敞则从器物出土地和历史背景两个方面考定了尸臣鼎为用器；四为对古器纹饰的描述。除了以上四点，可能个别学者，比如说郑玄，已利用古青铜器来研究礼制。但我们还是要对这

段最为接近夏、商、周的历史年代抱有一种遗憾：在这段时期，文献中涉及古青铜器研究的记载是零星的，只是个别学者偶做研究，没有人系统地搜集和整理古青铜器，也没有系统、专门的研究方法。即使是在汉唐，古青铜器的研究也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系统的学问。清代学者阮元将汉代以前古人对古铜镜的认识态度总结为："三代时，钟鼎为最重之器，故有立国以鼎彝为分器者"；"自唐至汉，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俄臣节能辨之者，世惊为奇"。这种三代时认为是"重器"、汉唐（尤其是汉）认为是"神瑞"的看法，势必影响到人们对古铜器的研究，使研究难以科学化。

二、宋代关于青铜器的著述

宋代的统治者提倡理学、尊孔读经，全国上下实行礼制，大大促进了对与古代礼制有关的金石实物的研究。当时上层社会对精神文化有着较大的需求，朝廷士大夫都热衷于对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宋代的造纸、印刷、墨拓等科技的创新，也使得金石学兴起并风行起来。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明上下，别等列"的礼制工具、象征统治权力的青铜器与古文字的研究也蔚然成风，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产生了"金石学"。有一部分学者对古青铜器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研究青铜器的方法，出现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有关青铜器的著作。宋代为后世的金石学以及近代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9）

宋真宗时的文献记载了宋人研究青铜器的情况。记载最为常见的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如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乾州上献古铜器，其形状大约呈方形，并配四足，上刻铭文21个字，其铭为“维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鬲甗，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真宗下命儒臣考证，认为是为史信父甗。宋人陈思《书小史》卷九“颜昭甫”条记载其人“为天皇曹王侍读。曹王属有献古鼎，篆字二十余字，举朝莫能读，昭甫尽能读之”。“举朝莫能读”我们可以推断古鼎应为先秦时的铜器。宋代学者王应麟《玉海》卷八八“器用鼎鼐”类载：“开元十三年十月壬申，万年人工庆筑坦掘地，获宝鼎五，献之。四鼎皆有铭，铭曰：‘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永宝用。’”此鼎的内容似与周代铜器一致。

据翟耆年《籀史》记载，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僧湛著的《周秦古器铭碑》是宋代有关青铜器最早的著作。文献还记载了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宋仁宗为太乐制作礼乐器的参考而诏令秘阁与太常出所藏三代钟鼎，又诏墨器款以赐宰相，这成为的彝器墨拓最早的例证。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刘敞开了私人著录及收藏青铜器的风气。刘敞在他所著书中提出从三个方面研究古铜器，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谥牒次其世谥”，并著有《先秦古器图》，共收青铜器十一件，还注明器物得于何处。从后代人所著的《公是集》和《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引用其书中的几件器物来看，此书应该是图文并茂，其中的铭文还有简略的铭文内容考释。约在神宗年间，李公麟编纂了《考古图》，此书有器物图、铭言语和一定的考释。此书“天下传之”，且“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李公麟字伯时）”。另外，宋代有关古青铜器但已佚的书还有李公麟的《周鉴图》、董伯思的《博古图说》、赵明诚的《古器物铭碑》、晏溥的《晏氏鼎彝谱》、王楚的《钟鼎篆韵》、薛尚功的《广钟鼎篆韵》、佚名的《绍兴稽古录》等。

现仍存的宋代有关古青铜器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图铭类。此类书不仅有器物图且著录铭文，如吕大临的《考古图》、赵九成的《续考古图》和宋徽宗敕编、王黼主编的《宣和博古图》。《考古图》是现存年代最早且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此书所著录的是当时宫廷及私人收藏的古青铜器，还有一定量的玉器，目列共224器。作者吕大临按形制和器用把“三代器”和秦汉器分开，并进行了一些分类。他根据每器摹绘器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和重量，不仅对部分器物的铭文和时代作了一定的考证，而且对收藏处和出产地也加以说明。虽然此书有很多错误，但因为其书在著述的体例上相对完备、成熟，后世的许多青铜器著录书都沿袭了该书的编纂体例。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10）

《宣和博古图》著录了皇室所藏的自商到唐的铜器，是宋代铜器著录书中的集大成者。该书把839件铜器按照时代排列为20类57种，通过摹绘图像，勾勒铭文，记录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用考证、花纹的说明等方式论述器物形制、名称、纹饰、用途及渊源。此书最大的贡献是对古青铜器的分类和定名，其精细之处在于所绘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像比例。虽然此书也有不少错误，但此书在著录铜器方法上比《考古图》大有提高。

第二，字典类。我国有关金文最早的一部工具书是吕大临撰写的《考古图释文》。此书从名字上来看是释文与图编类的书，其实质内容为字典。该书采用《考古图》所收青铜器铭文，据《广韵》四声隶字，每字有隶定和反切，后列疑字、象形、无所从三部分，共收录了821字。

第三，铭文集录类。此类书有别于图铭类的是它摹录原铭，写出释文，并加以考证说明，但不附器物图，如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的《钟鼎款识》。宋代所见彝器铭言语大多见于《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它收录的器物主要取自《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又旁及它书广为取资而成，古器共收511件。此书在编排上有如下特点：第一次把时间分为夏、商、周、秦、汉五代，各代又含有器类分排，并附有字形字义的一些考证。《啸堂集古录》著录商、周、秦、汉、唐的青铜彝器及印、镜共345器的铭文，并注明出自何器和附加释文。《钟鼎款识》大致与《啸堂集古录》相同，也著录商、周、汉代青铜器的铭文，共59件。

第四，专论和跋语类。此类书与铭文集录类的区别是：基本不摹铭文，只作器铭及器形考释，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和黄伯思的《东观余论》。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的士大夫和文人对于商周青铜器铭文

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铭文的考释方面，他们有许多新的见解。他们考证辨识了数百个文字，并发现了一些金文构形规律。欧阳修首创的考订和著录金石文字的形式——跋尾，没有按时代先后编排的次序，而是随题随录。他的《集古录跋尾》收录了周、秦、汉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四百多篇，其中铜器铭文有二十多篇，是对家藏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的汇集，每铭皆录释文，考证其要旨。欧阳修说他著书目的是为“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金石录》前十卷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了铜器和石刻目录，后二十卷是对部分青铜器铭文以及碑刻所做的题跋共502条。此书学术价值较高，赵氏治学严谨、精于鉴别，他仿《集古录跋尾》，且又有其独到之处，即注意到排序的时代先后。赵明诚说：“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无疑。”《绍兴内府古器评》未通过分类和必要的排序考评了南宋内府所藏古铜器195件器物。《东观余论》上卷“法帖刊误”中有些考订颇有见地；下卷“铜戈辨”研究了铜戈的形制，包括戈的援、内、胡各部位名称，并且驳斥了郑玄的说法，认为古戈戟是横刃击兵，不可直刺。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11）

除以上所列四类书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关于青铜器研究的书。如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不单单谈到了古代蜡模法铸铜器的过程，而且包括二十余条鉴别古钟鼎彝器赝真的方法，是一本记录鉴定古物的经验之书。张世南的《游宦纪闻》一书中有古铜器的辨别，款识、制作的介绍，对铜器的分类、定名有一些正确的意见。另外，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中也谈到了古铜器。

总之，引用一下著名金石学者阮元的两句话："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正是由于人们摆脱了迷信先秦古铜器的态度，把金石刻铭作为历史资料来做趋于科学化的研究，所以才在青铜器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宋代学者研究古青铜器的方法主要是著录及考订器物的类、名。他们开创了一整套以《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为代表的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较为科学的著录体例。宋人在古青铜器的分类上根据器物的用途，将所谓"相类相须"之器放在一起。在定名上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春说。知宋代考古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据翟耆年《籀史》记载，北宋到南宋初年金石书籍很多，达到了34种之多，但流传到现在的已是所见甚少。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及著作者主观上的原因，宋代人在对古青铜器的年代考订、文字的考释、铭文内容的论证以及一些器物的定名上也存在着错误和缺陷。两宋时期只是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初期阶段，也就是识字阶段，但我们仍要感叹宋代人为古代青铜器的研究所做出的成绩——古青铜器研究的基础是在宋代奠定的。

三、宋代以后关于青铜器的著述

清乾隆钦定将皇家收藏的青铜器编辑整理，于是出现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等四部青铜器的著述。清代中期到辛亥革命，铜器铭文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即文字学研究阶段。晚清时期的乾嘉经学考据风行全国，使关于青铜器的研究得到更大发展，学者们编辑纂写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愙寥斋集古录》、《捃古录金文》、《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奇觚室吉金文述》、《古籀拾遗》、《古籀余论》、《三代吉金文存》等青铜器书籍。在研究金文的方法上，此时注意和《说文解字》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参考铜器铭文和玺印文、兵器文、钱币文，通过相互推勘、综合比较来发现古文字的演变规律。而且这个时期铜器铭文研究不仅进行单个文字的考释，还很注重研究全文的组成结构和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在辨释古文字方面有颇多创见的是《古籀拾遗》和《古籀余论》两书，罗振玉编辑出版《三代吉金文存》也是集商周金文之大成者。

第三章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12）

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学者研究铜器铭文的目的、观点和方法更加科学，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分析研究铜器铭文资料，解决历史问题。自此之后，铜器铭文的研究进入了综合研究阶段。这时，我国古器物及古文字学由于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有了很大进步，铭文用拓本，图像用照片，资料详实完备。如《周金文存》、《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梦草堂吉金图》、《双剑侈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等一些青铜器书籍。

那时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有关青铜器方面的著名学者。如王国维，他重视对古器物和古文字的研究，并且提出了著名史学理论——“两重证法”，对金文断代和一批青铜铭、物的考证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的主要著作多收入在《观堂集林》。王国维弟子容庚也系统地总结了古青铜器物与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著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铜器通论》等书。在近代学者中，善于借助古文献考释古文字和用古文字整理和考证古籍的于省吾先生是卓有成就的，其所著《尚书新证》、《诗经新证》、《诸子新证》等在学术界曾产生过较大影响。《古文字学导论》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古文字学理论著作，其作者唐兰运用金文研究西周史的著作《西周青铜铭文断代史征》，也是众多研究著述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在许多金文研究的著作中，从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社会制度等方面对商周社会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铜器铭文。他的态度和方法对后来金文的研究有很大影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就是他所著，书中开创性地主张“西周断代、东周分国”的研究体例，使分散的铭文资料通过这个系统联系起来，从而整理成互相关联的史料，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巨著。他还撰写了其他金文专著和论文，如《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它们都体现了把金文的语言研究与先秦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特色。此

外，我国许多贵重青铜器由于早期的保护或战乱而流落到海外，现代的青铜器研究学者也关注到这方面，如陈梦家先生，他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收集了流散在美国的珍贵铜器资料。他注意对器物分型分式、成坑成组的研究，把考古学的方法运用到古器物、古文字研究中去，为所著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实是对《两周金文辞大系考程》一书的补充。

近年来，随着青铜器资料或实物的大量出土和现代的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日渐完善，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绝大部分缺漏几乎都被填补了。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学已成为“当世显学”。今天的学者们一方面从这些现有的资料中全面展开金文的研究，来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一方面在前代学者的著述中追踪探源，进行深入的开拓进展。除了学科本身的诸多问题得到解决外，一系列有关古史研究和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问题也得到了有效解决。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1）

装饰技巧

中国青铜文化起源和发展的阶段，正是夏、商、周文明兴起并不断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阶段。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前人对青铜制作技艺不懈钻研的结晶，其不仅突破了青铜冶铸技术的种种重大技术难关，而且为攻克更高的技术难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有《考工记》这样总结长期重要成果的著作，为后人留下一个又一个惊叹号。在倡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我们徜徉在中国早期金属冶铸技术发展的大河中，似乎更能感受到古代青铜工匠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第一节青铜器的早期采冶

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制造青铜器主要分为采冶与铸造两个大的工艺过程。本节就先谈一谈早期青铜的采冶问题。

采冶，即首先通过铜矿石冶炼成纯铜，通过锡矿石冶炼成锡，然后把铜和锡按不同的比例冶炼成铜锭。

我国广袤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铜矿，其作为冶铜的重要原料很早就被记录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据战国时的《管子·地数篇》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上有慈石者，下有铅锡赤铜。”又据战国时期的《周礼·地官》记载，当时还设有管理矿山的矿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内蒙古赤峰市林西，江西瑞昌铜岭，安徽南陵、铜陵等地发现了古代采冶铜矿遗址。在铜矿开采遗址附近一般都发现有冶炼遗址，这说明当时铜矿冶炼环节是就地进行的。

夏、商、周三代王朝迁都的次数，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夏有八次，商有十二次，周算最少的，但也有四次。三代王都之所以这样频繁地迁徙，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对主要政治资本——铜锡矿的战略性追求。所以，那些王都大多分布在以豫北和晋南为中心、铜锡矿集中的华北大平原边缘的山地。《山海经》中记载的铜产地约有

30处，几乎全部集中在黄河流域以北地区。考古学家通过对皖南矿冶遗址出土的铜锭和炼渣的检验和研究，证明了至少在西周时期，古代的匠人们已经掌握了硫化矿炼铜技术，以及当时的青铜生产可能具有开采深层原生矿床的能力。这样就解决了矿冶生产的持续发展问题：生产出更加充足的铜料来为铜的冶铸业长盛不衰提供技术和原材料的保证。

到了春秋时期，铜的采掘、冶炼技术有了很大发展。1974年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井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铜绿山有两处古矿井，春秋晚期一处，战国一处。矿床的开采采取了竖井与斜井、斜巷与平巷相结合的采掘方式，并且用各种技术手段解决了井下通风、排水、矿石提供和巷道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在铜绿山矿区先后发现的六座属于春秋时期的炼铜竖炉之中有三座炉基的通风沟、炉缸、金门（铜液和铜渣放置口）和通风口保存完好。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2）

炉高1 2—1 4米，有石块支撑在炉缸底部，用以保温防湿，防止炉缸冻结；炉缸壁上有呈喇叭形的、口径5厘米的鼓风口；炉旁设有工作台，用于加料和安放鼓风设置。还有利用封闭已经废弃的巷道的办法，控制因不同井口的空气压差而自然形成的气流，使之到达工作面的最深处。另外，他们还采取了将矿石在井下进行初选，然后将贫矿和废石填充采空区，以及将品位高的矿石通过设在各层平巷上的辘轳逐级接力提运到井上等方式。这些迹象都说明春秋时期铜的采掘和冶炼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第二节古代青铜器合金成分

所谓合金，就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经过高温使它们熔合在一起而成为另一种金属，并具备了新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能。合金在铸造方面是属于再创造，而青铜就是合金的首创。

青铜在一般意义上都是铜与锡的合金，又称为锡青铜。但中国古代许多锡青铜中常常含有少量的铅，这是商周青铜冶铸的一个特点，即降底青铜的熔点。当然，意义不单单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一层还在于对合金硬度的需求。中国古代青铜器合金成分的比例，最早见于《考工记》。书中对先秦时代的劳动人民生产实践和经验知识有着独一无二的详细记录，是一本生产技术的档案。《考工记》中记载六种青铜器物中不同含锡量，称之为“六齐”，这六种不同合金的比例是：

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

斧斤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

戈戟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

大刃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

削杀矢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

鉴燧之齐金锡半。

古时候，人们把铜称之为金，所以《考工记》所记载的金指的就是纯铜。六齐中金和锡的化合，就是锡青铜，同时标明了六类铜器的铜和锡熔合比例。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古代工匠们对熔融之中的青铜合金不能取样化验，因此金、锡之比是指熔铸之前、下料时的比例，而不是铸成后的成分比例。在熔铸的过程中，铜、锡都会发生一定的氧化反应，而锡氧化的速度尤其快。因此，冷却后青铜的成分比例就很难与下料时的相同了。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3）

中国古代的青铜合金配比技术十分复杂，反映了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体现了对金属硬度及韧度的双重追求。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合金配比很有讲究，其早期和晚期青铜器的合金变化差别较大。商代早期的容器主要为锡青铜，这类青铜器含锡量较夏代有所增长，但含量仍属中等；商代后期的容器以含锡量中等偏高、高含量者居多。另外，从这个时期少量的铅铜器来看，其含铅量大多较高。商代后期的武器主要成分为锡青铜。至于这个时期的各类生产工具，已经很少再有用锡青铜制造的了，就算有的话，其含锡量也较高。西周时期锡青铜的含锡量以中等者最为普遍，铅青铜则比较少见了，极少数铅青铜器的含铅量也较高。此外，在这个时期的青铜容器中，锡青铜类已占有一定的比例。

在青铜时代，由于人们掌握的金属只有铜、锡、铅、金、银等数种，在配制合金时没有新的金属可超出青铜所特有的优越性能，因此只能不断寻求不同的铜锡比例来铸造各种青铜器。

第三节青铜器的铸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有块范法和失蜡法两种基本的方法，此外还有分铸法、焊接法等工艺。

一、块范法

块范法或称土范法，是商周先民最先采用的，是整个青铜时代中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法。其法步骤如下：

1 制模

模也称为母范、作模。其原料可选用陶、木、竹、骨、石等质料，而已经铸好的青铜器也可用作模型。具体选用何种质料要由铸件的几何形状而定，并要考虑花纹雕刻与拨塑的方便。一般说来，形状细长扁平的刀、削的模，可以用竹、木削制而成；较小的鸟兽动物形

体可以用骨、石雕刻为模；对于形状厚重、比较大的鼎、彝诸器，则可以选用陶土为模，以便拨塑。

2 制范

制范要选用和制备适当的泥料，其主要成分是泥土和沙。用泥料敷在模型外面，脱出用来形成铸件外廓的铸型组成部分，在铸造工艺上称为外范，外范要分割成数块，以便从模上脱下；除了外范，还要用泥料制一个体积与容器内腔相当的范，通常称为芯，或者称为心型、内范；然后使内外范套合，中间的空隙叫做型腔，其间隔距离就是所铸器物的厚度。

一般说来，用来做外范的泥料中，泥土（最好选择粘土）含量大些，用来做芯的泥料则要含砂量大些，颗粒较粗些。范的泥土备制极细致。采集好的泥土要经过晾晒、破碎、分筛、混匀，并加入符合一定比例的水分，将之和成软硬适度的泥土，再经过反复摔打、揉搓，其间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浸润，使之定性。这样做好的泥料在翻范时才能得心应手。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4）

制范的过程中，在掌握好调配泥料含水量的同时，还必须混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草木屑、草料、烧土粉、炭末或者其他有机物之类，这是为什么呢？范在成形以后是要经过高温焙烧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范因不耐烧变了形状，那么范所塑造的青铜器物也会走了形，而这些在高温下不容易走形的材料加进去之后，可大大减少收缩率来保持器物的原形，并利于透气，避免在塑成后因干燥、焙烧而发生龟裂现象。

从出土发掘情况来看，陶范最为常见。陶范的泥料泥土的含量可以多一些，其表面还必须细致、坚实，以便在其上雕刻纹饰。泥模在塑成后，要在室温中慢慢干燥，纹饰要在干度适当时雕刻。对于布局严谨、规范整齐的纹饰，一般先在素胎上用色笔起稿之后再进行细致的雕刻，高出器表的花纹则用泥在表面堆塑成形，再在其上雕刻花纹。泥模制成后，必须置入窑内焙烧成陶模才能用来翻范。

从模上翻范块是范铸造技术的中心环节，要求必须有很高的技艺。对于像刀、戈、镞等较简单的实心器物，二合范就能够应付自如，即只需由模型翻制两个外范。与上述的器物的简单制作相比，制造空心容器的范就显得复杂多了。在翻范以前，一定要先明确了外范的数量及分布状况。现简单地将其制法介绍如下：第一步骤是做外壁。模的表面用范泥堆贴且不留空隙，再用力压紧以求紧密不松散。接下来是做内壁。内壁的做法有三种：第一种是从模型上翻制好外范后，将模型的表面加以刮削，模型即为内芯，所以刮削模型上的厚度即是所铸铜器的厚度；第二种方法用于大型器物，是将模型做成空心的，以其内部为模型制出内芯，并使脱出的芯和底范连成一块，再在底范上铸上器耳；最后一种是利用外范制芯。

3 浇注

将已完成焙烧且组合好的范趁热浇注，不然就须在临浇注前进行预热。预热的温度以摄氏度400—500℃为佳。预热时要将范芯装配成套，捆紧后用以泥砂或草拌泥糊严实，再入窑高温焙烧。为了防止铜液压力将范涨开和高温引起的范崩，所以焙烧好的型范需埋置于沙（湿沙）坑中并在外加木条箍紧。

范预热准备好后，将熔化的铜液（1100—1200℃为宜）注入浇口。器物要倒着浇，是为了将气孔与铜液中的杂质集中于器底，使器物中上部致密，花纹清晰。浇入铜液时应该掌握好速度，以快而平为宜，直到浇口气孔（范上留有的通气孔）皆充满铜液为止。待铜液凝固冷却后，即可去范、芯，取出铸件。

一次浇注成完整器形的方法叫“浑铸”、“一次浑铸”或是“整体浇铸”。商周器物多是以此方法铸成的。凡以此方法铸成之器，其表面所遗留的线条是连续的，即每条范线均互相连接。

4 修整

去掉陶范后的铸件还要经过锤击、锯挫、錾凿等多道工序来进行修整，以消去多余的铜块、毛刺、飞边。只有当一件光润整齐的青铜制品出现时，才算制造完毕。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5）

二、失蜡法

失蜡法指用容易熔化的材料，比如用黄蜡（蜂蜡）、动物油（牛油）等制成所铸器物的蜡模。用细泥浆在蜡模表面浇淋一遍，使蜡模表面形成一层泥壳。然后在泥壳表面涂上耐火材料，待其慢慢硬化就做成了铸型。最后再用高温烘烤此型模，使蜡油不耐高温熔化流出铸型，从而形成空的型腔，趁其型腔是高温状态，再向型腔内浇铸铜液，凝固冷却后出器。失蜡法也称熔模法。这样制得的器物无范痕，光洁精密。

从我国考古发掘情况上来看，最早使用失蜡法的铸件是1978年5月河南省淅川楚王子午墓所出土的青铜禁。该禁四周围着龙，纹饰结构复杂的框边是用失蜡法铸造的框边立体的错综结构的内部支条，尚可见蜡条支撑的浇铸痕迹。王子午即楚王的令尹子庚。这件令尹王子午墓的禁已经把失蜡铸造的技巧发挥得相当纯熟完美，已能成功地铸造出最复杂的器件。

其实失蜡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见于文献的记载比较晚。有关熔模法的最早记载是宋人王溥《唐会要·卷八十九·泉货》引郑虔《会粹》中的说法：唐初铸开元通宝，（欧阳）询初进呈“”，自文德皇后在“样”上掐一甲迹，因此钱上留有掐痕。“”是蜡的古写，“样”其实就是蜡模。但有些文献中对此也有不同看法，认为钱上所留的痕迹是凸痕。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最早叙述了失蜡法的工艺过程。明代的宋濂等人所撰写的《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第三十五·百官一》还有“出蜡局提举司”，即有专司铜器铸造的部门。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万钧钟的失蜡铸造工艺并载有蜡料配方。

三、分铸法和焊接法

青铜工匠们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创造了分铸法。分铸法是先将器物的小件如提梁、把手等浇铸成，再将小的铸件嵌放在器的主体范上加

以固定，与待铸青铜器固定部件或活动部件的空腔套嵌在一起，中间杂用范料隔开。这样，先铸的部件和器体就能固定或套铸在一起了。但有的器物铸造不是这样的，而是完全相反的步骤，即先铸器体，再合铸附件或附饰。这种将分铸好的器身和耳、足等附件联接起来的方法就称为焊接法，其实焊接法是分铸法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有时也称分铸焊接法。

在商代，出现了最早的分铸法，但比较繁复讲究，只在铸造形制较为复杂的青铜器时才使用。到了西周，绝大部分青铜器的附件都采用了分铸法，制范时仍然把器身和附件合在一起做一个整模，再从整模上翻出分范，这样做出来的器物比起后来的分铸法显得有一点拘束。到了春秋中、晚期，不但器身和附件分别单独做模，而且器身也按着形制的弧度做出许多模，器型也因这样的方法而变得精美细致。这个时期的焊接技术仍采用商、西周以来的嵌入法，即把预先铸好的附件嵌入器身范上，进行一次浑铸，而且比以前使用得更普遍了。还有使用方块印模法印铸花纹，最早见于河南辉县甲乙墓出土的属于春秋中期偏晚扁圆形壶。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6）

第四节 青铜器的装饰技巧〖1〗

一、古代青铜器的金银错工艺

今天我们所说的青铜器错金、错银之称，古代叫金错、银错。如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记载："金错蜀杯。"又如《汉书·食货志》记载："错刀以黄金错其文。"西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秦汉古籍所记古代金银错器物也都是称为金错、银错或金银错，所以本文在论述古代青铜金银错工艺时也遵循古称。简单来说，金银错工艺是我国古代在青铜器上刻画金银图案纹饰的方法。

战国中期·错金银马首辕饰

金银错工艺是我国青铜时代一项精细工艺。现代的考古资料证明，它出现得比其他工艺更晚，在青铜工艺发展了1000多年以后，也就是春秋中晚期才被人们所接受和重视，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战国、两汉时期，金银错青铜器已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目前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金银错青铜器已数以千计。我国古代在青铜器上做金银错图案纹饰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1 镶嵌法

我国古代金银错青铜器，有相当一部分采用镶嵌的装饰方法，又叫镂金装饰法。其制作过程分四个环节：第一步是做事先刻好凹槽的母范，先刻好凹槽的目的是以便器铸成后，在其内嵌金银。第二步是錾槽，也就是凹槽在整个的铜器铸成之后，还需要加工錾凿出更加精致细微的纹饰。这种做法也叫做刻镂、镂金，即青铜工匠们在器物表面用墨笔绘成纹样图案来錾刻浅槽。第三步是镶嵌，即把金丝或金片镶嵌在刻镂好的凹槽中。第四步是磨错，镶嵌后的青铜器表面还不够光洁平整，为了使金丝或金片与铜器表面自然平滑，就必须用错石磨错，起到严丝合缝和美观的作用。

2 涂画法

汉时人们对“错”字的解释为“错，金涂也”，由此大家不难看出来，当时涂画法已经代替了镶嵌法成为金银错的主要装饰手法。其实不止在汉代，战国和秦朝的金银错铜器中也有很多是用这种“金银涂”方法制成的。有不少被考古和文物专家称颂的精美金银错青铜器，金银错纹饰脱落的地方，没有任何凹痕，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金银错纹饰不是嵌上去的，而是涂上去的。如1987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错虎吞鹿器座，是件举世公认的金银错代表作品。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器物上虎尾部分的金错纹饰脱落了一小块，而脱落处没有丝毫凹痕，因此是用“涂画法”完成的。又如现收藏于美国沙可乐美术馆的鸟纹壶，也是一件公认的使用“涂画法”的金银错青铜器精品。

我国古代金银错的装饰题材和内容，主要有下面几种：铭文、几何纹图案、动物纹、狩猎纹，以及各种动物造型青铜器上的眼、眉、鼻、嘴、爪、毛、羽等纹饰。春秋后期开始的青铜兵器上也广泛地使用了金银错工艺，主要是金错铭文，字体以鸟篆文最多见。剑上的金错铭文，一般在剑面上，个别错在剑脊上。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冶铸与（7）

二、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和表面合金化技术

中国青铜兵器发展到东周时期，出于诸侯争霸的需要，兵器的形制和制作技术获得重大进步。同时，王公贵族的佩剑之风亦促使了青铜兵器的装饰技术获得重大发展，在青铜兵器上出现了剑首同心圆、错金银、鎏金、镶嵌宝石、亮斑、虎皮斑、精细透雕、火焰纹、菱形纹等多种装饰技术和纹饰，同时还出现了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和表面合金化技术。所谓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它是不同于二次铸造或三次铸造的一种新工艺，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合金冶炼技术方面的重要创造，其工艺过程大致是先浇铸含铜量高的剑脊，然后再浇铸含锡量高的剑刃。因为铜的熔点高于锡，按熔点高低依次浇铸，既不会使先浇铸部分熔掉，又可将两部分复合为一体，使剑刚柔相济，既坚韧有加又锋利无比。表面合金化，则是一种通过扩散改变基体金属表面层的成分和组织的材料保护技术。在现代机械制造中主要应用铝、铬、硅、钒、锌等表面合金化层或渗层等技术在基体表面形成一种保护层，防止基体金属被腐蚀的一种技术。

被誉为“中国古代兵器之王”的越王勾践剑，于1965年12月出土于湖北望山一号楚墓，出土时插在木质剑鞘里，出鞘时寒光四射，耀人眼目，锋利无比，令人赞叹不已。越王勾践剑就是一把采用复合金属铸造工艺制作的青铜剑，它的主要成分有铜、锡以及少量的铝、铁、镍、硫组成的青铜合金。而剑刃的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代在精密磨床上生产出的产品相媲美。由于其剑身的各个部位作用不同，使铜和锡的比例也不一样。剑脊含铜较多，能使青铜剑韧性良好，不易折断；而刃部含锡量高，硬度大，则会使青铜剑更为锋利。此外，这把剑的含铜量约为80％-83％、含锡量约为16％-17％，还有少量的铅和铁，这可能是原料中本来就含有的杂质。

此外，考古学家还证明在湖北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像越王勾践剑这样千古不锈、湛亮如新的还有多把；但奇怪的是，与青铜剑相比，钢铁剑却更容易锈蚀。迄今出土的、比越王勾践剑时代晚上几百年的西汉铁剑，全部是锈迹斑斑的。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呢？专业人士通过对东周时期一块菱形纹饰剑残段进行分析测试发现：在剑的表面规则地分布着一层厚几十微米的细晶层，该层的成分和组织与基体完全不同，有较好的耐蚀性，能保护基体不受腐蚀。据此，经过工艺筛选，模拟古代可能有的工艺——膏剂涂覆法，成功地复制出了有细晶区的菱形纹饰剑，并参照埋藏条件作加速腐蚀试验，使菱形纹饰由黄白相间变成与古剑相似的黑灰相间的色泽，其成分、结构等亦与古物相似，从而不仅解开了“千古不锈”之谜，同时这也表明我国早在约2500年前已经掌握了一种特殊而精湛的表面合金化技术，使得青铜器表面既产生装饰效果，又具备防腐蚀功能。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

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与甲骨文同样为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是华夏文明的瑰宝。它不单单是判断青铜器年代的最重要标准，更是器物形制及纹饰方面的标准。青铜器铭文在商周时期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为历代研究书法的人们所重视。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青铜器的铭文因为具有极其丰富而确凿可信的史料价值，而显得十分珍贵。古人往往将国家或宗族的大事铭刻其上，并且表现形式多样化。

第一节青铜器铭文的产生与演变

铭文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也有很大的关联。中国文字在夏代的晚期就已产生，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铭文。考古发掘的二里冈遗址、盘龙城墓葬，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遗址和墓葬，出土了许多没有带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是中国的文字尚处在早期阶段，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较原始的缘由。铭文是按照墨书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的精湛，铭文字迹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我们所讲的青铜器铭文的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实际上也是商周时期墨书的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总的来讲，我国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经历了简铭期、长铭期以及衰退期。

一、铭文的简铭期

铭文产生的商代早期，只有个别传世青铜器上有铭文发现。商代中期，随着盘庚迁殷之后社会局面的稳定，青铜器铸造业和甲骨卜辞的书契迅速发展起来，青铜器铭文的铸造在以上两个有利的条件下逐渐兴盛起来。虽然这个时候的铸铭青铜器增多，但青铜器上所铸的铭文字数不多，一般为一字、两字，四、五字算得上是少见的。这种态势发展到殷末，字数还没有超过五十字，数十字的也仅有几例，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简铭期”。

商代铜器铭文的内容也较简单，一般不含重要意义。铸铭的目的主要是标记器主的族氏，器物的名称、用途、使用的地点等，一般都铸在器物不显著的部位。如“戈”、“天”、“子渔”是标记铸器的氏族或铸器人；“父乙”、“母丙”是表明器为祭祀父乙或母丙而作；“寝小室盂”则是标识存放地点和使用场所。但更多的内容是表明礼器制作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在宗庙里的称号。例如：“（子）父乙”，“子”是作器者族氏，“父乙”是被察者（其父）的庙号。铭都铸在如爵、斝的鋬阴，尊、觚的外底，鼎、甗的内壁，簋、卣的腹底等隐蔽之处。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2）

商代晚期，金文书体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明显，被称为“波磔体”，而且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在目前发现共十几篇。例如小臣俞犀尊，内底有27个字的铭文：“丁子（巳），王省夔，王易（赐）小臣俞夔贝，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这篇铭文讲的是商王在丁巳那天巡视夔地，在途中用夔地的贝赏赐小臣俞。“丁巳”大概是在商王（帝乙）十五年征伐人（夷）方举行肜祭的时候，所以这段内容讲的应该是帝乙（纣的父亲）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史实的一部分，为研究商人和东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

总的说来，商代青铜器铭文大体可以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形体丰腴，笔势雄健，笔划的起止多显锋露芒，间用肥笔，其代表作品是司绩戊鼎铭和小臣俞尊铭，为以后的书法演变趋势奠定了基础；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虽瘦，但笔划多挺直劲美，不露或少露锋芒，肥笔甚少，与第一种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书体显得遒美挺拔，代表作品有戍嗣子鼎铭。

二、铭文的长铭期

西周是青铜器铭文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周人比商人更加重视礼制，随着铸铭之器骤然增多，铭文的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不仅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的书体风格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铭文的性质、内容、形式、数量等方面，都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中，有着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情况的重要资料，如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政治动乱、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以及家史、婚媾等等内容，具有明确的书史性质。这些可贵的资料可以起到证信古史、补苴史书缺佚的作用，而且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及上古语言文字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长篇书史铭文的增加，所以这个时期称为铭文的长铭期。

周代青铜器铭文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这是和周初时巩固统治地位和加强礼制建设的政治目的相关联的。作器铸铭，说到底其本质上也是礼的体现。他们利用大量铸以长篇铭文的青铜礼器，来颂扬祖德，刻纪功烈，记述周王赐命，传遗子孙后代。出土的青铜器中，用何尊、大盏鼎等记述贵族们接受周王的训诰和册命典礼的长篇巨制，屡见不鲜。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强调奴隶主贵族权威的形成，二是宗法制度的加强。西周早期的贵族大多因为是辅助文、武王伐商灭纣而有功于王室，随着周朝的建立，他们也被封侯授爵成为周的大权贵。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3）

他们为了长时间地拥有这种能显示其地位和职务的优势，于是就把自己的功劳或祖父辈对王室的贡献以及周王的赐命铭文，铸刻在青铜礼器上。另外，宗法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周人维护其内部稳定、巩固和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西周时代，王臣都是世官，靠祖先的荫庇获得地位和特权。他们在青铜器铭文和祭祀活动中，追述祖先的功烈，告祭自己的荣誉，都是为了加强自己在其宗族体系中的地位。正如《礼记·祭统》上说的“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为了便于阅读，铭文多铸在容易看见的器物内底等明显部位；出现了比较固定的语句体例和用辞，颇为一致的格式和写法；在铭文读法和阅序上，已形成了从右向左或顺时针的读览定规。

从铭文书体上看，商代晚期和周初的书体常用“波磔体”：笔画粗大，间用肥笔，起止锋芒尽显。字体结构方面也有其特点，如宝、宗、室、家的“宀”头两边斜行方折，或作形如侧视的屋顶的四笔书写；“贝”字的下两划在内部，相对向上或相连；“障”字所从的双手奉酉形，酉字上两竖划不出头；“其”字上两划与两侧划垂直；“于”字一般作繁体“”；“保”字上从“玉”；“文”字中间有心形；而文王、武王的专用字“文、武”多从“王”旁。

西周早期的书体可细分为三种不同的风格。

第一种风格是瑰异凝重。书法凝炼奇古、雄伟挺拔，结体使用肥笔，起止不露锋芒，字的大小因体而施，显得非常得体。以成王时期的何尊、康侯簋和康王时期的旗鼎、大盂鼎铭文为代表。大盂鼎铭共19行，291字，其铭文大字，端庄卓伟，瑰丽通奇，是成康之世铜器铭文中书法造诣最高的一品，它的拓本、摹本至今尚为书法大家所珍视。它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去克殷建邦，以及殷人朝野酗酒酿成丧师亡国的教训。

第二种风格是雄奇恣放。有的遒劲中略带华丽，行气比较自由；有的则书写随意，不受通常严谨格局的束缚。从人形或以人、卩、斤、矢、页等为偏旁的字，以及有人肢体形状的象形字，都用肥笔突出描绘其形态，波磔现象也非常明显，故书法家称其为“波磔体”，是继承商代末期书体风格发展而成的。其他像王、炎、十等字也用肥笔。在一篇铭文中相同的字写法多不雷同，在其提捺轻重、形体大小等方面着意进行变化。这种铭文典型的作品有成王之世的保卣、康王之世的作册大方鼎、昭王之世的召卣和令簋铭文。

第三种风格相对前两种来说是质相平实。字体平易古朴，结体不用肥笔，不露或甚少露锋。在西周早期这种书体为数不多，但它朴素大方、书写便捷的特点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代表了书法演变的方向。器上的铭文以武王时期的利簋和天亡簋为代表。

西周中期的铭文与西周早期有着很大的区别：流行无波磔、两端平齐似圆柱的玉柱体，亦称“玉箸体”。这种铭文字体规整，横竖成行、行款舒展、纤细柔美。有的还在范上划好方格，再在格内填字。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4）

西周中期铜器铭文向书写方向发展。穆王时期的许多铭文还保留着肥笔首尾出锋的现象，比较接近“波磔体”。共王以后完全脱离了早期的端严谨持的作风和凝重通奇的气氛，而慢慢形成了一种笔道柔和、字划圆浑的风格。字体结构方面，中期前段的穆王时期，“王”字下部显肥大；“宀”头两侧略有弧度地作锐顶耸肩；数字一至四的横笔前粗后细；“其”字头上仍作平笔；“”字的酉字上部的两竖笔多出头；“贝”字下两笔或在内或移在左右两笔的顶头；“于”字不再有“”形。共王时期的“公”字上两笔有的与口字分离。中期后段的“王”字下部肥笔不明显，甚至是没有；“宀”头均作弧肩圆折；“贝”字下两笔移到外边，或封口或不封口；“其”字顶上的两笔向两边斜杀；“”字所从的酉字上两笔由出头变成八字形，与口字分离，口字变圆或扁圆。

西周中期铭文的书体风格也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存有西周早期的特点，即肥笔在字迹中依稀可见，运笔舒展，字体间架亦较自然，但早期那种瑰异雄奇的风格已经消失。以穆王之世的鼎、簋、登尊、登卣和庚嬴卣铭文最为典型。

第二类就是书法家所称的“玉箸体”，是西周中期最流行的铭文书体。其风格质朴端庄，笔划无波捺，两端平齐似圆箸，它出现在共王时期，一直沿用到春秋中期。共王之世的墙盘、永盂、卫盉，懿王之世的师虎簋，孝王之世的大克鼎等铭文，都是这类铭文的卓越者。墙盘是共王时史官的礼器，铭文古奥典雅，字体朴实遒美，行款疏朗而整齐，笔势圆润而厚实。卫盉铭文运笔刚柔得宜，行款错落有致。大克鼎铭文字形长方，纵横有界格，每格一字，共28行290字。

第三类书写草率，结构松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穆王之世的伯鼎、伯簋，共王十五年趞曹鼎等铭文。趞曹鼎铭文不但字体草率、行款疏放，而且不到60字的铭文竟有3个衍文。

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的字体趋于规范，“王”字横笔划粗细均匀；“其”字头上的两笔斜杀，且出现了“丌”的写法；“宀”头行笔圆滑；“贝”字下部封口。

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的书体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字迹工整，书写便捷，笔道圆润，结构和谐。这种书体是中期第二类铭文风格的延续和发展，是大篆最成熟的形态。以厉王簋、钟和宣王之世的毛公鼎铭文最为著称。簋是王室重器，铭文字形是西周晚期王室所使用的标准书体，比大克鼎的铭文更加厚实壮美。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5）

第二类书法刚劲，笔势匀称，纵横成行，求工有意，字迹遒通茂隽，颇具崭新的艺术风格，即书法爱好者所说的籀文。春秋时期的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以及石鼓文等都与这种书体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以宣王之世的虢季子白盘铭文为代表。

第三类与西周中期的书写风格相似，可以断定是从那时演变而来，其间架松散、书写草率，代表器物铭文是1975年陕西岐山出土的“此簋”铭文。

春秋时期，由于周室东迁，五霸兴起，各自为政，周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分散到列国诸侯之手，铭文因此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性。其内容一般多为联谊婚姻、夸耀祖先之类。

西方秦国的文书体有着浓厚的宗周色彩，是因其在周人故土上的发迹，直接继承了周文化。春秋早期秦人即在宣王时的籀文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既富有观赏性，又有实用价值的新字体，其特点是方正瘦劲，书写方便。该书体的典型作品为宗妇鼎、秦公钟和秦公簋铭文。关东诸国则沿用西周晚期的大篆书体，变化较少。

南方诸国的青铜器铭文流行一种与东方不同的修长书体，系当时的书法高手所为，绝非一般书吏的手笔。有的笔画故作弧曲，书写松舒，如曾侯乙钟铭文；有的笔画纤瘦、书写随便，渐开草篆之端，如王孙诰钟、吴王光鉴铭文；有的字体修长、笔道刚劲、纵横成行、工整隽秀，如蔡侯尊、蔡侯盘铭文。春秋末年还出现了以鸟兽虫作为装饰的美术字，即所谓的鸟虫书。这种书体一直流行到战国前期，奇诡多变，极难辨释。代表作品有王子午鼎、越王勾践剑、王子于戈等铭文。

到了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青铜器铭文异体朋兴，千姿百态，蔚为大观。黄河下游的齐、鲁、中山、徐、许等国盛行细长之体，文字繁简并用，书法清新秀丽，代表作品

有素命镈、许子妆簠、王孙遗者钟等铭文；有笔划两端纤锐如针者，如陈曼簠铭文；有字形加装饰性肥笔者，如者钟铭文；有的犀利隽美，继承了素面镈铭文的优美形体，又吸收了陈曼簠铭文两端纤锐的特点，以及鸟篆的装饰艺术，如中山王鼎、壶铭文。

三、青铜器铭文的衰退期

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衰落，礼制开始崩溃，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铭刻的目的终于转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上去了。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长篇大作不多，书史性质的铭文就更是少见。铭文的格式、内容，以至于刻铸方法、书法艺术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文字应用日渐广泛和携带方便的需求，铸刻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最终被当时通行的简册书帛所取代。

第二节青铜器铭文的格式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6）

根据考古资料表明，青铜器铭文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以后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模式。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铭文格式一般比较单调和固定；西周早期铭文没有统一规范的格式；西周中晚期，程式化成了铭文布局的特征之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有了一定体式比较自由的记述。把青铜器铭文的格式归纳起来约有12种，现分别叙述于下：

1 徽记

青铜器上铸造铭文的最初格式就是徽记，其作用是为标识器主。徽记分为繁与简两种形式。简式只刻画有作器者的族徽，或记录作器者的族名、官名、私名，如“妇好”，多见于商代，周初发现渐少；繁式出现在商代晚期，主要流行于西周时期和春秋早期。繁式既有作器者的称谓，又有叙述语，以标明器名、用途、存放地点等，如“伯作鼎”、“吏从作壶”、“中作旅簋”、“帝小室盂”等，有的还有传遗子孙后代的期冀吉语，如“虢叔作施旅鬆，其万年永宝”等。繁式里还有省掉作器者称谓的，如“作旅鼎”、“作宝用簋”等。

2 祭辞

祭辞是指纪录祭祀的格式，也有繁简之分。简式记被祭对象的名字，如“父甲”、“母戊”、“祖己”等，流行于商代晚期到周初，繁式流行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繁式记录得比较多一些，如祭祀者族名、私名、官名、祭祀对象及器名等。有族或族名者如“戈父己”（鼎铭），有私名者如子申鼎铭“子申父己”、卫簋铭“卫作父庚宝尊彝”，有官名者如小臣壶铭“小臣作父乙宝彝”。作器者私名、族名、器名和被祭对象具体者如陵罍铭：“陵作父日乙宝罍。单。”

3 册命

册命制度最早见于西周初期，穆王时期以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典礼仪式。册命这套仪式在青铜器铭文中已经成为一定的礼制。册

命铭文的格式主要包括时间、地点、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西周晚期册命格式最为完备，除了上述基本部分外，还有记录王位、授册、宣命、受册等部分，在册命辞里还有命官、赏赐、勉励三个内容。

4 训诰

春秋时期金文未见有纯粹的训诰词，战国时期仅见中山王鼎等器，西周时训诰才成为铜器铭文中常见的格式。典型的训诰文格式包括时间、地点、受诰者、诰辞、赏赐、作器等部分。毛公鼎铭所记载的诰命，最后部分还有称扬辞和祝愿辞，但没有时间和地点。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7）

5 追孝

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都非常重视祭祀祖先，尤其周人更多地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来夸耀自己祖先的业绩，颂扬自己祖先的美德，以此来行孝道，表现祭祀祖先的热情。《诗·大雅·文王有声》上所说的“聿追来孝”，说的就是要保持其世家的尊荣地位，永世享受其特权。西周至春秋早期有很多的追孝铭文，但相当一部分是在册命、获赏作器铭文之后连缀上一段追孝辞和祈福辞。也有例外，单独为追孝作器的铭文，比如墙盘铭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颂扬周王朝诸先王和当代天子的功烈；后半部记述其祖考的业绩：高祖为微国君主，武王灭商后归周，始受周封，乙祖辅佐成康，受到重用，亚祖在周廷任要职，参与王的政务活动，父亲善法孝友，继承其祖辈事业；最后是自赞和求福之辞。

6 约剂

约剂，即古代用作凭据的文书、契券。

《周礼·秋官·司约》：“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于是有所谓“治民之约”和“治地之约”。这些事情都是与个人和家族的财产权利有关的大事。“治民之约”是有关税收、贸易、讼事等内容；“治地之约”是有关土地的使用、拥有、分配和转移等内容。

7 律令

律令是属于约剂的一种，但它是政府的法律条令，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兮甲盘铭记：关市之征，对南淮夷和诸侯百姓都有相应的规定。

8 记事

记事类铭文数量最多、题材丰富、格式随便，有记功、获赏、从征、出使等，盛行于西周。

9 符、节、诏版

属于非彝器的铸铭有兵符、节、传、诏版等等。虎符是古代国君遣将调兵的信物；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颁给鄂君启运输货物的免税证件；秦诏版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10 媵辞

青铜器中除礼器外，还有一部分充当陪嫁品的媵器，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中。当时诸侯大夫们往往通过联姻，来增进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护彼此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另外，小国为求得大国的保护，组成一定的政治集团，也往往采取这种形式，故媵器大量出现。媵辞格式简单，一般由时间、某人为某人作媵器及祝愿辞三部分组成。

11 乐律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8）

西周时期，乐律名称的内容被记载到部分钟上，如南宫乎钟铭有“兹钟名曰无敦（无射）钟”。宋代著录的楚王章钟有标音铭文“穆商”。最著名的要算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曾侯乙钟，其音律铭文可分为标音铭文和乐律铭文两部分，共2800余字。标音铭文，简称音铭，它标明了每钟所击鼓部和鼓侧的音名，如宫、商、角、徵、羽、宫曾、羽曾等。乐律铭文就是列举了春秋战国之际楚、晋、周、齐等国以及本国本地的各种律名、音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关系，是研究我国先秦乐律和音乐史的重要材料。

12 物勒工名

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特点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物勒工名的铭文格式常见的包括器主，铸造作坊的职官、工师、工匠，一少部分还有器物置放地点、容量和重量等情况。

第三节青铜器铭文的内容

青铜器铭文之所以为许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所重视，是因为其中还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可以为研究历史、发展科学所用。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初序中写到：“传世两周彝器，其有铭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彝器除少数伪器触目可辨者外，则虽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迹也，是其可贵，似未可同例而论”。青铜器铭文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1 政治事件

记录重大政治事件是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之一。周人灭商，无疑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利簋铭文仅用32字就记录了甲子日伐商纣以及当天的天象。

2 军事活动

东郡虎符

铭文也有很多是反映军事方面内容的，常见的有对鬼方、东夷、南淮夷、楚荆、虎方的征伐等内容。《易·既济》所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早在商代已存在，是活动在陕北高原一带的方国。这句话的内容就是关于商王武丁时期对鬼方的战争。不仅是商朝，其实在西周早期，与鬼方也发生过战争。从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康王二十五年所作小盂鼎就可以看出来。小盂鼎的铭文上清楚地写着与鬼方战斗后的情景：在征伐的过程中，第一次就抓获鬼方首领3人，杀死4800人，俘虏13000多人，缴获战车30辆，获牛355头，羊38只，第二次又取得了收获颇多的辉煌战果。班师回朝之后的他们还在宗庙进行献俘、燎祭等仪式以谛祭文王、武王、成王。此外，铭文中也有对叛乱的诸侯国如噩（鄂）国的征伐描述。

3 经济活动

在岐山董家村发现一座西周窖藏，出土青铜器37件。其中的卫盉铭文记载了西周中期有关土地转让和买卖的情况，这为研究西周中期的土地制度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9）

4 王朝职官

《周礼》中有很多周代官制的内容，书中描述的周代职官系统已经很繁杂。但因《周礼》成书于战国晚期，其中官制可能不一定与周代尤其是西周时期的情况相符，大量周代铜器铭文十分详细地记载了封侯封王以赏赐个人功勋等情况，因而成为探讨周代职官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5 礼仪活动

与礼仪方面有关的铭文很多，如记载册命礼的铭文，也就是记录王即位、分封诸侯、任命官职等要举行的典礼。盠方彝器铭文就记载了册命的全过程。

6 婚姻制度

青铜器铭文中有婚姻方面的记载，最常见的就是媵器上的铭文了。媵器，即为女子出嫁而作的铜器。媵起源很早，文献记载帝尧妻舜二女，虞思也妻少康二姚。《易·归妹》：“归妹以娣”，“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周代还流行一种媵制，即一女出嫁，又以其娣或侄女陪嫁；一国诸侯嫁女，还可以其他同姓甚至异姓的两个诸侯国的娣或侄女陪嫁。

附：中国出土青铜器之最

1 最整齐的全套铜编钟

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发掘的曾侯乙墓内，出土了非常完整的全套铜编钟。这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数量最多、重量最大、音律最齐的一套编钟，是我国文化艺术的瑰宝。这套编钟名叫曾侯乙编钟，全套编钟的总重量2567千克，共65件，出土时分3层悬挂在钟架上，最大的一件甬钟高152 3厘米，重203 6千克。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每件钟有两个发音，并呈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其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中层编钟共有3个半八

度，12个半音齐备，音域宽广，音色优美，且有变化音，能旋宫转调，演奏中外歌曲。它的出现，将我国音乐史上七声音节的发现至少提前了400年。

2 现存最大的青铜器

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件青铜器是司母戊鼎。它是1939年3月在河南省安阳县武官村出土的。

战国早期·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

它自鼎足至立耳通高1 33米，器口长1 1米，宽78厘米，重达875千克。方唇，上有一对立耳，深腹，下部微收，平底，四柱足，足内空。腹面四周边框饰古代（商周时期）习见的兽面纹。上下边框中间有短扉棱。鼎足上部也饰兽面纹，并有扉棱。整个形体雄浑凝重，结构严谨，造型大方、精致。在鼎腹一侧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排列成品字形，笔势劲健，因此称之为司母戊鼎。但古文字学家多认为“司”字应释读“后”字，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后母戊鼎。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0）

1939年，司母戊鼎被当地村民挖掘出土后，恐其被外人掠走，又重埋于地下，直到1949年6月第二次安全出土，可惜出土时已失去了一个立耳。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的司母戊鼎有一个立耳是修复时照着另一个立耳铸成安装上去的。据考古学家考证，这是一件武丁之子商王祖庚时期的彝器，距今已有3000多年了。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也是世界各地青铜时代文化中少见的大器物。

其实像这样大型的青铜重器在我国出土的远远不止此一件。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内还发掘了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墓内出土了一对司母辛方鼎，通高80多厘米。这一对方鼎的形状和司母戊鼎十分相近，前者仅仅小了一点，鼎内所铸铭文的字体也很接近。

3 唯一的商代人面铜方鼎

1959年，长沙宁乡出土了一件商代人面铜方鼎。该人面方鼎通高38 5厘米，器身高16 6厘米，作长方形，底口唇卷边略小于口，内唇沿斜削。竖耳，耳高7 3厘米。圆柱足，足高14 6厘米。器身装饰为浮雕的四个人面，前后两侧的较大，宽16 4厘米，高13 6厘米；左右两侧的较窄小，宽是13 8厘米。该鼎的耳上部有一云勾纹，耳下部有一弯曲的手爪形纹饰。除了耳较粗大，张扬于两侧，人面五官比例和布局与现在一般面部并无差别，十分准确。面部表情严肃，面宽而方，嘴大而宽，唇部突起，颧骨高耸。专家根据方鼎的造型、纹饰和鼎内侧面中部口处有篆体铭文“大禾”两字等特点，确定其反映出浓厚的商代青铜器风格，大约是商晚期制造的。

早从新石器时代起，这种用人面或以人面为主作装饰的青铜器就有不少。而人面方鼎是用四个人面作为主要装饰的铜器，是目前见到的唯一一件，在历代商周金石图录中都没有类似的著录，足见这是一件稀有的珍贵文物，现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

4 现存仅有的商代铜象尊

1975年2月，在湖南省醴陵县仙霞乡狮形山的山坡上，人们挖土植树时发现了一件铜器。经专家鉴定，这是一件商代晚期的铜象尊，是现在所见到的唯一的一件商代象尊。铜尊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之一，盛酒。这件铜象尊出土在距山顶10米多的山坡上，埋在离地面15厘米左右土内。经实地调查，周围没有再发现其他器物。根据象尊出土的位置和有关情况分析，这件铜象尊，很有可能是当时统治者祭祀名山、湖泊、河川时掩埋的祭器。

这件铜象尊，通高22 8厘米，宽14 4厘米，长26 5厘米，重2 775千克。出土时已经没有盖子，右耳也是残缺的。尊上象的前额扁平，嘴部向前突出，象牙露出口外，短颈，眼、眉都突起，大耳，长鼻。鼻有向前上方伸的趋势，鼻下端有作为装饰或者别的用途的嵌铜痕迹。鼻端有孔，与腹部相通。背部有椭圆形孔，躯体肥大，臀部出棱，尾下垂。四肢粗壮，足有五趾。象尊的花纹装饰精致且繁缛，就拿长鼻上的纹饰举个例子，象尊的鼻子整个装饰得宛如凤鸟：鼻端作凤首形，凤冠上伏一虎，虎口又衔蟠虺，鼻下端构成倒悬的蟠虺，形态生动逼真且不失华丽。

5 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1）

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是毛公鼎，它是清代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存生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其内壁铸有多达499字的长篇铭文，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毛公鼎是一件不大的圆鼎。它的形制是立耳、深腹、圆底、蹄足，其口沿下饰以一道重环纹，下加一道弦纹。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此鼎是西周晚期的器物。它具有当时流行的朴素无华的风格，和晚商到周初的繁缛风格完全不同。

鼎的壁内铸有长篇铭文，共32行，计499字。仔细观察，每字间都有方格相隔，这是因为当时的工匠们为使得全文行笔从整体上来看都十分规整漂亮，便先在范上刻划出格子，再写文字。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和文化氛围，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铭文主要记载周王对毛公册命的内容。首先简短介绍了周宣王追述周文王、武王创业功绩；其次讲到当时周朝遇到的祸患，于是周宣王在局面混乱的情况下对毛公委以重任，命他管理王朝重大事务；最后详记了周宣王对毛公的各项赏赐，及世世代代将此永记不忘以传后人。清咸丰二年由山东潍县著名收藏家陈介祺收藏，以后辗转流传，现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内。

6 现存唯一完整的战国铜人像

1964年12月，河北省易县武阳乡高陌村在村东的燕下都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铜人像。这件铜人像保存完好，全身布满一层浅绿色薄锈，身高25 8厘米，通宽13 05厘米，前后通宽11 9厘米，重4 9千克。该铜人面部丰满，修目阔鼻，口角向上，颜面微扬，颧骨较高。头顶一巾，前窄后宽垂于脑后，自头顶以带压住系与颏下，有红色八字形带结，前额头上发分左右向后梳，发纹尚清晰可辨。人身直立，两臂

前伸拱持一筒状物。根据造型，可知这件铜人像不是作为随葬品墓佣之类，而是实用器物上的一种构件。铜人手持的筒状物，可能是用来插入物件的。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铜人的服饰。他身着右衽尖领窄袖长袍，下垂至地面而不见足部，衣纹生动自然。后领口作方形，后颈及背上部袒露于外，衣领、衣边角均涂朱色，身围腰带也作朱红，腰带间有长条形圆头带钩连接腰带两端。

7 最大的一件铜犀尊

1963年在陕西省兴平县豆马村北断崖上，距离地面深约1米左右发现了一个灰色的大陶瓮，瓮内出铜器、铁器、陶器、石器等24件。其中有一件嵌金铜犀尊相当引人注目，是迄今所见到的最大的一件铜犀尊。我国古代用动物形象来铸造铜器的种类很多，但是以犀牛形象制作的青铜器是很少见的。这件铜犀尊的造型、纹饰和制作技艺与战国末期遗物相似，应是秦文化的遗物，距今已有2200多年。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2）

这件嵌金铜犀尊是一件精美酒器，高34 4厘米，长57 8厘米。口的长径为11厘米，口短径10厘米。该铜犀尊遍体嵌金作流云纹，犀牛整体造型肥壮，观其形象似属非洲犀一类。犀有一前一后两只牛角，为鼻角和额角，鼻角长而额角短。两耳短小而耸立，嵌以黑色料珠的双目炯炯有神。尾尖稍翘，短腿三瓣蹄，显出几分精致可爱。合口，左侧伸出细管做流。犀背部有椭圆形的尊口，上覆的铜盖有活环可以打开或关闭尊口。

8 现存最早的铜鼓

1975年，在云南省楚雄市万家坝古墓群中的第一号和第二十三号墓内，出土了五件铜鼓。这是迄今为止科学发掘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五件铜鼓，也可以说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铜鼓了。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这些铜鼓应是战国时期的器物，距今已有2300多年。该铜鼓器身像釜，表面都有烟痕，说明这批铜鼓曾作炊事之用。而且一号墓内同时又出土了利用铜鼓改制的铜釜，足以证明本地的铜鼓不但是从釜发展而来，并且尚停留在乐器、炊器分工不十分严格的初期阶段，这对于研究铜鼓的起源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套铜鼓，每一件都胴、腰、足三段分明，胴部突出，内收成腰，再外扩成足。胴、腰交接处有4个对称的条形耳，鼓面较胴部为小，中央有突起的光体。五件铜鼓都是用两道合范铸成，其中最大的一件，面径有48厘米，胴径64 5厘米，足径68厘米，通高39 5厘米，腰部有16根垂直凸棱，腰与足相接处有一圈斜角重环纹，鼓内壁有两组双连云纹。

9 最奇特的古代铜鼓葬具

1972年，在广西西林县发现了一座形制非常特殊的古墓。在距地面深约0 6米处，有一块圆形的石板盖住墓口，掀开石板，下面平铺着12块大小不等的石条。石条下面是略作圆形的墓室，直径1 5—1 7米

不等，深约2米。室内放着互相套合的四件铜鼓。这是一种奇特的葬式，考古工作者称为“铜鼓葬”。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葬式还没有发现第二起。据考古工作者的鉴定，认为其形制和纹饰都同西汉早期铜鼓一样，应是西汉初期的器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铜鼓内的骨骸，经过鉴定，死者是男性，25岁左右。从骨骸堆放情况来判断，这是“二次葬”。二次葬是大葬，入葬仪式比初葬时还要隆重。这种特殊的用四件铜鼓互相套合的葬具，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古代习俗的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四件铜鼓两大两小，互相套合有序。最下面仰放的是一件完整的大铜鼓，面径72厘米，高50厘米，足径82厘米。在大铜鼓里，又仰放着一件小铜鼓，面径41厘米，足径56厘米。这件小铜鼓里盛放人骨，人骨的四周穿线早朽，珠子全散在鼓底，由此可知人骨原本是用珠襦包裹的，因为年代久远而腐朽了。在仰放的小铜鼓上顺盖着一件同样大小，但锯掉下半部分的只剩鼓面和胸部的小铜鼓。在整个三件铜鼓外面，套扣着一件已锯成两截的大铜鼓，其面径78厘米，高51厘米。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3）

这样，在墓葬考古中的棺具椁室之分就轮廓分明了：在大铜鼓里面的上下盖合的铜鼓似作棺具，外面套合的两件大铜鼓似作椁室。这种内棺外椁的葬制，在古代是较为讲究的。作为椁顶的那件大铜鼓被锯成两截，估计先套合时，因里面相盖的两件小铜鼓高度超过了外套的大铜鼓本身高度，套不到底，便被锯成了两截。等锯成两截后，又发现下半截虽能套到墓底，可是与上半截之间还有空隙，露出里面的小铜鼓，才又将作为棺盖的小铜鼓锯去下半部，在套扣时就严密了。该铜鼓现陈列于广西自治区博物馆内。

10 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器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我们的祖先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年）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专家认为这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

11 中国最早的古铜镜

铜镜起源于齐家文化时期，距今有4000多年，是人们的照容生活用具。早期的铜镜形式简朴，很少的一部分有简单几何纹饰，大部分为素镜，并且这样的铜镜为少数贵族所专用，存世量少，所以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我国已发现最早的铜镜为“齐家文化复式多角星纹镜”，圆形，直径14 6厘米，弓形钮，无钮座，镜面微凸，有纹饰，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12 我国最早的人工铸造金属取火铜具

陕西省扶风县周原遗址黄堆的一座西周中期古墓中，考古学家清理出一件已生满翠绿铜锈，呈圆形的青铜凹面镜，距今已有约3000年。其直径8 8厘米，厚0 19厘米，形状与现在的圆形太阳能灶相仿。文物考古专家鉴定后认为，这就是古人用以取火的“阳燧”。经西北光学仪器厂测定：其曲率半径为20厘米，是标准的球面镜。它是迄今为

止国内发现最早的人工铸造金属取火用具，是我们祖先能够较早利用太阳能的最好例证。在太阳的强光下，最快只需三、五秒即可将放置在其焦点处的易燃物引燃而产生明火。

西周·虢季子白盘

13 被考古界誉为“金文之最”的青铜器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4）

这件被考古界誉为“金文之最”的有长篇铭文的西周遂公须皿经国内文物专家鉴定，是西周中期某代国君遂公所作的青铜礼器，距今已有2850年历史。它是被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上偶然发现的。当时盖已失，只存器身，其大半为土锈所掩，显露出的部分铭文字体优美，行款疏朗，深奥难懂。礼器的表面装饰一圈凤鸟纹带及瓦绫纹，口两侧设一对兽首形耳，装饰简洁而典雅，具有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典型风格。其内底上铸铭文10行，共98字。我国的文物专家表示，该件国宝之谜的破解是新世纪以来青铜器铭文中最重大的成果。在中国已出土的万篇先秦青铜器铭文中，大多是标识器主、纪述功战婚嫁等事件，而这件国宝的铭文既非记名，亦非记事，而是一篇专门论述“德治”的政论。铭文开篇即写道：“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记述了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的故事，随后又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实乃前所未见，闻所未闻。

14 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

清代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虢季子白盘，在兵燹中遗失。后来，淮军著名将领刘铭传发现其因形体巨大的长方形特殊造型而被当作马槽安放在马厩里，即将此器运回老家安徽合肥收藏，虢季子白盘从此在世上销声匿迹了1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人将这件国宝捐献给国家，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长达137厘米，铸有111字铭文，铭文的内容记录了周人抗击匈奴的一段史实。

15 动物形卣最特殊的虎乳人卣

商晚期·虎食人卣

虎食人卣是动物形卣中最特殊的，这种卣目前仅发现两件：一件现在法国巴黎池努奇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1998年曾在上海举办交流特展；另一件被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虎食人卣全器似猛虎

踞蹲形，以虎尾和一对前爪为器物的支撑点。令人惊奇的是：该器乍看上去虎面狰狞，张开的大口内含人首，强劲的前爪攫一断发跣足的人。正是由于该器似乎令人怵目惊心地表现了虎口吞人之像，一直被不少名家定名为虎食人卣。但有的学者就把该器定名为虎乳人卣或乳虎卣，认为该器是虎正蹲踞着哺乳小孩的造型和意境。虎乳人卣与虎食人卣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完全表达了相反的意思：一是虎吃人，一是虎养人。《庄子》讲到虎与人的关系时说如果人善待老虎，老虎也就会顺从人意。意思就是人无害物之心，物无伤人之意，描绘了一幅和谐相处的人兽关系图，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左传》中提到了楚国的子文，在小的时候曾被其外祖母遗弃于云梦泽，后来因为受到老虎的哺乳而未死，后来还当上了楚国的令尹。其实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我国历代都有人虎异类生情的故事。比如宋代洪迈在《夷坚志》中写道：一个妇人从福建罗源鹳坑村岭上路过，见一虎蹲踞草丛，就停下来对虎说："斑哥，我今天省亲回娘家，我与你无冤仇，你快离开。"虎听后马上拖着尾巴往险要处走开了。到底是虎乳人卣还是虎食人卣呢？那就要从以后的考古发现中索取答案了。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5）

16 世界铜鼓之王

广西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被誉为“世界铜鼓之王”的巨型大鼓。铜鼓早在春秋时代既已出现，此后延续到明清时期以至现如今。这个铜鼓面直径最大的地方达到了165厘米。这种鼓是平置于地上敲击的，它的使用范畴很广，可用于祭祀、赏赐、贡纳、娱乐等活动。

17 我国先秦时代最高的铜质造像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立人铜像，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高的铜质造像。它通高2 62米，重约180千克。该铜质造像体态优美，庄重严肃；头戴高冠，丰目大眼，鼻棱突出，嘴角下勾，方颈大耳；身着长袖，双手平举起，作持物状，赤足站在方座上。有人说他手握的该是有沟通人神天地意义的琮。

18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洪钟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洪钟是已流入日本的陈太建十年（575年）钟。该钟的钟体为圆筒形，上部略收缩，口沿平直。外壁中部偏下铸出两个饰以莲瓣的撞座，以撞座为中心用凸起的阳线隔成十字形方格纹，十字形之外的空间再用短横线加以分割。这种纵横有序的方格近似僧人所着袈裟上的图案，故名袈裟纹。钟顶部则有两端饰龙首的确钮，名蒲牢。

19 熏炉中品类最高的宣德炉

宣德炉是明朝宣德年间的官铸铜器。因其铸造于明朝宣德年间，顾名思义，称为“宣德炉”，亦称“宣炉”，是当时宫廷焚香祭祀的专用器物。宣德炉之所以作为明代著名的工艺品，是因为它是以历代各类名器形制为蓝本仿照制成的，而非出于臆造。据《宣德鼎彝器谱》的记载，宣德皇帝曾命吕震等人参照《宣和博古图》和《考古图》诸书以及宫内所藏的哥、汝、官、均、定、柴等各名窑瓷器器皿款式中典雅的器型，来设计宣德炉的形制，并绘成了117种图谱以供参考，然后

由工部侍郎吴邦佑参照图例于宣德三年(1428年)开炉铸造，并在炉底铸有“大明宣德年制”的楷书阳文方印形款识。宣德炉多是用极为难得的风磨铜铸造，因而色泽晶莹温润。

第五章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16）

它的冶铸工艺也极为考究，在熔炼过程中要掺入金、银等30多种贵重金属，然后再经过十几次精细提炼，才能达到铸造要求。同时，宣德炉又是深藏宫禁的御用品，仅在宣德三年铸造过一次便停工了，因而数量极少。现在藏于首都博物馆的一件有此年款的桥耳铜炉，做工极为精细，是极为难得的标准品，也是熏炉中品类最高的。

20 现存世界上最大的鎏金铜佛

现存世界上最大的鎏金铜佛是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的强巴佛。该佛高达26 5米，耳朵长2 2米，中指长1 2米，脚板长4 2米。1914年铸建该佛时，花费了黄金235千克、黄铜12万千克。这还不算，光是强巴佛的眉间，便镶嵌了大小钻石32颗，珍珠、琥珀、松耳石1400颗，其他饰品更是不计其数。

21 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权

古代的铜权相当于现代的秤砣。权与衡（秤杆）相佐，可以知物轻重。

战国时期流传较广的秦权和楚权是我国最早的权。秦权为馒头状，顶钮系球形，也伴有觚棱形；而楚权则多作圜形，铸有半圆形环钮，常由十个组成一套，供天平上使用。自建国以来，湖南省总共清理发掘的近2000座楚墓中有101座出土有天平和砝码，谓之称钱天平，使用时要以钱权作砝码，这种砝码刻有标明重“四铢”或若干两。

第一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1）

第二篇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历程

在世界金属冶炼史中，中国古代青铜史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国并不是从夏代开始才有的青铜器制品。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早在原始社会我国的原始先民们就已经能铸造工具和装饰品等小件青铜制品。如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发现了青铜制的刀，这表明我国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经有了青铜器物。夏、商、周是青铜器的发展期，其间经历了中国青铜器的萌芽期、育成期、高峰期、转变期、更新期。直到东汉末年，陶瓷器和铁器的生产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才把青铜制日用品从生活中排挤出去，在兵器、农具等方面，铁器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后，青铜器除了用于铸铜镜和佛像外，基本上就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第一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

第一节中国青铜器的断代

中国古代青铜器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特点，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

所谓“断代”，就是指用科学的方法确定某器或某一器群所属的固有时代。在青铜器的研究中，断代的“代”是指世代的“代”，而不是指朝代。朝代在时间概念上涵盖的意义过大，如一个王朝有数百年的世系延续，以这样长的间距来判断一件青铜器的年代，其准确性是非常差的。

一件青铜器的研究价值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造型、纹饰和铭文。上述三个因素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断代的任务就是把一件青铜器还原到它本来应当所属的时代，使它可以在原来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因此，青铜器被作为实物史料运用的先决条件就是青铜器的准确断代。

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青铜器在哪里出土的，就会被认为是哪个地方的器物，但实际情况却有许多误断。如传世和出土的周初青铜器，情况就比较复杂，因为这里面混杂着相当一部分的商器，有的甚至是商代中期的青铜器。周灭商后，把商朝的奴隶主及其他们所占有的奴隶赐给周朝的大贵族，商人的许多宝器也分赐给周朝的奴隶主贵族，同时，通过征服战争，种种掠夺，大量商人的青铜器，也落到了周人的手中。这也是周朝初期的墓中仍然可以发现一部分商器的原因所在。灵太白草坡西周早期墓出土的23件青铜礼器，所铸族氏的名字多达9种，如果不是掠夺品，不可能以九族之器来凑全一套礼器。

第一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2）

对于一些没有铭文的青铜器的断代，也应当如此。如湖南洞庭湖以南的宁乡、湘潭至衡阳的广大地区内曾出土了极为精美的商代青铜器——四羊方尊、豕尊、牛觥、人面方鼎等，这些器物的工艺水准与殷商出土的最精美的青铜器相比，有的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类特殊的青铜器还散见于江西、浙江等地。以上这些器物大多是单独埋在土层中，未发现组合使用过的现象，但是从其卓越的工艺水平来看，决不是当地人所能铸造出来的。这些器物中有的还铸有族名，并且某些族名还和中原商代青铜器上的内容完全相同，但商代的这些名门豪族们是不可能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的。如果说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代表着当地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那么古代的史学家对史迹的记载再疏忽，也不至于对如此辉煌的青铜文化没有一点记录。通过种种推断只能说明：这些器物并不能说明是商人生活的遗迹，也不是商文化的独立现象，而是与祭祀神灵的礼仪活动有关，或当作古代流散的器物来认识。

第二节青铜器断代中的绝对

年代和相对年代

青铜器的断代与其他出土文物一样，通常是参照田野考古层位叠压次序的状况，来推断出其年代的前后，其中包括对各层位相对年代的分析，以及与青铜器同层位出土物年代的分析和比较。同一历史时期墓葬的叠压关系，通常是判断各墓出土青铜器年代前后的重要指标。同时，建立各种青铜器形态发展的标准和序列，为青铜器断代提供了重要标尺，其中不仅有器物形制方面的标准，也有纹饰方面的标准。青铜器的断代只有巧妙地把上述所说的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断代的时间幅度，可分为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绝对年代是青铜铸造的年代，或非常接近于铸造的年代，即标明青铜器铸造的时间，

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具体标明年、月和日期；另一种是标明所属的王世。能断定具体年、月、日的青铜器，需有铭文记载，且大多数要有明显的证据。可是对于判断绝对年代的直接证据，理想条件的器物并不多见，因而要想判断青铜器的年代常需用间接取证的方法。此种方法是选择两件铭文内容彼此有关联的器物，把记载的事件和人名作为钮带联结为或大或小的群体，这个群体中至少应当有一件是时间明确的标准器，然后对有关的人名进行分析。分析的结果如果属于横向的关系，则有关联的器物与标准器物应当属于同一时代；如果有关联的器物是纵向的父子祖孙关系，分析其正确性后，也能断定器物的绝对年代。另一种是根据铭文的内容无法确定的年代属于某一个王世，需要放置于相邻王世的两可之间。习惯上可标出两个王世，如《西周铜器断代》把礼器的方鼎、方彝、方岱根据铭文的内容分别定为成王、康王或成末康初之器。在某些器物不容易判断的条件，采取这种方法也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态度。

第一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3）

相对年代是指用一定的时间幅度彼此对比而藉以确定的期限。青铜器的研究中利用放射性碳-14测定年代，可以提供遗址和墓葬的年代数据，这一方法对青铜器断代来讲，虽然不是一种直接的方法，但是测定出的遗址或墓葬的年代，对同地层或墓葬共存铜器时代的确定，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但是青铜器相对年代的范围仍然较广，具有某些共同特性，因此青铜器的相对年代实属一个分期的问题。

第三节青铜器的分期

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体制的发展，经历了1500年以上的历史，情况十分复杂。每一个朝代的青铜器，由于其历史、礼制、文化等的发展，都有其自身演变的过程。

分期是判断古代青铜器相对年代的一种方法，研究和标明各个时期青铜器发展、演进和变化的大致进程及其主要特征。青铜器的分期方法是对其自身历史的综合研究。所依据的标准主要是器型、纹饰、铭文以及器物组合等若干方面。

分期工作的基础是田野考古发掘的成果和青铜器铭辞学研究的成果。科学的发掘首先能够确定出土物的层位与共存关系，其次能够利用器物形态学的研究，提供器物形式的类别或某种演变的序列。但是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是有限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特别是礼器有大量的铭文，许多铭文的内容是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的真实记录，

商代晚期·三星堆青铜人面具

因此研究铭文，可以确定它的铸造时期或所属的王世，并可以排列出发展顺序。铭文方面的研究对分期工作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因为铭文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必须结合器物的形态和纹饰来进行。如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就是根据这几个方面的特征来进行研究的，使这本书成为科学研究这一问题的开山之作。

传世青铜器与近几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历史本身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因而青铜器的发展也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界标。所谓的分期也就是相对意义上的、能够分出的、大致几个可以区别的阶段。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青铜器的发展具有容易区别的要素或特征，使它们能与其他时期比较明显地区别开来。

综上所述，自夏、商、周至秦、汉青铜器的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几个期：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期两期，秦、汉各为一期，是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

第二章 夏代青铜器的发展（1）

中国的夏朝上承五帝时代，下接商、周。考古学上的夏文化，至今仍然在探讨之中。学术界普遍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代表了夏文化，它们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左右，这个时间基本上符合夏朝的年代。

第一节夏代青铜器概述

我国的青铜器时代开始于夏代，根据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发掘所发现的夏代铸铜作坊和青铜器物来看，这一时期的青铜二里头文化·铜牌饰器已经出现了礼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和装饰器等五大类型，而在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兵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夏代贵族墓中出现的礼器和兵器，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的构架模式。

传说夏禹铸九鼎，史料也有夏禹之子夏启炼铜的记载。夏代青铜器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和青铜器的出现是当时社会进入青铜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也证明夏代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重要阶段。

夏代青铜器的纹饰，除了乳钉、圆饼和几何纹以外，就是牌饰上的兽面纹，它也是已知青铜器上最早的兽面纹。

第二节夏代青铜器造型特征

夏代青铜制品的器类很少，主要以小件的工具和兵器为主，并且是仿照陶、木、蚌器而制作的。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都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如矢镞、戈、戚等，另外还发现了青铜礼器爵。爵的整个数量虽然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都是技术上的飞跃。发掘出的二里头文化期的青铜礼器，至今仅限于饮酒器爵。其基本特点是：爵的流部狭而较平，尾短、无柱，或有柱状的雏形，底平。体较扁，下承三足。体型可分为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及短体束模式等数种。足有长短两类，长足为三角尖锥形，短足为三角段形，有些短

足可能是使用时因损坏或腐蚀所导致。有的鋬做成镂空状，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期的特点。

第三节夏代青铜器花纹与装饰

第二章 夏代青铜器的发展（2）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一般没有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两排圆钉状纹饰，一些器物上也出现了简朴的云纹、弦纹和网纹。除此以外，值得重视的就是镶嵌绿松石的牌饰了，牌上的兽面纹除两眼之外，其他部分都是抽象而不写实的。它也是目前已知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兽面纹。如1975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镶嵌圆铜器，此器直径17厘米，厚0 5厘米，器物的边缘镶嵌61块呈长方形的绿松石；再如1981年在二里头一座墓葬中发现的长圆形兽面纹铜牌饰，牌饰凸起的一面以绿松石粘嵌成异常精致的兽面纹图案。这两件器物是目前在中国所见到的最早的复合物质铜器，其熟练程度已经脱离了该种类技术的最初阶段，从中可以看出夏代的青铜铸造技术有了较大的突破。

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没有见到动物形纹饰，但是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内部已经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此不能排除此时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第四节夏代青铜器铸造技术

传说夏禹铸九鼎，史料中更有夏禹之子启炼铜的记载。考古工作者曾在偃师二里头和洛阳东干沟遗址中发掘出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这些也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了冶炼和制作青铜器的作坊。

二里头文化处于青铜时代初期。一般来讲，铸造实体器远远不如铸造空体器难，实体口袋只需要单扇范即可；而空体器的铸成不但要有外范，还要有内范才可。从发现的铜爵的铸造痕迹来看，当时已能采用多合范法了，充分代表了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水平。铜爵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形体单薄，束腰，平底，细三足，流部和尾部都较长，个别的还在靠近流折处（即流与口的接合处）有两个矮小的柱。铜铃形体不大，一侧还有一个近似半圆形的扉棱。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形体都较小，粗糙、单薄，说明青铜器的制作正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数量不多，但它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在生产、生活及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优点，远远超过石、木、蚌、骨器，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1）

商是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它的建立结束了夏末的纷乱局面，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据《诗·商颂·殷武》记载：“昔有成沁，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大意是说成汤之时，包括西方的氐、羌在内的四方各族臣服于商。商朝从公元前1600—前1046年，历时500多年，自汤至末代纣共17代，31王，其中以盘庚迁殷为界而分为早商、晚商两个阶段。我国对于商代文化的探索是分两步展开的，1928年通过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立了晚商文化，而1950年以来对郑州二里冈商代文化遗址的发掘确立了早商文化，到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了完整的商代文化序列，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商代文化和历史等有了全新认识。

第一节商代青铜器概述

商代是中国青铜器的核心时期，是青铜时代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一页。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因为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都邑的原因。这些青铜器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重要的墓葬或窖藏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以及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此外商代早期青铜器在河南北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大的发现。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无论在造型设计、花纹装饰，还是在铸造技术上较前代都有明显的进步。此时期的礼器种类增多，器物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并开始出现了铭文。

商代晚期是指盘庚迁都于殷之后的时期，即殷墟文化期。就青铜器的发展而言，在郑州二里冈文化与安阳殷墟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这就完全有必要在商代早期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前，划出一个称为商代中期的阶段，时间大约相当于中丁至小乙时期。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冶炼、铸造技艺和艺术表现上都已经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能够充分地发挥青铜材料的特点，作品被赋予某种社会意识

形态的功能。到了商代晚期青铜制造业得到迅猛发展，为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使中国的青铜文化达到高峰。商晚期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比之中期内容和种类丰富得多，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了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商代的青铜器矗立于奴隶制时代文化的颠峰，它的创造经验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各个不同的艺术门类，而且直接为西周前期所继承。

第二节商代青铜器的分期〖1〗

一、早期（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的青铜器是商代早期的代表，其后河北蒿城、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山东大辛庄、河南偃师等地也相继出土了同期青铜器。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相比，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论在造型设计、花纹镂刻，或是工艺技术上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2）

1 造型特征

此时青铜礼器占主导地位，成为青铜时代最主要的象征。其通常是成套的，表现了当时礼制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加强。商代早期的青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铸造水平较高，但传世品较少。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来看，一般包括：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涉及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都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而成的一套酒器已被普遍使用。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商代晚期·火蛇纹鼎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已经相当厚重。此时期器物的体积也有所增大。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状，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与器腹之所以相通，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此时方鼎体形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继承了二里头文化式样，一律为扁体平底，流部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都有“十”字形大方孔，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商代早期壶提梁类分为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且不设提梁的。

2 花纹与装饰

一般胎质较薄、纹饰简单质朴，大多是宽线和细线组成的变形兽面纹，展现了二里冈时期青铜文化特点。此外这个时期纹饰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如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他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底。

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糙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在这时出现。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的主体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作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兽面纹上、下常有圆圈纹作边框，方鼎左、右、下方有乳钉纹。

3 铭文特征

铭文已有萌芽。郑州白家庄出土的一件铜罍，肩部饰有三个龟形图案，有学者认为是族徽文字。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鬲上，有“亘”字，可认为是这一时期铜器上比较罕见的铭文之一。

二、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考古学上所观察到的商朝早期与晚期文化分布中心分别在郑州、安阳两地。但商朝中期考古文化的中心则较为分散，反映了当时政治的不稳定。“正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3）

1造型特征

商中期青铜器除了生产工具和兵器外，容器的种类比早期有所增加，主要有鼎、鬲、斝、爵、觚、尊、盉、壶、瓿、卣、罍、盘、簋、豆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前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鼓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已出现的宽肩的大口尊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出现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高度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为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十”字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一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立，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商代早期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2花纹与装饰

此时出现用云雷纹衬底的复层纹饰，其设计和雕刻之复杂精细，是早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浮雕兽面纹也开始出现，但一般都比较圆浑，不似商晚期那般硬朗锐利。有的器体上开始用扉棱装饰，显得凝重雄伟。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细而密集。一般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经较为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了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往往双目突出。如果不是浮雕的话，无论是头像还是躯体都没有明显的区分。

3铭文特征

商代中期的铭文没有太大的发展，也是处于萌芽阶段，一般器物也没有铭文，但是在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不过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三、晚期（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河南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是商代晚期的代表。从各地出土的青铜器来推商代晚期·兽面纹四足鬲断，青铜器冶铸业虽然是以王都为中心，但在各地奴隶主贵族统治下的都邑，也都设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作坊。殷商后期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此时手工业中的青铜铸造业有了更大的发展，从二里头文化上层青铜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殷墟青铜器，不仅品类较全、形式多样，而且在造型设计和铸造工艺等方面都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达到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高峰。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4）

1造型特征

商代晚期从武丁后期至帝辛接近二百年的时期内，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殷墟时期前段

殷墟时期前段以小屯238号墓、殷墟5号墓、小屯村北18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他地区的以山西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后蓝家沟和湖南宁乡黄材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

新出的器形有方彝，高颈宽口椭扁体壶，敞口束颈椭扁扇体觯、觥等。方彝见于小屯春秋战国之交·鸟尊

238号墓。殷墟5号墓出土有“偶方彝”，偶方彝的外形似二方彝合体，内为一长方形槽。高颈宽口椭扁体壶见于殷墟5号墓，口宽而椭扁、颈较高、腹部膨大，颈两侧有贯耳，下有圈足，有的有盖，石楼桃花庄扁壶则有龙形提梁。此类扁壶风行于商代晚期的前段，到晚期后段就迅速消失。一种敞口束颈椭扁体觯见于殷墟5号墓，有的无盖，颈部收缩都不是很小，有宽狭不同的做法；器多小型，也有

作中型的。另一种敞口束颈圆体似杯的觯，大约也在此时出现。上述两种觯在传世品中很多。觥有作鸟兽形和圈足的两类，全见于殷墟5号墓。鸟兽合体造型的觥，前足与后足不相同，如妇好觥前为虎后为枭的合体，司母辛觥前为怪兽后为怪鸟的合体。美国佛利尔美术博物馆有一前为虎头后为鸭形而平啄的兽禽合体觥。春秋战国·鸭型尊

新出的还有鸟兽形尊，如妇好鸟尊、湖南湘潭猪尊、醴陵象尊，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也有的设计成半容器半动物的式样，如双羊尊，中间是尊形，两侧为羊头，形状特殊。

值得注意的是，方器在这时大为发展。殷墟5号墓出土的有方爵、方斝、方尊、方罍、方壶、方缶等等，而传世器中还有方觚、方觯，

几乎主要的酒器都有方形。从整体上来看，虽然方器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富有特征的器物。

中期的器类在本期内也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式样。食器中鼎的变化较大，除了通常的式样外，新出现的形式有自器腰以上收缩、口唇外翻的鼎，这主要是中小型鼎；还有一种是容器部分很浅的柱足或扁足鼎。袋腹似鬲的柱足鼎，俗称分裆鼎，是此时期流行的新式样，前段的特点是袋腹较深。晚期前段的方鼎都是槽形的长方状鼎，柱足粗而偏短，也有扁足方鼎。柱足和扁足方鼎在殷墟5号墓中都有典型的式样。

甗在商早期黄陂盘龙城墓中发现有一例，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晚期前段有较多的发现，均作甑鬲连铸形，甑体都大且深。口部的做法有两种：一种自口至腹都为直壁，口沿处有宽阔且加厚了的边条，如小屯188号墓出土的就有此种直壁甗；另一种口部侈大，殷墟5号墓有这类甗。前者大约主要流行于前段，后者成为固定的沿用式样。妇好三联甗分左、中、右置于一箱形的釜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其他地方没有发现。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5）

鬲这类器物不是特别流行，传世的有殷墟出土鬲，多为深袋足；安徽阜南月牙河出土的鬲，器颈处直而收缩，翻唇，亦深袋足。商代晚期·卧虎立耳扁足鼎

簋在早期的黄陂盘龙城墓中曾出土过一例，为圈足双耳。晚期前段出现了无耳簋，这种簋形体比例较宽，圈足直而往往有小方孔，口微敛而翻唇。殷墟5号墓及武官村大墓都出土有无耳簋，后者比前者上口翻唇的曲度还要大。无耳簋是在晚期前段较为盛行的式样，此时没有发现双耳簋。

爵、觚、斝仍是组合的酒器。扁体爵已大为减少，圆体爵盛行。觚的造型为颈部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斝类器变化不太明显，比较突出的是斝鋬上开始有了较多的兽头装饰，三足有明显增高的趋势，同时出现了圆体和椭方体不分段的斝，前者如殷墟武官北地1号墓圆体斝，后者如小屯238号墓的椭方体斝。殷墟早期出现过的袋足斝，在晚期的前段又重新萌起。此时期内还出现了角，但很少，殷墟5号墓出土爵近50器，却未见有一角。

大型的酒器大口有肩尊和饔(瓿)的形体也有所变化。大口有肩尊，原来比例偏低的体型在这时有显著的增高趋势，有的圈足特别高，圆体的如殷墟5号墓出土的有司柬母尊，方体的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但这种尊也只是流行于晚期前段，以后就逐渐减少。饔(瓿)这种器形可分为两类：短颈和无颈合口，后者主要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并且有的有盖。山西石楼后蓝家沟的百乳雷纹瓿、殷墟5号墓的妇好瓿及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瓿，都是极为典型的式样。但是饔(瓿)这种器类如同大口有肩尊一般，在商晚期后段基本上不再铸造了。袋足斜流半封口的盉仍有所发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铸铭左、中、右三盉都是袋足方形盉，是一种形体较为庄重的祭器，但是袋足盉这类酒器也是愈来愈少了。

水器类盂是新出现的器形，如小屯西北冈墓出土附耳盂，上有铭云：“寝小室盂”，器壁侈斜，是为盥洗用器。殷墟5号墓有盂直口翻唇，有附耳，并有对称的两系。

（2）殷墟时期后段

这一时期由于青铜器上的铭文有所发展，根据内容记载可确定一批标准器或非标准器。这些器有十五祀小臣俞尊、戍嗣子鼎、小子茜卣等，都属于帝乙、帝辛时期。

体似觚形的无肩尊和椭扁体卣是此时期新出现的典型器物。安阳大司空村51号墓的卣成组合出土；殷墟西区43号墓属于第四期，时代最晚，也出土有两觚形尊；小屯圆葬坑中有卣随葬。前段的宽肩大口尊和后段的觚形尊，前段的高颈宽口椭扁壶和后段的提梁壶卣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兴衰的交替。

双耳簋在这个时期很流行，但容器部分还是与以前的神似，形体基本上为敛口翻唇形和敞口似碗形两种，双耳在口沿处下方，且有垂珥。有一种粗大双耳发达近口部或高于口部，并有长垂珥的簋，出土更晚，无耳敞口簋仍继续使用。这一时期簋的圈足有增高的趋势，有的圈足下缘做出一道宽阔的边条以增加其高度。圈足上开孔的现象已基本消失。

第三章 商代青铜器的发展（6）

2花纹与装饰

商代晚期·风纹牺觥

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样式和种类也比中期的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呈现出高峰，与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一致。

此时，器物纹饰丰富多彩、繁缛富丽，以兽面纹和夔纹为主，还有鸟纹、象纹、蚕纹、蝉纹等。兽面纹饰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所表现的物象很多。此时的装饰特点是集群式，以多种物象或作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的器物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物上有多达十几种动物纹。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被分割为两部分。

就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的形体基本上还有象征性，除了炯炯有神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底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还带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底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底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纹饰的主体采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同时采用平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层次更加细腻丰富。有的浮雕表现出几个层次，而且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被称为“三层花”。

3铭文特征

这一时期的铭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以人体形象的文字为例，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呈下跪形状，这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字形的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也不齐整，竖画虽然基本上成列，但横画却不成排。

这些铭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然对此已经有很多人做过研究，但其中一些深刻的内涵仍是人们无法确知的，在今后的金文研究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朝晚期的重要事情、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其中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以及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之处。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1）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其国家政治形态和文化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众多周代的考古发现成为我们领略周代典章制度及其演进的桥梁。

第一节西周青铜器概述

商朝的统治最终在社会矛盾的浪潮冲击下崩溃，被周朝所取代。青铜器工艺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周建都的陕西关中地区。西周的青铜文化是在晚商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人得到了殷商的工艺匠人和先进的冶铸技术，使青铜铸造业迅猛地发展起来。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礼制的不断加强，周人在全面继承殷商青铜工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器类、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等方面不断进行改造和更新，创造出精美的艺术瑰宝，把青铜文化推到了最鼎盛时期。

西周早期的器类、器形和花纹大都是沿袭商代晚期的风格。这是因为周灭商前，先周文化虽然已经跨入青铜时代，铸造技术达到一定水平，但还远不如殷商的青铜铸造业发达。到目前为止，周原和丰镐地区还没有发现一件艺术水平很高的先周青铜器。

从传世和出土的周初青铜器来看，情形比较复杂，这其中混杂有相当一部分商器，有的甚至是商代中期的青铜器。周灭了商朝之后，把商朝的奴隶主及其所占有的奴隶分赐给自己的大贵族，商人的许多宝器也被分赐给周朝的奴隶主贵族，因此有大量青铜器落到了周人的手中。至今周初墓中仍然可发现部分商器，其原因就在于此。灭商之后，周人接收了青铜铸造工业和工艺奴隶，生产为周人服务的手工业产品，在一段时期内还是原来的模式，因此出现了一批商制周铭的青铜器。因而在讨论周初的青铜器特征时，必须与铸有周初铭文的器物结合起来。对于时代界限模糊的器物，有些著作称之为“殷周式”，或定为商末周初。

青铜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西周中期已经达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早期青铜器上商代特点逐渐被全新艺术所代替，这主要表现在青铜器的造型设计、纹饰构图等方面。在器型方面，西周中期酒器迅速衰落，爵、觚、觯、觥、瓿等逐步消失，鬲的种类不断增加，写实风格的鸟兽樽十分流行，而且式样活泼。在西周中期陪葬品特别是青铜器的组合有着严格的要求，如在贵族的礼器中鼎、簋成组成套。在纹饰方面，从西周中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以朴实无华、简洁明快为趋势，商代流行的兽面纹已经不再作为主题花纹了，中期纹饰布局以条带状的二方连续为最多，通体满饰的情况极少，在纹饰的表现手法以平雕为主，浮雕较少。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2）

西周晚期青铜器的种类与中期大体相同，礼乐器主要有鼎、簋、鬲、簠、壶、盘、盉、豆钟等，但是造型和纹饰十分简朴实用，而且逐渐发展为定型化、程式化。西周晚期的纹饰构图简洁，刻画刚劲有力，但是种类比中期有所减少。这时鸟纹已经消失，雷纹开始蜕化，波曲纹在所有纹饰中占有绝对优势。总的来说，西周晚期的纹饰相对呆板单调，艺术欣赏价值远远不如商末周初时期了。

总体来说，这段时间青铜器的特点为技术成熟，数量有所增大，但纹饰退化。早期常见的食器有鼎、鬲、簋、盂；酒器有觚、爵、觯、觥、尊、卣、方彝、壶；水器有盘、禁；乐器有钟。从中期开始，造型、纹饰、铸造略显得简单，一些器型大量减少或消失。晚期的种类和中期差不多。长篇铭文始于西周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不仅器物形体宏大，而且铭文多达290余字，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历史上，西周青铜器以长篇铭文、精湛铸工、华美风格，为华夏文明树立了丰碑。

第二节西周青铜器分期〖1〗

一、早期

西周早期是指武、成、康、昭四王大约70余年的时间，此期间的青铜器大都因袭商代晚期的风格，同时在器类和造型设计上有一些新的增损和改进。在铸造铭文上形成了西周自己的风格。周初铭文有着丰富的政治内容，体现了朝代更替的背景，同时也说明了周初文化的着眼点。

1造型特征

食器有鼎、簋、鬲、甗、豆；酒器有尊、卣、爵、觚、觯、觥、斝、方彝、壶、斗、禁；水器有盘、盉、壶、盂、盉（本为酒器，此时也演变为盥洗器，与盘配合使用）；乐器中铙消失，甬钟出现；兵器除有戈、矛、镞、胄，还有一些新出土的勾戟和短剑。总之，可以

确定为西周早期的重要青铜器有很多，如武王时代的天亡簋、利簋等，成王时代的小臣单觯、何尊、保卣、保尊、德方鼎、献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时代的盂鼎、小盂鼎、鲁侯狱鬲、旅鼎、厚越方鼎等，昭王时代的旃尊、旂觥、旂方彝、令簋、令方彝、召尊、召卣、小臣宅簋等。西周早期·鲁侯熙鬲

西周早期几乎没有新器形，但在沿用的器物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

这个时期，圆鼎的造型均为柱足，但不如商代的粗壮，有的足根还附饰浮雕兽面。这种兽面柱足鼎最早见于商朝末年，西周早期它的形制更加成熟，特别是大型鼎，如大盂鼎就是其代表。早期后段，圆鼎的下腹开始向外倾垂，这种变化是一种时代风格，同期的尊、卣、觯、簋许多器类都受其影响。方鼎腹变浅，双耳略侈，柱足较细，已经没有了商代晚期时的那种凝重的感觉。此外，早期还出现了附耳鼎。分裆鼎在此时更加流行，但分裆变浅，袋足流于形式。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3）

鬲的形制以立耳束颈式为主，早期鬲腹趋向外鼓，柱足较矮，分裆较低或裆部变平分裆不明显。周初鬲腹较深，分裆明显，其后鬲腹变浅，柱足细。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形制，如附耳袋足鬲，斜沿立耳鬲和无耳平沿鬲。鬲的口沿一般等于或大于腹径。

西周晚期·虢仲鬲

甗以连体式为主，甑部较商代变浅，鬲部加高，甑、鬲宽度相近，整体趋于稳重。早期还出现了椭方形复合式甗，整体由上下两器组成，上器是侈口附耳或兽首耳的椭方形甑，下器是一个附耳方鼎，二者以子母口套合。

簋的变化比较大，数量增多、式样也有所翻新。侈口鼓腹双耳的商代晚期簋继续流行，但兽耳多变化。最具特色的高足簋、四耳簋、方座簋出现。所谓方座簋，就是将簋体和方禁连铸在一起，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利簋都是这一形制的代表。成康以后，乳钉纹无耳簋消失。

尊此时流行筒状、三段式的觚形尊，腹与圈足所占比例相当，口径略大于腹径，圈足下通常有宽边条。制作精美的通体铸有四条扉棱，纹饰华丽。商代晚期流行的宽肩大口尊这时已消失。早期后段，尊腹下移，圈足变矮。

卣的造型仍然沿用商代晚期的式样，盖钮全为花苞形，有的提梁作扭索状，梁的两端没有兽头。从成王开始，提梁两端铸有兽头的扁体卣大量流行，精美的通体也有四条扉棱。此期后段，盖钮大多变成圈状，兽的两端出现了“犄角”，器体逐渐趋于低矮。这时提梁卣往往是成对出现，一大一小，形制、花纹、铭文相同，这种大小相配的形式在商代从来没有出现过。

爵均为卵形腹，流窄而长，前端高于后端，一侧有鋬，流与标口之间有柱。此期后段，爵鋬由扁平变为圆浑，平底浅腹式爵已消失。

觯以圆体型为主，此期前段觯颈较短，圆鼓腹；后段觯颈修长，腹变小而下垂，圈足外侈。

觚的式样有两种：一种沿袭了商代晚期的风格，但腰部变长，一般没有棱脊；另一种是新出现的，有很细的腰部，状似喇叭，纹饰只施在圈足。

平底斝、罐式斝均已消失，斝仅存高领分裆式一种。觥是方体的，折方彝腹壁变得较曲。

2花纹与装饰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纹饰，绝大多数是商晚期的式样。兽面纹没有什么变化，但角型中多内卷角、牛角，也有少数其他的角型。有一种长垂角的兽面纹，为晚商所未见。周初具有时代特征的纹饰是蜗体或卷体有触角的兽纹，武王时代的天亡簋、泾阳高家堡周初墓出土的一组青铜礼器都有这种奇异的纹饰。但是天亡簋上这类纹饰的图形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因此不能排除在先周或商晚期出现这类纹饰的可能。

凤鸟纹有所发展，如望方鼎、仲子觥等，都有西周早期典型的凤鸟纹饰。商代晚期已有一定数量的大鸷鸟或凤纹为装饰，但西周早期的凤纹显得更为华丽，数量也更多些，其他种类的鸟纹也比商代的鸟纹多。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4）

3铭文特征

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发展最有特色，表现为大量长篇青铜器铭文的出现。一般铸有数十字铭文的青铜器均属常见，远远超过了商代晚期，体现了商周两代文化差异。商人的宗教意识很强，把青铜器作为单纯的祭器或礼器，只是到了末期才略有改变。周人却不同，他们也以青铜器作为庙堂的宝器，但却是凭借青铜器上的铭文来宣传作器者个人和家族的荣誉、地位，而这种荣誉和地位常常与政治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周早期青铜铭文内容多以灭商建邦、平乱、分封、方国征伐、巩固统治种种事件或政务活动为背景。考古发现说明，周人在灭商以前就已经有发达的文化。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利簋，此簋上为盆形，双耳有珥，深腹，下有方座，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由上面的铭文可知，此簋铸于牧野之战后的第八天，为武王的右史利为纪念受王赏赐而作，其上铭文为研究西周初年的历史提供珍贵的史料，是我国西周考古的重大收获。

二、中期

西周中期是指穆王至夷王阶段。穆王时期，青铜器各个方面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和西周早期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分界，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打破了商代以来的陈旧模式，开辟了青铜文化的新天地。在器物的造型设计和纹饰结构方面有许多新突破，特别是它基本上放弃了青铜器纹样对称构图的规律，把形象图案变为抽象的纹样，大量采用比较自由的连续构图方法，使得装饰图案产生较为活泼的效果。这种变革是意识形态变化在青铜艺术上的一种反映，它为以后春秋战国青铜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造型特征

西周中期·墙盘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出现了许多新的式样，但同时也保留着原有的传统式样。这个特点在穆王、共王时期尤其明显。懿王、孝王以后，青铜器的传统式样虽然渐渐淡化，但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一些旧时的痕迹。可确定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很多，但具体到某一器物属于哪个王世的推断存在一定的争论，但从这些器的一般特征来看，应该处在中期范围之内这是不容质疑的。穆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长由盉、通簋、刺鼎、班簋、静簋、丰尊、丰卣等。共王、懿王时的重要青铜器有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墙盘、九年乖伯簋、十二年永盂、十五年趞曹鼎、廿年休盘、师遽簋、师遽方彝、效卣、元年师虎簋、二年王臣簋、二祀趩尊、二祀吴方彝、牧簋、望簋、史免器群等。孝王、夷王时有师晨簋、师兑簋、师俞簋、五年谏簋、大克鼎、小克鼎、大克等。

鼎类器的器形比较复杂，存在着新旧两种形制。如共王时代的两具趞曹鼎，其中七年趞曹鼎是器腹低垂的柱足鼎，这种鼎在西周前期是非常常见的，昭王时代的师旂鼎就是这一形式；十五年趞曹鼎是器体宽大而浅的垂腹附耳鼎，是新的形式。此时柱足或兽蹄足的垂腹鼎，无论是大器或是小器，和西周早期相比，体宽而器腹较浅，这种情形大约出现在昭穆之际，以后成为盛行的式样。这个时期较晚时还出现了一种鼎：形如锅壮大敞口圜底兽蹄足鼎，称为盂鼎。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5）

西周中期·刖刑奴隶守门鬲

簋类器中，通簋做弁口扁圆体，环耳，圈足下又有三柱状足，全器作平行横条状，是新式样。弁口平行沟条纹的环耳簋，此后非常流行，如乖伯簋、豆闭簋和师虎簋等器体，都由通簋的基本形状发展而来。西周中期簋类器的形制显示了新旧交替中新的式样最终完全取代传统式样的过程。

酒器中筒形长颈兽头环耳的大腹壶，出现于懿、孝时期，按这类圆壶基本形式设计的方壶，也出现在此时。这两类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一直盛行。另一种宽颈、垂腹的圆角方壶也有发现。

尊类器的形制基本也是旧式的。敞口深袋低圈足的尊主要流行于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效尊、丰尊、启尊、兔尊等都属于这一类。具有时代特征的方尊，如日已尊和盠尊，后者如方彝一般，也有双耳。

饮酒器中爵的遗存很少，但欣喜的是这时出现了三种饮酒器，一种是形如无提梁的小卣形器，一种是腹圆似杯的小觯形器，另一种是深垂腹小尊形器，均铭为饮壶。罍没有根本的改变，不论是方罍还是圆罍，形体略为偏低。

水器中的盥器在西周早期以盘盉组合。盉可用于盛放水、酒等。共王时代始有匜这种水器出现，但铭称“旅盉”，所以有一部分盉的作用同于匜。曲阜鲁故城西周中期墓发现有仲齐盘匜组合，但另有一梨形大壶，小口有盖，体部上下有系，铭曰“戎壶”，实为汲水的大壶。

乐器在此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扶风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三枚甬钟成编，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编钟。经过实际测验，现存的西周钟都没有商音，这是当时音律的特点。

2花纹与装饰

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与早期的相比变化很大，与晚期所使用的纹饰相比有一些相似之处。中期纹饰带有一些过渡的痕迹，是传统纹

饰的变化、消失和新纹饰产生的并行时期。概括起来表现在三个方面：

（1）删繁就简，陆续地淘汰了不少西周早期的纹饰。

（2）保留的传统纹饰，在此期发生了剧烈的变形，如兽面纹、兽体变形纹之类。

（3）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之类。

兽面纹逐渐衰退。班簋上的主纹兽面纹已经开始简单化，但基本上仍然属于西周早期的式样；卫簋、日已方彝、蔡姬尊等所饰是比较粗糙、稀疏、多少有些变形的大卷角兽面纹，这类纹饰多不施雷纹底。兽面纹进一步变形为更简略的对称构图，这时的目纹已蜕化，变得可有可无了。这样的变形是在同一时期内出现的，最后一种变形兽面纹在此后流行最广。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6）

凤纹是西周中期具有特征性的纹饰，虽然西周早期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凤纹，但在穆、共时代达到了高峰。效卣、丰卣、静簋、孟簋等许多重要青铜器，都饰有当时最为流行的大凤纹，都呈现对称回顾形排列，有长而华丽的冠或分冠，喙大部分作蜷曲形。此类大凤纹至懿、孝时期的青铜器上已经不多见。

长尾鸟纹也是西周中期鸟纹中使用较多的一类，鸟尾的长度常为鸟体的2—3倍，而且它延长的部分多与鸟体分离。一些簋类器皿常用这种分尾的长尾鸟纹作为主题，而且线条粗犷简单。

长冠或花冠的回顾龙纹，也是这时期的主要纹饰之一。这类纹饰较为具体的形象见于西周早期的匽侯盂，兽头有长的花冠，分尾，体似鸟而非鸟。

错位变形已经成为西周中期纹饰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特点，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波曲纹，二是横行的“S”和“C”形结构的动物纹，三是鳞带纹。

3铭文特征

关于西周中期的铭文，除了穆王晚期一些作战的铭文以外，多为册命的记录，并渐成套子，内容上多为封官、世袭等事。贵族社会的一些现象，如换田的批准，诉讼的胜利，以及追祖考的追孝等都有反映。“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之类文辞始流行。只有极少数铭文后铭有族氏名号。

三、晚期

西周晚期指厉王、共和、宣王、幽王等100多年时间，此期间青铜器的种类和形式减少，造型和纹饰都比较简朴实用，且趋于定型化、程式化。经过西周中期新旧交替和转变的过程，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无论从形制上还是从纹饰上都是中期的延续，但是已经没有中期那样交错复杂的情形了。这时出现少量新的器形，但整体的变化不大。

1造型特征

从总体上来看，西周晚期的青铜礼器，在形制上没有突出的变化，品种也很少，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但仍然有一些小的改变。

西周晚期的鼎，流行样式有两种：一种是沿用中期的垂腹鼎，如禹鼎、史颂鼎等，其形制如同大、小克鼎；另一种是盂鼎。这两种鼎都是兽蹄鼎足。盂鼎在这一时期内发展得较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器形。鼎腹还可分为深、中等、浅三类。

第四章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7）

西周早期·荣簋

西周晚期的甗仍是圆体和方体两种。前者的甑部较低且宽大，后者逐渐流行起来，如伯硕父甗、叔硕父甗等都是方甗。

酒器中的壶仍如中期的长颈垂腹和方壶，方壶似乎有一定的发展，如颂壶、梁其壶壶盖均为莲瓣形，是西周晚期出现的新式样，到春秋时代很流行。还有一类款足盉，足肥而短，小口有盖而宽肩，有錾可执，或自铭为鋬。

2花纹与装饰

西周晚期的纹饰构图简洁而又疏朗，刻画粗壮而有力，种类上较中期减少了一些，从艺术欣赏价值来说已经远超过商末周初。最常见的是波曲纹、横行“S”和“C”形的变形兽纹、鳞纹。有些重器素面不施加纹饰，但是器物的突出部分仍保持装饰的具体形象，如簋耳、匜鋬之类，这主要是因为主体的形象很难变形和做得抽象。这一时期的雷纹蜕化，鸟纹销声匿迹，立体动物附饰也不发达。此外还有弦纹、双头夔纹和蟠蛇纹等。龙体交叠的纹饰的出现仅限个别器物，如颂鼎的交龙纹。

3铭文特征

本时期内有较多的长篇铭文，内容上多为格式化的廷礼册命。有关战争、土地狱讼等方面的内容较多见。宣王时出现了最长的西周金文毛公鼎铭，长达499字的铭文，记述了宣王对毛公的诰命。除此之外，本时期的铭文末尾多有套辞，“万年无疆”之类的辞句较为盛行。本时期还有许多器铭属于韵文，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这时的铭文布局工整规范，横成行，竖成列，在少数器铭拓本上可看到清楚的长方格，这表明当时在制范时采用了先画格后按格作字的方式。本时期的字形特征较明显：一是普遍呈长方形，字形的大小相近；二是笔道绝大多数为细劲均匀的线条，仅个别字，如“天”字上一横，“旦”字下一

横有呈圆点状的，“丁”字仍多写成圆点，即“玉箸体”。由于字形典雅，行列整齐，使得本时期的铭文总体上显得庄重、肃穆。如上文所说的“玉箸体”实际上起源于西周中期末叶，但在本时期才盛行开来。如夷王时的史颂鼎铭文，夷王或厉王时期的大克鼎铭文等。

第五章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发展（1）

随着周平王的东迁，历史进入了东周时期，此时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大阶段。东周时，周王室衰微，不再有力量来控制各个诸侯，这种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诸侯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了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列国铸器增多，但周王室铸器却数量减少且质量下降。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动荡时期，思想活跃不仅带来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造成了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第一节春秋时期青铜器概述

周王室衰弱后，列国竞相发展自已的势力，出现了国内卿大夫室家逐渐兴盛的政治形势。代表各地区文化的青铜器在此基础上高度发展，它新颖的器型、精巧富丽的装饰风格和卓越的范铸技术，反映了当时中国青铜器新风格的崛起。

青铜工艺在春秋早期承袭了西周晚期的一些特点。到了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剧烈变革，青铜工艺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表现为：原王室的器变为各诸侯自铸的器，诸侯国青铜器占据当时青铜器的主要地位，或成为社会的商品；原来的“礼器”变为了士大夫阶级生产享用的器，或成为象征个人财富的财物。为了满足社会新兴势力钟鸣鼎食的奢侈生活需要，青铜器的制造加强了实用性。在纹饰上，商、周以来的兽面纹、夔龙纹等纹样，变为华丽的、富有生活气息的图案；在造型上，由庄严厚重变为轻巧多样。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是各诸侯国及各国内卿大夫所制，因此这一时期的金文多反映了诸侯、大夫的社会活动及其典章制度，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地域性特征，就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局面。

第二节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分期〖1〗

一、早期（公元前770—前7世纪上半叶）

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仍然是西周的体系，但是也有很多的变化。王室和王臣的青铜器急剧减少，诸侯国的青铜器占据主要地位。陕西宝鸡太公庙村发现的秦武公甬钟和钮钟(公元前697—前678年)是为标准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掘较为重要，其中自七鼎至一、二鼎等四个级别的数十座墓葬出土的青铜礼器，有相当一部分是春秋早期时的器。陕县太仆乡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也是典型的春秋早期的器。新郑的春秋墓葬很多。早期的曾国的墓葬个别有所发掘。山东曲阜鲁故城曾发现过几座春秋早期的墓葬。关中地区秦公园陵北的八旗屯秦墓，春秋早期·蟠龙方壶春秋早期的随葬器物与上村岭虢国墓地基本相同。迄今为止，这一时期所发掘的都是

第五章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发展（2）

中小型墓。湖北随县所出土的曾伯文簋和曾伯大父簋等器，均为春秋早期的铜器。

1造型特征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的形制虽然是承袭西周晚期体系，但是也出现了几种新的器形。首先出现的是盆，传世的如曾大保盆。考古发现的有鲁故城201墓的一式盆、陕县太仆乡的日夭盆等，而在西周晚期的墓葬材料中，却没有见到有出土过这类青铜盆的明确记录。其次是椭杯的出现，这是一种横向两侧有耳的长圆形杯，其较深的有的称其为，如蔡大师。称为舟(即尊彝的器座)的器，实际上是一种饮器，山东曲阜鲁故城春秋早期墓中都出土有数件此种器。一种很多见的狭颈、宽肩、深腹的平底扁壶，大约也出现在此时，大仆乡器群中就出土有这样的壶。春秋早期的罍和，大都颈短、宽肩而器体较低，与西周晚期器体偏高的有较大的区别。

2装饰与花纹

春秋早期的纹饰与西周晚期的较为相似，但是也存在微小的变化，即出现了龙类相交缠的纹饰。前文已经提到过，颂壶上已有交龙纹出现，上村岭虢国墓地也出土有这类纹饰的青铜器。春秋早期交龙纹与其他纹饰一样都显得粗糙稀疏，可能是春秋早期中较晚的新式样。

3铭文特征

春秋时期·蟠蛇纹簋

春秋早期因与西周较接近，因此此时列国金文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有西周晚期金文的一些特征，在文字结构及书体上都有体现。其中，尤其一些重要的诸侯国的金文与西周晚期的金文更为形似，文字呈长方形，端庄凝重，布局较整齐、规范。如晋姜鼎、齐侯匜、鲁伯厚父盘、曾侯簠等等。春秋早期的秦国金文在字形结构、风格上与西

周晚期虢季子白盘铭文非常相近，这可以从1978年宝鸡太公庙出土的春秋早期偏晚的秦公镈铭文与虢季子白盘铭文相比较得知，说明秦国文字继承了西周晚期王纤地区内西部区域的文字特征。但是此时期的列国金文也呈现出与西周晚期金文一定的差别。

二、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前6世纪上半叶）

青铜艺术在春秋中期呈现出新的面貌，铸造技术精湛，出现了一些器皿上的观念更新。

1造型特征

传世的秦公簋，铭记其先世有十二公，此十二公是从秦仲算起，到十三世制作器的为秦康公(公元前620—前609年)，秦公簋的形制仍然是春秋早期式样，但是其纹饰已经是较为繁缛而重叠的卷龙纹或交龙纹了。

春秋中期的青铜器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即具有早期到晚期过渡的特点。

第五章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发展（3）

盂鼎类的器盛行时，除了沿用圆底的兽蹄足或垂腹的兽蹄足常见的式样外，还出现了浅腹平盖的盂鼎。双耳弇口的盖簋仍然继续流行使用，但是器体上的横列沟条纹有的已经不再采用了。已经不再出现，但簠仍然在继续流行使用，器形上有所变化，在口上另外竖一道宽阔的边。食器中敦的频繁出现是一个较大的变化，这时的敦有三小足和圈耳，盖可却置，还没有发展为上下对称的形式。敦这种器物是之前很少见到的。这一时期的壶类出现一种器口较宽的短颈壶，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的公铸壶、信阳平桥春秋墓的樊夫人壶等，都是这类器形。此外，甗形盉也有个别的发现。

在国君级的墓中出土过成组的甬钟，也出土过平口的钮钟和铃钟，在此时出现的还有于。

2花纹与装饰

春秋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也存在着新旧交替的情形。“∽”形与“∪”形的变形动物纹、波曲纹等继续流行使用，但是已逐渐改变了粗犷的风格，显得愈益规矩和精丽。在上述纹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重叠的或相交的环形交龙纹结构，并且由早期抽象的、甚至首尾不辨的动物纹，重新恢复龙或兽的具体形象。首、角、目等各部分越来越清楚。但是，变形的动物纹并没有完全消失。本时期新出现了较为复杂和繁密的四方连续动物纹，如秦公簋、黄君孟等不少器上都布有这类复杂交缠的纹饰。春秋中期的纹饰在结构上虽然有新的式样，但在技巧上还不是精工细作，因而仍然具有某种粗犷的风格。

3铭文特征

此时期处于春秋早期与晚期的交替阶段，铭文与春秋早期的铭文差别不大，细节也可以参考春秋早期的铭文。

三、晚期（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前476年）

春秋晚期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取代奴隶主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逐步取得政治优势，并进行了社会改革，新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高涨。从当时遗存的各种诸如玉雕、漆器、原始青瓷、纺织品等制造工艺的水平来看，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青铜铸造业并没有由于青铜时代的终结而走向衰落，反而为整个生产发展的需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春秋晚期的青铜铸造业在生产技术、艺术水平和器物种类等方面，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在青铜器的发展史上形成了第二个高峰。春秋晚期·虺纹簠

这一时期在山东地区的标准器物有齐洹子孟姜壶、邾公华钟；在江汉地区的有楚王领钟；在中原地区有句敔夫人簠；在安徽、江、浙地区有蔡侯申器群、蔡侯产剑、吴王光鉴、吴王光戈、吴王夫差御鉴、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在山西地区的有浑源李峪村器群、赵孟介壶等。

第五章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发展（4）

1造型特征

春秋晚期的青铜铸造业在生产技术、艺术水平及器物的种类等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形成了第二个高峰。

鼎开始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造型和器腹的大小比例方面有所变化。

食器中的簋，传统的式样已经非常少见了，但是在诸侯的礼器中还是可以看到某些旧式的方座簋，当然在造型风格方面也需要适应于同一组合的其他器物，与旧的不全相同，典型的有蔡侯申方座簋。簋的数量总的来说减少得很多，有的地区在中期已经没有人使用了。

敦开始普遍使用。它在南方地区已经发展成为“西瓜敦”，器形上类似圆形的瓜，中间剖开为两半，下承三足，上盖有三环形的兽钮。也有的上下一致，都有三足。这两种敦在寿县蔡侯墓中都有出土。西周中期·波曲纹壶

簠仍然还在使用，口沿的一周边往往很宽，圈足中凹陷处常做成无花果叶子的边缘状。蔡侯墓所出土的簠和传世的许子妆簠，都属于同一形制。从此以后，簠的器形很少再发生变化。

酒器壶大多是高颈，腹或方形或椭圆形，兽耳衔环，有的圈足下附有怪兽或龙，典型的如新郑莲鹤方壶、蔡侯墓莲瓣方壶等，这种壶只有大型墓才有随葬。另一类低体鼓腹圈足壶，器体较高，最大直径约在器的中部，多兽耳和莲瓣盖，肩部略瘦或稍呈丰腴，典型的如赵孟介壶和浑源的鸟兽龙纹壶。

这时酒器出现的新式样是尊缶和提梁盉，缶的器形呈酒罋状且直颈有盖，两侧有系或有链耳。蔡侯申墓中所出土的铭为尊缶，晋栾书缶也属于同一种式样。

酒器尊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没有出现，在春秋晚期的蔡侯墓中，出土了数件觚形圆腹尊，圈足很高，形体上模仿了西周的觚形尊，且其腹部鼓出呈圆弧状。

第五章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发展（5）

盥器发展为鉴、盥缶、盘、匜、盥鼎等。此时出现大型的水器，盥缶没有颈，口有复盖，肩宽且器大，旧称为罍，由蔡侯墓此类器之铭，才得知为盥器。

青铜乐器编钟主要是甬钟、钮钟、铃钟和平口钮钟，其他的青铜乐器如钩、钲、于等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较为盛行。

2花纹与装饰

春秋晚期是青铜器纹饰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纹饰种类繁多，在风格上总的来说倾向于追求精丽细密，以繁缛为美，而且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和审美价值。春秋晚期流行的青铜器纹饰主要有蟠螭纹、蟠虺纹、羽纹（波浪纹）、贝纹、垂叶纹等，以前流行的饕餮纹依然被保留，但狞厉色彩已经消褪而更富于装饰趣味。其中蟠螭纹、蟠虺纹这两种纹饰多由两条或数条螭龙纠结而成。

春秋晚期装饰手法的创新和新纹饰的产生与铸造技艺的发展同步。例如：精细的蟠虺纹、羽纹的广泛应用就与印模法的推广有直接关系。在制范时，以此类纹饰的单元纹样上下左右相联，打印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图案，构成异常精细繁密的大面积装饰花纹。春秋晚期·齐侯盂

此外，错金银和嵌异色金属技艺的流行，不仅造成多色彩的装饰效果，而且促成狩猎纹等新纹饰的产生。狩猎纹是一种新出现的写实的人和动物纹饰，主要表现了当时贵族生活的宴乐、习射、采桑、弋射，以及水陆攻战等内容，纹饰还有简单的环境描写，更突出了写实的风格。

3铭文特征

春秋晚期青铜器上的铭文，主要以山东地区诸侯国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诸侯国的为多，中原和三晋地区的很少。这时遗存的铭文内容，以记载显彰器主本人的世家、地位和身份，及自诩品德之美为内容的

自作用器居多，铭辞或长或短，大体上有一定的格式，记载婚媵的铭文也不在少数。铭辞除诸侯或主要的卿大夫之名可与史籍相印证，及部分有史迹可资考查之外，涉及史料的内容并不多，这是由于青铜器的社会功能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缘故。

第六章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1）

战国时期是史学家对春秋之后、秦灭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的称谓，是我国继东周列国以来的又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0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其中，诸多中小诸侯国家已被吞并，最后剩下的秦、楚、燕、韩、赵、魏、齐七个诸侯强国，就是通常所讲的“战国七雄”。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从而结束了这一战争频繁的时代。

在战国时期，我国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促进，相互发展，如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而且造福后世，此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方面，百家争鸣，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战国时，手工业得到大力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青铜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铸、焊接、失蜡法和金银嵌错工艺，产生了在铜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纹工艺，器型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具有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水平。虽然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但是仍有许多精美的青铜器物产生。

第一节战国时期青铜器概述

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文化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此时，商周以来的青铜礼器逐渐衰落，日常生活用器却得到了普遍发展，如铜镜。铜镜在战国时期，

至少在统治阶级中已经普遍使用。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战国人使用铜镜的记载，如《战国策·齐策》中“朝服、衣冠窥镜”，《楚辞·九辩》中的“今修饰而窥镜兮”等。战国铜镜能够取得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第一，铁工具在铜器制造业的使用，为作坊内部更细密的分工、创造新技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经过商周以来的发展，至战国时期，铜镜的合金比例已趋于科学和稳定，大大提高了实用效果。战国铜镜以它规范化的形制、精美的装饰纹饰，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镜已经从早期的稚朴走向了成熟。

第六章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2）

此外，战国时期有青铜乐器，无论数量上、制造工艺及木架的装饰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代表就是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其用料是铜、锡、铝合金，全套编钟上装饰有人、兽、龙等花纹，铸制精美，花纹细致清晰，并刻有错金铭文，除了乐钟装饰精美外，它的青铜装饰附件也是十分华美的，如钟架横梁两端的浮雕、透雕的龙、鸟和花瓣的青铜套，支撑栋梁用的六个佩剑的武士等等。这样精美的青铜乐器及其附属物，表明了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精湛，同时在音乐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这个时期各类青铜器的造型各具特点，在装饰艺术及工艺方面涉及很多门类，就其大类来说，包括图案、书法、绘画、雕塑等，也可以说其工艺集各类艺术之大成。如青铜器上图案的运用，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装饰手法，如充分利用对比度、呼应、虚实、疏密有节奏的变化，曲线和弧线的反复运用以及突出方向感和运动感等。书法应用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铭文上。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多出自于各诸侯国，因此字体多变，字形有肥有瘦，有些字是承袭商周时期的字体，还有错金字、鸟虫书等，通过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我们可以对当时书法窥见一斑。战国时期的绘画作品我们所能见的就是区区几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青铜器上的图案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绘画成就，这是战国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时期一些青铜器上的图案可以作为绘画来欣赏，如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战斗、狩猎、宴饮、车马、建筑等图案，构图简单，线条质朴，刻画娴熟，有的达到了形神兼备的程度。此外，还出现了用铜浇铸的动物塑像、人俑，这与现在的雕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节战国时期青铜器分期〖1〗

一、早期（公元前476年—前4世纪上半叶）

这时的青铜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共同点很多，但是战国早期的器物有一些自然演变的特点及时代特征。

战国时期·错金银刀把

1造型特征

鼎类的形制与春秋晚期的同类鼎相类似。但是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第2717号墓出土的五具列鼎中，有三具体呈扁圆，敛口，有盖，附耳，短蹄足形，这种形体的鼎在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很少发现。山彪镇1号墓列鼎五具，器体呈扁圆的形状且上下匀称，三足极短，腹底离地不远；同墓出土的贝纹鼎，形制也与此相同。这类扁圆形短足鼎，在战国早期的三晋战国·二人猎猪扣饰地区首先流行使用。另一种所谓联裆鼎或短鬲足鼎，实际上是采取软接触的做法将过短的足与器腹相连接，是新设计的造型，大约是把短足鬲的形体移植而来。

第六章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3）

甗在这一时期大多为分体式，原平峙峪出土的甗与风翔高王寺战国窖藏所出土的形式类同，鬲口处有一圈上斜的圆盘，用来盛放甑内蒸汽冷凝后的水，使之回流于鬲中，而不会溢出。此战国早期甗中的新式样。

战国·龙耳簋

战国早期大墓中的酒器，往往有些特殊的造型，如曾侯乙墓的一对大尊缶、联襟大壶带有华丽套口和盖，可悬置在冰鉴内的大口方形尊缶等，这些都是绝无仅有的器物。相比之下，山彪镇1号墓所出土的青铜酒器的形制，更有代表性。其中的莲瓣盖壶，形体类似赵孟介壶而稍低。同类的器形也见于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盖上有的立有展翅的凤鸟。此类壶为战国早期的典型式样。较大的墓中也出土莲壶，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出土的一件莲壶，形体近似莲瓣壶，腹稍大而深，颈盖上有小环钮，两肩放置一活动的链式提梁。莒南大店1号墓出土的莲壶，腹部更有一可系绳的鼻，曾侯乙墓则出土有长颈鼓腹的莲壶。传世的莲壶大多为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所出壶的样式。此外，在北方地区，还有瓢形壶，有鋬可执，鋬或有链与壶盖相连。春秋晚期流行的一般壶的式样，这一时期内仍然可以经常见到。

水器中以盘匜最为常见，另外中小型有圈足的鉴也有发现。

2花纹与装饰

就题材而言，战国早期的纹饰仍然是交龙、卷龙或蟠龙等龙的世界。山彪镇1号墓的龙钮钟，随州擂鼓墩曾侯墓编钟上都是新颖而复杂的交龙图案。擂鼓墩2号墓编钟上神人骑龙的纹样，是另外一种构图。另一变化是图像的变形有所增加。山彪镇1号墓的豆，主纹是圈点和小翅形的集合体，是交龙纹的省略和变形；同墓出土提梁壶和鉴的腹上密集的圈纹则是旧日的蟠龙纹、兽目纹的蜕变。曾侯乙墓中的具有六棱形甬的编钟上，交龙纹已经变为棘刺丛生型的纹饰。此类变形纹饰

很可能在春秋晚期就已经出现，到战国早期更为发展。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纯粹几何纹饰母题的出现，战国时期·铜鎏金青铜豆诸如曾侯乙墓青铜器上镶嵌的几何云纹图像，琉璃阁1号墓所出土的鉴的下腹复杂的三角云纹及涪陵小田溪编钟的错金云纹等。纯粹的几何纹在春秋晚期非常少见，而且也非常简单。战国早期描绘水陆攻战、燕乐、采桑等活动的画像很多，山彪镇1号墓的水陆攻战纹鉴、狩猎纹钫，成都百花潭的镶嵌燕乐纹壶，及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镶嵌射燕壶等，都是这一时期施用这类纹饰的典型代表。

3铭文特征

战国早期青铜器铭文与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铭文没有特别突出的区别，这时一般作器纪事型的铭文减少了许多。钟上作器纪功的铭文与曾侯乙墓编钟记载乐律数千字的铭文都是独特的现象，不带有普遍性。

第六章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4）

二、中晚期（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封建社会初期的青铜器由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发展到极为鼎盛的阶段，到战国中期以后逐渐衰退，但是就整体来说，并不排除少数精美的器群。即使是诸侯墓出土的大器，其铸造工艺与艺术的装饰，也差于春秋早期和战国初期的盛期。青铜器在战国中、晚两期时的发展区别并不是很明显，因此两期合一来叙述。

1造型特征

山西长治分水岭12号、25号墓、辉县赵固第1号墓、河北平山中山王墓。20世纪20年代发掘的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陵所出铜器群，20世纪20年代发掘的洛阳金村古墓中的战国中晚期青铜器等都是这一时期考古发掘出的重要墓葬。

能代表战国中期器群的，当首推中山王墓所出土的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被盗掘的楚王楚杵墓内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纹饰风格比较一致，属于楚国末期的标准器。

战国·提链三足暖炉

鼎类青铜器南北风格迥异。中山王墓的九鼎都是附耳低短的盖鼎，这种鼎本是三晋时流行使用的一种传统式样，但是九鼎中的平底细孔流鼎就是很少见的了。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有附耳扁圆体平底的高足鼎，同样的型式也见于江陵藤店1号墓，这完全不同于三晋时期的型式。晚期的鼎都是有盖或没有盖的高足鼎，而且高足的造型越来越多样和雄壮，形制也较大。

此时期的甗已经不是很流行了，鬲也并不多见，敦仍然是圆形的和扁圆形的上下对称的两种。方座簋只在寿县楚王陵出土器群中见到过，是战国·五连盏灯器座较低体形收缩的蜕化式样。豆类器为长柄的，燕晋都有。寿县楚王陵所出土的长柄豆，柄有节，盖有三钮，可

以倒置。方豆仍然有所发现，如江陵藤店1号墓就出土了有长柄的方豆。

酒器类中变化较为明显的是壶，有方壶、扁壶、环耳圆壶等等。中山王墓出土的还有镶嵌的方壶，工艺非常精湛。方壶或钫这一类器是这一时期内具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壶的新型式样还有许多种，如细长颈多钮壶、小口短颈大圆腹壶、蛋形壶等。

罍器有做成方形的，可称为方罍。三门峡上村岭5号墓出土的有镶嵌方罍，形体较低且肩宽，附耳可挹酒。同类器中，还有小型的传世。战国中国·楚式剑

水器的基本器型仍然是盘、匜、鉴。巨型的鉴在本时期内减少很多。三门峡上村岭5号墓出土的四龙耳镶嵌方鉴，是新的式样。楚地新出土的斜唇或平唇的中腰收缩平底双耳盘，耳有环，器壁很薄，有的还有刻花髹漆。

第六章 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发展（5）

2花纹与装饰

战国中晚期的纹饰变化十分显著，除了战国早期的某些纹饰仍然流行使用外，出现了许多嵌金、银、铜、绿松石，以及其他物质的几何变形图案，有云纹、菱纹、勾连纹、三角纹等。这种变形的几何纹编排规律，又富于变幻的绚丽效果，令人目炫。最典型的战国中期的几何变形纹饰有中山王墓的虎噬鹿器座、龙凤方案座、嵌金银翼龙、嵌金银绿松石钫，还有记伐燕之功的陈璋壶等。楚墓中许多环耳壶也大多施加几何纹饰，有的是以变形几何纹、狩猎纹及神话题材画像相间的装饰，如琉璃阁56号墓的21号、22号钫上的图像就是如此。此时还出现了刻纹画像。这种纹饰是用极锐利的尖刃刻凿而成的，而不是范铸后镶嵌的，如琉璃阁1号墓的刻纹“奁”、辉县赵固的刻纹“楼室燕乐”盘、长治分水岭12号墓的刻纹战国·鸟纹三足鼎人物车马建筑残匜、长岛战国墓刻纹人物车马建筑残匜等。这种纹饰只能在炼优质铜取得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此外，素面青铜器大量出现。大梁司寇鼎、梁十九年鼎、平安君鼎、楚王后六室鼎、集脰太子鼎等等，都是不施纹饰的素面器，至于中山王鼎、方壶则利用器物的素面凿刻大量铭文。对以大量纹饰为特色的中国青铜器来说，素面器的流行被视为纹饰衰退的表现，也是一种时代的印迹。

3铭文特征

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铭文上的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仍然存在，但已经少得多了。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其他列国的器物上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器上的铭文只是较为简单地记明铸器的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错金银流鼎有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得铭文的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

铸作器物的工匠名，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

第七章 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发展（1）

秦始皇兼并了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权，从建国到国家灭亡历时仅15年，留下的青铜器不多，但是却出现了新的特点。秦文化追求浩大气势的传统，统一六国后，因国力大增，而进一步表现了出来。在青铜器方面，造出了形体很大的器物。秦不仅统一了文字，又通过政令统一了度量衡，因而始皇和二世时的度量衡器成为当时多见的器物。

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了汉王朝，采取了“清净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文景之治”，经济得到了恢复，生产得到了发展，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青铜器制造的工艺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改国号为“新”，史称新莽政权。这时在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都在复古，青铜铸造业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后来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深的影响，爆发了绿林和赤眉农民大起义，最终西汉皇族刘秀于公元25年建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初期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缓和阶级矛盾，使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由于豪强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庄园经济从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商品货币关系。

第一节秦汉时期青铜器概述

西汉·男俑

在秦汉时代的441年中，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经历了最后的辉煌，青铜器已经处于秦汉文化的次要位置。但在艺术成就方面，秦汉青铜器却十分突出，尤其是青铜雕像所表现出的朴素风采和含蓄魅力。与三代青铜器相比，它形成了一种新的写实传统。

以皇帝为最高权威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集权的封建国家的体制初创于秦代；以儒家思想家为核心的儒、道和杂家思想并存、互补，已经在西汉形成多元化格局；外来的佛教思想在汉代传

入；随着国际大通道——丝绸之路的开通，频繁的商贸往来使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活跃起来。这样一个国力强盛、充满自信而又朝气蓬勃的时代自然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无限的空间。而秦汉青铜艺术又以其高超的技艺、磅礴的气势反映了这种时代的精神。

秦汉青铜器艺术是秦汉艺术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发展历程中最后的一个闪光点。这个时代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青铜艺术品，其中不少艺术品还被誉为中国雕塑史和工艺史上的经典之作。秦汉青铜雕塑较前代有重大突破，大型独立性圆雕层出不穷，雕塑语言简洁畅达，风格质朴大方，生动传神。

第七章 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发展（2）

第二节秦汉时期青铜器造型特征

秦国青铜器的形态从战国起就深受三晋中魏器的影响，因此和三晋时期的魏器在形制上存在一些共同特性。秦代青铜器器形的主要特点是：鼎作圆扁腹，三短蹄形足，有高于盖面的二腹耳，盖上铸有三环钮。匜作深腹，平底。鋬作扁圆腹，圆底，腹上有对称的大小环耳各一个。

公元前4世纪，秦灭巴蜀以后，长江流域的文化也渗入到秦文化，如长江流域以釜为炊器的传统很快就导致了秦器中鋬的出现和流行。秦器中几乎同时出现的蒜头壶，也是受到其他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后来，这些器物成为判断是否归入秦版图遗存的重要根据。另外，值得重视的则是秦权与秦量流传下来的较多。

师虎簋

汉代青铜器的特点是：鼎的造型为圆形，有盖，多敛口，腹耳，三短蹄形足。圆形壶在汉代称为“钟”。西汉的钟多呈圆鼓腹，短颈，腹上铸有一对衔环铺首。东汉时的壶有的增加链梁。方形壶在汉代称为“钫”。酒器多作成鼓腹，三短蹄形足，平底或圆底，腹壁有两个或三个衔环铺首，两侧各有一半月形的耳，铜耳环的形制大多呈椭图形式圆形。食器中的斗，作圆腹，三蹄形足，在腹的一侧有长柄，柄的前端常常呈张口的龙头形。汉代的铜灯数量很多，灯的形制纷呈，重要的有豆形灯、雁足灯、人形灯、牛形灯、羊形灯、凤形灯、兽首形灯，还有作成树形的多盏灯等。两汉时代的博山炉形制一般呈半圆形，腹上有雕成山峦形镂孔的尖状盖，山上有浮雕的人物与鸟兽，下面常有盘。熨斗是西汉时代才开始有的青铜制品，其为圆腹，宽口沿，腹一侧有一长柄。有的熨斗上载有铭文“熨斗直衣”。

两汉时代的北方匈奴和东胡族的透雕动物纹铜饰牌，大多饰有镂孔的人和各种动物纹，动物纹中有马、牛、羊、犬、鹿、虎、豹等，

许多动物图像都十分生动。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地区少数民族制作的铜鼓，造型上基本呈圆墩形；鼓身由三部分构成，自上而下依次为凸起的鼓胴、凹的鼓腰、鼓足，胴与腰交界处铸有对称的双耳。铜鼓中间空且没有底，鼓面的中心处铸有太阳纹，有的鼓面上铸出浮雕青蛙或马的形象。在鼓面及鼓身上也常饰有云雷纹、翔鹭纹、竞渡纹、羽人舞蹈纹等。云南滇文化的铜贮贝器，形状很像铜鼓，用于盛放货币。

西汉前期，青铜兵器铸造得较多，有剑、弩机、矛、镞等。铜镞的形制主要为三棱形，也有的为圆柱形和筒冒状。铜符的形制仍然沿袭先秦的形式。官、私印章在字体上写法多样。在钮制上有鼻钮、桥钮、龟钮、蛇钮、瓦钮、鱼钮等。两汉官印在这时开始有了统一制度。

总之，两汉时代青铜器的内容极其丰富，在器物的用途上主要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在器物的特征上强烈地表现出了时代风格。

第三节秦汉时期青铜器工艺与纹饰〖1〗

第七章 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发展（3）

一、秦汉时期青铜器工艺

秦代青铜器追求的是浩大磅礴的气势，同时突出了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可以说这两点是秦代青铜艺术的显著特点。

两汉时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经与青铜时代的高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器物的性质、种类、形制、工艺技术及经营管理上有了根本的不同。秦汉时代的青铜制农具、工具、武器逐渐被同类的铁制品所代替，甚至日常生活用器如釜、镜等，也出现了铁制品。漆器和瓷器的发展逐步取代了青铜器，因此两汉时代的青铜器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相比，大大逊色了。但是从遗留下来的两汉时代的大量青铜遗物和近年考古发现的有关冶铸遗址来看，这一时期仍然有大量的青铜器进行生产，而且青铜铸造业某些方面的技术已经完全转到日常生活用器的制作上来。又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还大量地铸造青铜货币。

总之，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具有很明显的特点，表现如下：

第一，金银与镶嵌工艺。两汉初期不但继承了先秦时代已有的错金银与镶嵌技术的传统，还在此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创新，工艺更加精湛。此时，一些王室和诸侯王等贵族葬墓内出土的金属细工铜器可称得上是奇珍异宝。

第二，鎏金与镶嵌技术。青铜器上的鎏金工艺早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出现，到两汉时发展到高峰。鎏金工艺技术简单来说就是用金粉和汞的合金涂在青铜器的表面，经过烘烤，汞即蒸发，金就留在器的表面了。经过鎏金处理的青铜器不但器物外表色泽金灿美丽，而且鎏金本身对保护青铜器，使其不氧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青铜器上细线刻纹的发展。青铜器上细线刻花纹早在春秋时代就已萌发。到了战国时，这种线刻图案发展起来，多装饰在铜

匜、铜鉴等器物上。青铜器上的这种工艺手法，到了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后期在南方和西南地区发展得更为发达。

二、秦汉时期青铜器纹饰

这时期的北方铜器上的动物纹仍然以浮雕和透雕为主，尤其以长方形透雕带饰最为典型。按题材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伫立或伏卧形。这一类动物纹包括双羊、牛、双驼、双鹿、野猪及伏（卧）状马。传世品中也有类似的伫立状双羊、双驼、双鹿或三鹿。此外，传世品中还有伫立状马、驴，伏（卧）状绵羊等形象。

第七章 秦汉时期青铜器的发展（4）

第二类，搏斗或撕咬形。这类题材包括双马互斗、犬马相斗、犬鹰相斗、鹰袭击鹿、双龙纠结等。传世品中也有类似的鹰虎相斗、鹰袭击幼鹿、双马互斗的形象。此外传世品中还有虎食绵羊、虎踏羊头、虎食鹿、虎羊相斗、虎马相斗、虎豹相斗、虎驼相斗、鹰驴相斗的图形。

第三类，人物活动形。这类题材有双人角斗、骑马捉俘图形。此外，传世品中还有武士驱车图形。

除了以上三种纹饰题材外，这时期带扣还有浮凸的奔驰状马或飞马形象。传世品中还有牛头形带扣、双驴或四驴纹饰牌等。

这一时期的动物纹构图复杂，设计奇巧，用不同的层次来表现动物各部位的特征，以及富于变化的形态，刻画出各种不同的姿态，如伏卧、伫立、栖息、奔跑、惊吓、争夺猎物、相互撕斗等，甚至面部、肌肉、毛发细部都能够清晰地看到。偶蹄类动物的蹄子，通常以柳叶形、三角形或圆点凹纹表示，猛兽及鸟类的脚爪以刻线纹或牛角状纹来表现。除此之外，有些饰牌上还用许多装饰图案相配合，常见的有柳叶形、圆点形及树枝状花纹。

第四节秦汉时期青铜器铭文特征

秦代的铭文由于文字的统一，已广泛使用小篆。小篆即秦篆。汉代出现了汉隶，铜镜上多以吉祥语为内容，但很多玺印上仍使用鸟虫书。

汉代青铜器铭文主要应掌握两点，即文字风格的特殊性和铭文所记载内容的特点。

一、文字风格

汉代青铜器铭文中的简化字很多，简化的方式主要有五种：省略笔画或偏旁、整体简化、截笔、借笔、草化。繁化字不多，繁化的手段主要有两种：增加表意偏旁和加饰笔。汉铭文通假字很多，有的本

字和借字共同见于汉铭文，有的则在汉铭文中只见借字而不见本字。青铜器铭文中的字讹误现象在其他时期并不多见。

二、“物勒工名”制度的体现

这时的“物勒工名”有三种类型：三级制（即制造、主造、省造）、二级制（即制造、主造或制造、省造）、一级制。此外，汉代青铜器中的纪年铭文有两种：宫廷纪年和王国纪年，所记的时间多是制作时间、铭刻时间。汉代有铭文的青铜器大多自己铭刻得很清楚，还有表明器物的使用场所的。因当时青铜器往往是批量生产，成批使用，所以沿用战国时期给青铜器编号的方式，在青铜器上铸刻有数字编号、天干编号。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1）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青铜器的发展〖1〗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铜器概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统一前的300多年间，虽然战争不断，但是也有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业，南方比北方兴盛，但从总体上来看比两汉时代衰退，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很少见到这一时期的冶铸遗址。

至于这一时期传世或出土的青铜制品，从器物的种类到风格特征上看，主要是沿袭两汉以来的传统。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比汉代青铜器要粗糙许多。由于民族的融合，在青铜器的铸造上表现出各民族相互学习和借鉴而形成的共同文化特点。当然，有些青铜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某一民族的特色。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的器形大致相同，铜镜的正面明显外凸，呈弧形，背面内凹。胎的质地较汉镜轻薄，镜体也减小许多。南朝还出现了一种直径为5厘米左右小型镜，镜钮的最大特点是矮扁，顶部尽平，铜镜纹饰主要沿用汉镜的风格。

三、三国及晋代时期钱币

三国时期，刘备占据四川，铸造了“直百五铢”及其他钱币。孙吴铸造了“大泉当千”、“大泉五百”等钱币。至曹魏初年，废止了五铢钱，而到明帝初年时又恢复了五铢钱的流通。汉兴钱是十六国时期，李寿于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称帝后（年号汉兴），在汉兴年间（公元338—343年）所铸的一种钱币，这是我国最早的年号钱。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建大夏国，公元419年铸造“大夏真兴”钱，开创了国号、年号合为一体并用文字的形式铸在钱币上的先例。

南朝宋、齐、梁、陈都铸造钱币。北魏建国以后直到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才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此后各朝代都铸有钱币。北齐初期，仍然使用北魏的“永安五铢”，到天保四年（公元553年）才改铸“常平五铢”。北周初期，也沿用北魏的旧钱，武帝时铸造了“布泉”、“五行大布”钱，宣帝时铸造发行了“永通万国”钱。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2）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青铜器的发展〖1〗

一、隋唐五代时期青铜器概述

隋代的各种手工业部门主要是在官府控制下制作产品。国家设立少府监，“由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铠甲、弓弩、掌治等署”。唐朝中央政府也设有机构来管理各种手工业部门，其中矿冶业与隋朝一样仍由少府监下的掌治署管理，见“掌治署掌熔铸铜铁骑物之事”的记载。从文献记载来看，唐朝采矿冶铸业非常发达，冶铜的地方已经达到96处。

唐代智巧之士很多，著名的如李淳风、僧一行等人。玄宗时曾以铜铁铸造天文仪器，当时就采用了僧一行的建议，用铜铁铸造黄道游仪，用来考验量度。铸成后唐玄宗亲自题铭，置于灵台之上。后来，皇帝又诏僧一行等人铸造浑天仪，“铸铜为圆天之象”。

从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实物资料来看，铜镜铸造业在此时得到高度发展，而且隋唐统治者对铸造铜镜非常重视，如唐中宗时曾经“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文献还记载着扬州要对中央政府进献：“土贡：金、银、铜器、青铜镜。”在今扬州市西扫垢山，考古工作者就发掘出一处多种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即包括冶铸作坊。

唐代灭亡至宋代统一的53年间，除了北方前后有五个王朝统治，在南方各地前后出现了九个割据政权，加上割据于今山西的北汉，共计十个政权，史称十国。十国中不曾铸造钱币的有吴、吴越、荆南及北汉等国。

二、隋唐五代时期的铜镜

隋朝铜镜的镜面较大，壁较厚，最大的直径可达33厘米，造型均为圆形，半圆形钮，比较丰满，都有钮座，大多为连珠纹和柿蒂纹。铜镜的边缘高、平向外略有斜坡，缘内侧多饰有一周锯齿纹。隋朝铜

镜的纹饰繁缛工整，图案多四方配置，讲求对称，并设置有界格，大致上可把其分为三类，即四兽纹、十二生肖纹及四神十二生肖纹。

唐代铜镜的外观厚实，表面大多呈银白色、黑褐色（俗称“黑漆古”）和深绿色（俗称“绿漆古”）。造型除了传统的方、圆形以外，还创新出了八瓣菱花形、八瓣葵花形、委角方形、亚字形、八棱形等。镜钮以十圆形钮为主，并有兽形钮、方形钮、树枝形钮。铜镜的边缘处多呈斜面内倾，并饰有花纹。唐代初期，镜缘的装饰有忍冬、卷草纹；唐代中晚期，大多饰以水波纹、重瓣花纹、花枝纹和流云纹等。唐镜的背面装饰图案，偏重于自由写实或故事，表现手法也由繁乱纷杂转变为清新优雅。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3）

唐代初期，铜镜以瑞兽为主题纹饰，造型丰腴、活泼，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海兽葡萄纹镜。它以高浮雕葡萄为主题，其间饰有海兽、雀鸟、蜂蝶和花草，纹饰华丽而繁缛。除此之外还有宝相花纹，那是一种将某些自然形态的花朵(主要是荷花)进行一系列艺术加工处理，从而变成一种装饰化的花朵纹样。唐代中期，铜镜的纹饰，格调新颖、题材广泛，主要流行鸟纹、蟠龙纹以及人物故事图案。唐代后期，铜镜的纹饰逐渐趋于简单、粗拙，失去了盛唐时期那种富丽堂皇的风格。这一时期特别盛行含有宗教色彩的纹饰：有道教意味的纹样以八卦为主纹，配上附录、星象及天干地支；具有佛教色彩的，佛意为吉祥万德之所收集的万字标志也被用作纹饰。唐代铜镜上的铭文十分规整，字体大多为正楷，字形扩大，文字清晰，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四字或五字骈体铭文。铭文根据其意义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歌颂赞美铭文，均为韵语，大多为四言、五言及少数长短句，其长的可达数百字；另一种是宗教铭文，多配山川，日月、干支、十二辰图文。

五代十国的铜镜造型主要有圆形、葵花形，也有方形和方形委角。纹饰上除了四灵八卦纹外，还有花鸟纹和花朵纹的图案。一般的铜镜为素面，有的镜上铸有吉祥语或作坊铸工名。

三、隋唐时期钱币

隋朝建国后，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铸行五铢钱。隋五铢是中国古代五铢钱的最后一种形式。唐代建立初期，用隋五铢钱。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造了开元钱“开元通宝”，高宗时改铸“乾封泉宝”，肃宗时又铸“乾元重宝”，后两种钱均与“开元通宝”并行使用。

四、隋唐时期金铜佛

隋代造像保留了北齐、北周的遗韵。佛像广额丰颐，躯体敦实，姿势显得凝重呆板。菩萨像多是头戴花冠和发髻冠，前腹挺起，站立的重心向前倾，身体比例略显失调。

唐代金铜佛在形体上以丰腴为美，佛造像的衣纹起伏流走自然，特别是一些坐姿佛像，垂落于座前的衣绉布排有序、繁而不乱，富于时代感。

第三节 宋辽金元时期青铜器的发展〖1〗

一、宋元时期青铜器概述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的青铜器铸造业，无论是在冶炼技术，还是在产量上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从文献资料来看，有的地区规模相当大，参与的人数常以万计。

两宋时代的青铜制品，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大晟编钟和宣和三年尊。大晟编钟为徽宗时铸造，造型以春秋时代的宋公成钟为模式。金灭南宋后，掠走了部分“大晟乐器”，因为“晟”字犯太宗讳，故将“大晟”二字刮去，而改刻“大和”。“大和”取义天地同和。今留存的大晟钟，如大晟林钟，扁圆体、平口、双兽钮、螺旋状枚，隧部、舞部、篆部均饰浪花纹。“大晟”编钟对了解宋、金乐制，提高仿古青铜乐钟的铸造水平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4）

宣和三年尊，圆形、侈口，器身分区段，并均匀地分布四条扉棱，腹部、足部饰兽面纹，以扉棱作鼻，颈部饰蕉叶纹和蚕纹，器的内底部铸有大篆字体的铭文5行，共计26字，是置放在方泽坛祭祀神祇用的。

从宋代到清代，在铸造货币及日常生活用器上，常常是用黄铜来代替青铜。黄铜是纯铜与锌的合金，其颜色与金类似。黄铜的取得最初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冶炼锌的技术，而将纯铜与炉甘石放在一起冶炼成的。

这一时期除了大量生产黄铜外，更令人瞩目的是白铜的生产。白铜通常是纯铜与镍的合金，但也有铜和砷合金的。

辽代青铜制品的种类与数量都比较少，主要是釜、钵、勺、盆、执壶、权、铃、铜丝制的手与足套、青铜面具以及鎏金的小件生活用品。

辽陈国的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了两件各具特征的铜盆：一件侈口、平底，颈部刻有几何花纹；另一件虽然也为平底，但是口沿处呈八角弧形，形状独特新颖。

这一时期鎏金的小件生活用器种类很多，有锁、钥匙、带扣等。辽出土的双鱼饰件，造形奇特有情趣，双鱼并列，全身鎏金外，眼、嘴、鳞全是刻鎏出来的。铜铃有圆形和鞍桥形之分。辽代的青铜细工技术比较发达，主要是鎏金铜马具、铜面具、铜丝手足套、铜镜等。

近年在黑龙江、吉林等地区发现了不少金代的遗址、窖藏与墓葬，从出土的青铜制品的种类与造型上来看，许多方面与中原地区没什么差异，除生活用品中的铜镜、铜斗外，还有铜佛和铜塔。由于大量铸造铜钱，金政府曾经严格控制铜的使用，甚至许多铜器物如铜制的钟和一些铜制的宗教用品等都以铁来代替。金代青铜器制品流传下

来的以铜像和铜印较多，铜镜上常常刻出官署和制作地点，说明金政权下铜禁的严格。

元代官府手工业设立了“出蜡局”，主要负责金属制造业。铸造宗庙祭祀的青铜器大多仿照商周时期青铜器，如鼎、簋、爵等，铜镜也大多是仿照的汉唐两代。此时青铜器的制作品位较低，且草率粗糙。

元代青铜器的种类主要有鼎、簋、爵、盘、罐、碗、盆、鼓、铃、权、盒、笔架等，但是所能见到且最多的是铜权，不但出土的地点星罗棋布，而且表现出特殊的时代风格。权多呈六面体，也有呈圆形的，还有的呈阶梯式的圆形底座，顶上有穿孔的方形钮。由于大多数元代铜权上都有年号，所以许多都可明确其绝对年代，如“至元九年”、“大德十一年”、“延祐元年”等。权上还有某路造字样，如“温州路”、“杭州路”、“益都路”、“京兆路”、“柳州路”、“上都路”等。

二、宋代的胆铜生产法

古代中国首创的“胆铜法”，是世界化学史上一项重大的发明，也是中国古代的一项独创发明，它开启了现代水法冶金的先河。胆铜法也称“浸铜法”或“湿法炼铜”，是指把铁放在胆矾（硫酸铜的古称，又称石胆）水中浸泡，胆矾水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水中的铜离子被铁置换而成为单质铜沉积下来的一种产铜方法。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5）

据夏湘蓉等人撰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所言：胆矾“系由黄铜矿、辉铜矿等硫化铜矿物，受氧化作用分解而成，或从天然胆水中沉淀（结晶）出来……易溶于水”，这种胆矾水在古代被称为“胆水”。有关胆水浸铜法的过程，宋人记载如下：“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钱煤，入炉烹炼。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铁，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由于这种产铜方法不需采凿铜矿石，生产工艺与熔炼矿铜也不同，故现代又称其为湿法冶金或水法冶金。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胆铜生产法在宋代进一步得到应用与发展，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代人对胆铜生产非常重视，胆铜法在生产中大规模应用，成为生产铜的重要途径。胆铜法有许多优点，它可以就地取材，在胆水多的地方设置铜场，设备比较简单，成本也较低。只要把薄铁片和碎铁块放入胆水槽中，浸渍几天，就能得到金属铜的粉末。

宋代将胆铜炼铜工艺大规模应用于生产领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铜荒”。宋代人还撰写了有关铜冶史、矿冶技术方面的重要理论性文献《浸铜要略》和《大冶赋》，其中《浸铜要略》将胆铜法的成功关键归结在“浸”字上，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湿法炼铜的精神和面貌。

三、宋辽金元时期的铜镜

宋代的铜镜造型继承了唐代多样化的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创出了一些新的式样，如钮制变小，钮弓窄而孔显大，钮顶趋平；无钮座、圆钮座和花瓣钮座居多。镜的边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较宽，里厚向外缓坡；另一种是窄边，比较方正。带柄的铜镜的镜缘与镜柄的凸边连成一气。宋代的铜镜上大致在北宋政和年间开始出现铭文，铭文绝大多数为商标铭记，多置于镜钮一侧的方格内。

辽代铜镜在形制上，主要有圆形、“亚”字形和葵花形，此外还有八角形。在纹饰上，主要有双鱼纹、八卦纹、童子戏花纹、荷花纹、

连钱纹和牡丹龟背纹等。辽镜上也常见有许多吉祥语句，不仅有汉字，还有契丹字。

金代铜镜的造型常见的主要有圆形、菱花形和带柄镜等。镜钮以圆钮为多，钮上部较尖，尖顶为平面。镜缘处大多外薄里厚，与宋代铜镜的特征相仿。区别在于其他时代铜镜的特征是：在圆形镜边缘内侧常铸有一个二层台，二层台有宽有窄，较宽的上面大多饰有花纹或铸有铭文。金代铜镜铭文的意义缺乏趣味性，偏重于实用，除有特殊情况，一般则为阴刻、边刻、地名、官名。

元代铜镜一般可以说是“粗者甚粗，精者颇精”。这时式样较少，除了比较流行的圆形和圆形带柄镜外，早期常见的还有菱花形和葵花形镜，与金代铜镜不同，它仍然保留着宋代铜镜的六分法的形制。元代铜镜镜缘多为素宽缘，里厚外薄，里直外坡。镜钮多为半圆形钮，与宋金时期的铜镜钮相比要大。钮座主要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另外，无钮座铜镜在此时仍然占很大的比例。元代铜镜的纹饰有浅浮雕和浮雕两种。元代前期铜镜没有铭文，后期铭文内容也比较简单，纪年铭文多绕组配置。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6）

四、宋辽金元时期的钱币

宋初的“宋元通宝”是仿造的开元钱，此后凡是如此大小的都为小平钱，另有折二、折三、折五等钱，但是铸造量最多的仍然是小平钱。宋钱上的书体多变，有真、草、隶、篆、行等字体，是我国货币书法艺术的巅峰。而且，北宋钱币的一大特色就是“对钱”的盛行。除了使用金属货币外，北宋中期还创造发行了一种称之为“交子”的纸币，这是世界的首创。南宋继承了北宋的货币制度，铜、铁钱仍然是主要的流通货币。流通中的铜钱，以折二、折三钱为多。北宋的“对钱”沿用到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才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以一种以纪年和纪地钱文的形式。南宋末年出现一种叫“会子”的钱币，面额有一贯、200文、300文、500文，钱文的书体逐渐趋于单一化。

辽建国后，大多仍然使用唐、宋以来的旧钱。现今，辽前期的钱币发现极少，是为泉界（通俗地指收藏古代钱币的行业）珍品，主要是汉文钱，契丹文钱较为罕见。

金初期，使用辽、宋的旧钱，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设立交钞库，发行了纸币，称之为“交钞”。金正式铸钱是在海陵王正隆年间，金钱上的文字都使用汉文，可与宋钱相媲美。

元代主要流通纸币，中统元年(1260年)，政府印制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从此纸币的发行权完全归于政府。直到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才大量铸造铜钱。钱文分别为汉文和八思巴文两种，形制有小平、折二、折三、折十四等。到了元末，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农民起义政权。这些政权有国号、纪年，也铸造货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流通。徐寿辉铸有“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张士诚铸有“天佑通宝”，韩林儿铸有“龙凤通宝”，陈友谅铸有“大义通宝”，朱元璋铸有“大中通宝”等。

五、宋辽金元时期的金铜佛

宋代造像以写实著称，基本上是依据世俗的审美情趣和要求来塑造佛像，当时最流行的题材是观音、罗汉等。这一时期的菩萨像如同现实中的贵妇人，头戴花冠或发髻冠，中嵌宝珠，并饰有繁复的蔓草纹；身披网状瓔珞珠饰，衣褶宽大流畅，呈现出一派富贵气象。佛像的衣着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内着“V”领的僧衣、外斜披袈裟的新样式，这实际上是将宋代僧人的衣着借鉴到佛像上。

辽代的佛像是在沿袭中原文化艺术传统的前提下，又融合本民族的特色来进行创造性的发挥。佛像的面庞丰满圆润，发髻呈缓丘状，身着袒胸衲衣，下着长裙；菩萨像大多头戴花蔓冠，冠箍的形制较为特别，束发披肩，装饰比宋代的简洁。坐像的上身挺拔，双膝紧收，立像则双腿显得板直。台座均为束腰式，常见的为上部仰莲宽肥舒展，下承圆形或六角、八角形的底座，表现出一种平衡的美，有别于宋代的佛像及菩萨像。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7）

元代宫廷内专门设立了梵像提举司来专门负责塑造藏式佛像，其他制作铜佛的有关部门还有出蜡局提举司。尼泊尔、西藏的造型技艺传播到内地，影响了元代整个艺坛。元代藏系佛像虽然承袭了尼泊尔风格，但是其面门已趋于藏化，同时融入了汉地的审美因素和表现技法。菩萨像上身均袒，下着裙，璎珞颗粒较大。佛像面庞圆满、肩胸宽厚、肢体突显、衣纹简洁。

第四节明清时期青铜器的发展

明清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包括传统的泥范法，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失蜡铸造法，后者可以铸造出几十吨重的大钟。这一时期的铜器无论是货币还是生活器皿，黄铜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纵观明清青铜器铸造业，青铜制品的种类主要是货币、铜镜及铜造像等。此外，白铜的生产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明清时期青铜器概况

明代的青铜制品种类较多，有鼎、、锅、盆、盆架、壶、炉、钟、砝码、墨盒、镊、钩、腰牌及宗教造像等。还常常表现出鎏金、镶嵌等金属细工的特点。明代青铜制品中重要明代·鼎的一类是宣德年间宫廷铸造的宣德炉。这种炉在当时很受世人的重视，一直影响到清代以至民国，仿制品很多。存世宣德炉虽然不少，但被确认为真品的实属罕见。

闻名于世的北京大钟寺明成祖永乐年间铸造的永乐大钟，通高675米，重约465吨，在中国和世界都实属罕见。此钟音质极佳，据《长安客话》云：“昼夜撞击，声闻数十里，时远时近，有异它钟。”在钟体上还满铸楷书的佛教经文，约227万余字，字体个个端正严谨。大钟是研究明代铸造业的重要实物资料。

总的来看，明代的青铜器种类还是比较多的，除了生产罕见的大型作品外，也生产小件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墨盒、镊子、钩、手炉、盆与盆架等。在制作工艺方面有洒金、嵌金、银丝、錾金等多种技法，这时还出现了一批制作金属器的名匠，如胡文明，张鸣歧等。

清代青铜器中铜熏炉之类的实用器较多，样式也丰富多彩，制作精美，器外表常鎏金，还有的镶嵌宝石和水晶。

二、明清时期的铜镜

明代仿古铜镜的铜质比宋、金好，质细，表面多呈灰白色，但没有汉唐铜镜的那种光泽。仿制的唐镜多有铭文，内区大于外区；而仿制宋代铜镜正好相反。明代仿制的唐镜镜钮比宋仿要大；钮顶大多被磨平，因为铸造时铜汁从此孔道流入，冷却后需要打磨才能平整。明代仿汉唐铜镜，有的在装饰上明显具有本时代的特征。如明仿昭明镜的形制，去掉纹饰变为素镜，再于钮至边缘的区间铸上铭文；仿唐重轮镜往往把中间的弦纹移到镜子的边缘，便于内区铸上醒目的铭文；仿唐素圆镜上也多添铸铭文。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8）

清代的仿制铜镜比明代还要精细，而且数量也增多，并首次出现宫廷仿制的铜镜。乾隆年间，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照本仿制了一批汉唐铜镜，主要有仿汉“鸟兽规矩纹镜”、“八乳禽兽纹镜”、仿隋“十二辰镜”、仿唐“瑞兽鸾鸟镜”、“四神规矩纹镜”、“双鸾纹镜”、“盘龙纹镜”。清宫仿制的铜镜，铜的质地为铅灰色，镜的正面仍然可以光亮鉴人。民间仿制的铜镜，铜的质地为白中闪黄。清仿铜镜，特别是宫廷仿制的铜镜，大多照本模仿古镜，大体上与原器的整体造型一致，但是棱角处分明，厚重压手。清仿铜镜只重形似，在装饰上，常常添枝加叶或随意变化。如仿汉铜镜，不仅镜体加厚了许多，而且镜钮铸成很小的鼻钮，图案纹饰变形、走样，实际上已经渐入于不伦不类。

三、明清时期的钱币

明朝初期沿袭元代纸币制度，从洪武年间就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成为定制。明朝后期纸币贬值，铜钱铸造开始增多。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铸“永昌通宝”钱，分为小平、折五两种，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时，铸“大顺通宝”等钱。明朝灭亡以后，明代藩王纷纷自立抗清，设官署，建年号，又各自铸有许多钱币，以永历钱铸量最大，传世的较多。

清代的币制以银为本，钱为末，但是民间使用的主要还是铜钱。清军入关以前就已经开始铸造钱币了，如努尔哈赤铸“天命汗钱”、皇太极铸“天聪汗钱”。入关之后，从顺治开始历代相沿袭，各朝部铸造以年号为名的制钱，正面文字是年号加“通宝”或“元宝”，背面的文字则为满文或满汉合璧，分纪局、纪地、纪值，或星、月、圆点等。清朝政府除了在中央上、户两部设置了局铸钱外，各省也允许设局铸钱。白银作为金额支付行使货币职能。咸丰年间铸有当五、当十至当五百、当千的多种钱币。清末，币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机器压制的铜币取代了方孔钱，银元和新式钞票开始进入流通领域。咸丰元年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起义，国号“太平天国”，建国初期曾铸行“通宝”钱。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南京(后改天京)后，铸造太平天国钱币，版式繁多，背文为“圣宝”等字。

第八章 秦汉以后青铜器的发展（9）

四、明清时期的金铜佛像

明代宫廷造像，尤其是永乐、宣德时期的宫廷造像，直接以西藏作品为模范，大多用红铜失蜡法浇铸而成，风格传承、脉络清晰，融入汉地的审美观念和传统的表现手法，只是细节方面更加铺张，浮雕珠宝密实镶边，曾经强调的凶忿形象已经淡化了。就形象塑造方面来说，明朝注重神情的刻画，面部表现为男方女圆，略带有汉族人物的造型特征。菩萨佛母像多呈三折枝态，身上装具制作精巧。莲座通常是圆形或方形两种造型，仰覆莲瓣上短下长，束腰内收成锐角状，主瓣之间露出底层莲瓣一角，微微向上翘起。莲座的上下层各镶有一圈精致的连珠，富丽堂皇。这些造像多为中央政府赐赠藏传佛教各派高僧的礼品，一般都镌有“大明永乐年施”、“大明宣德年施”的楷书阴文，对西藏金铜造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代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年间，汉地造像又独盛一时，造型大多头大身长、体态丰臃，传世品较多。明代的汉传佛教造像尤其是中早期的造像，比例较为适中，身躯饱满且结实，线条简洁流畅，丰腴而不虚，近人而不俗。像身胸、腹的起伏与平常简单的外衣形成对比，富有整体感。

清代宫廷造像始于康熙年间，至乾隆时达到了高峰，不仅临摹塑造了克什米尔、东印度帕拉、尼泊尔等风格多样的佛像，还雕铸了大量宫廷匠师设计的作品。这些造像大多在皇帝及章嘉、土观呼图克图的直接参与下完成，台座上通常有“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刻款、“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以及佛名、部属等楷书阴文。清代的佛教造像的主要特征是：铜质精炼，造型端庄，面相宽平，颊丰颐满，弯眉细长，鼻高且直，宽肩细腰，衣褶线条如行云流水，富有汉族的审美品味。另外，根据清宫的档案记载：有的佛像并非宫廷所造，只是对进贡的佛像重新修整或刮去款识再加刻官款。菩萨像大多为汉式装束，服饰贴

体而轻柔，衣纹和衣饰的刻画运用写实的手法，真实感较强，但是在表现手法上却显得纤巧无力，缺乏艺术感染力。

第九章 华夏族以外地区的青铜器（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北方草原、东北、西北、川藏云贵、东海沿海和台湾地区，都出土了许多青铜工具、兵器、饰物和部分青铜容器。它们表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氏族的文化面貌，既有各自的独特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其与华夏青铜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第一节

冀、辽、吉及内蒙古

东部地区的青铜器

这些地区中出土的青铜器以青铜短剑和各种动物纹饰牌为特色，包括兵器、工具、农具、生活用具、车马器和装饰品六类，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从年代上来看，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到春秋早期。出土的地点主要有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的宁城南山根、赤峰红山后，河北省的平泉东南沟，辽宁省的朝阳十二台营子等。

兵器中以短剑居多，其他则为刀、矛、戈、剑鞘、镦、镞、盔、盾等。工具主要是斧和凿。农具有镐和锄。车马器有衔、銮、泡、环、络饰等。装饰品有方扣、圆扣、耳坠、联珠形饰、铃形饰、人面铜牌、兽面铜牌，以及各种动物纹饰牌。生活用具有匕、匙、镜、针筒等。

青铜容器主要出土于宁城南山根101号墓，有鼎、簋、簠、鬲、双系壶、豆、觚、双联罐、勺等器形。其中的长锥足鼎独具特色，敛口浅腹，口部有环形耳，圜底下有三个很长的实锥足。鬲为敛口短颈，口沿上有两个鼠形小耳，裆部较平，下有尖锥足。双系壶为小口短颈，鼓腹圈足，肩上有小环耳。豆的盘中接连一浅腹罐，双联在罐，顶上各有一个马形钮。勺的柄呈“丫”字形。

这些青铜器主要表现了这些地区自身的特点，同时不乏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如南山根出土的柱足鼎、蹄足鼎、双耳簋、篮及其花

纹，镜、柳叶形矛，夏家店12号墓出土的二穿戈，平泉东南沟出土的等腰三角形锋的戈，都是在中原地区常见的式样。

南山根出土的双系壶、觚、勺、斧、凹腰柳叶式矛、凹腰柳叶式剑，弧背凹刃刀、盔以及车马器等，都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而铸造的变体器物；长锥足鼎、鬲、双系壶的形制，也见于赤峰红山后的陶器中。双联罐、豆、盾、各式剑及其花纹、剑鞘、三刃镞、镐、锄、大部分车马器和各种饰牌，都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

第二节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

出土的青铜器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地区和宁夏、陕北、晋北等地，也发掘出了青铜器群，它们皆以各种各样的动物纹样饰牌和圆雕动物装饰品为特征。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大多数人认为这属于匈奴族文化系统。

第九章 华夏族以外地区的青铜器（2）

匈奴族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主要包括兵器、工具、车马器具和装饰品四类，还未发现农具和礼器。其中，青铜短剑、鹤咀镐、小铜锤，各种各样的动物纹样和圆雕动物装饰品以及马具最多，也最精。

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匈奴族文化系统的青铜器，出土的工具和兵器主要是鹤咀镐、小锤、刀和短剑。鹤咀镐又称为鹤咀斧，一端是扁刃，另一端呈鹤咀形，中部厚实，有椭圆形銎，以便安柲；圆銎斧，呈狭的长条形，弧刃，銎一端有一短柱状突起；刀为弧背凹刃，柄扁平，后端有孔；短剑颇富特征，直刃有背，剑格突起，扁茎，首一般呈两兽头或鸟头相对形，也有作双环形的。另外还有锛、锥、凿、斧、戈、镞等。戈、斧、镞多为中原式。马具有马衔、马镳、络饰、鞍饰、扁环等。装饰品种类繁多，尤其以带扣、环饰、联珠形饰、鸟兽头形饰，以及动物纹饰牌最为典型。

出土的战国后期匈奴族文化系统的铜器鹤咀镐、弧背曲刃刀仍然具有早期风格。短剑略有变化，剑首的双兽或双鸟头相向形，变成了双兽或双鸟头连成双环或单环形。装饰品中的饰牌较前期发达，有几何纹饰牌、鸟纹饰牌、马纹饰牌、涡纹扣形饰牌，种类繁多、式样各异。其中最为讲究的是动物纹长方形饰牌，有浮雕、有透雕。动物纹的种类有马、鹿、虎、盘羊、狼、驴、鹰等，以鹿为最多。它与同期的金银动物纹饰牌的风格完全一样，富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属精品的有呼和浩特附近出土的盘羊饰牌、屈足鹿饰牌，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双虎夺鹿纹饰牌、鹰袭鹿纹饰牌，以及固原杨郎出土的虎背驴纹饰牌等。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艺术品还有圆雕动物饰件。这些饰件大都是套接在杖首、辕头或装饰车軎，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圆銎前端作成圆雕动物头像，有羊头、鹰头、鸭头、狼头等；另一种是在方銎座上作成圆雕完整动物形象。如玉隆太的盘角羊辕饰、羚羊饰件、鹿形饰件、立兽饰件、立马饰件，西沟畔的鹤头饰、速机沟的羊

头饰件、狻猊饰件、狼头饰件、屈足鹿饰件、神木纳林高兔的刺猬饰件、中沟的立犬饰件等。此外，还有单独的圆雕动物造型，如玉隆太的五件雌雄卧鹿、速机沟的四件雌雄立鹿、瓦尔吐沟的卧状绵羊、神木李家畔的四件伏兔等。

第三节成、渝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成、渝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区域。商周青铜器的主要出土地点有彭县、新繁、成都、郫县、峨眉、峨边、广元、绵竹、广汉、双流、芦山、犍为、重庆、巴县、涪陵、奉节等县市。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的两座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多达900余件，其中立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形面具、兽面具、瑗戈、神树、神坛等都具有地方文化特征。另外，还出土了中原文化较为常见的尊、罍、瓿以及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常见的尊。

第九章 华夏族以外地区的青铜器（3）

巴蜀文化中，一部分青铜器的器形保留了西周早期或更早一些的青铜器的特征，其中有一类是依照原形仿铸的，还有一类是仿造且经过变形的；部分器形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上述两类器物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形式，可能与巴人参与武王伐商获得殷周型兵器并将其长期流传有关，是小邦国为增大其荣誉而对周文化仰慕的一种表现。

巴蜀式兵器中戈、剑形状之类的青铜器，带有强烈的追慕西周早、中期或更早时期兵器的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巴族文化青铜器，尤其是其兵器上常有的笋形、心形、鸟形、虎形等各种铭记，这些铭记的属性还不太清楚，有的说它是一种符号，有的说它是文字。但是巴蜀很可能有自己的文字，有一件郫县出土的巴蜀式戈上有一行铭文约12个字，与上述兵器上的铭记不一样，但没有一个可以翻译出来。

巴蜀出土的青铜容器有鋬、釜、甑等炊器，这些器的耳是用绳索成范后翻铸在器上的。鋬似圜底束颈敞口壶，肩上有一耳或两环耳。釜如敛口的大圆钵，也有两环耳。

巴蜀的乐器有两类：一类是外地传入的，主要是从楚地，如涪陵小田溪出土的一套错金编钟，铸作极精，纹饰特征为楚国器；另一种是形体很扁的甬钟，枚的地位缩得很高，甬上没有旋和干，衡空中设一横梁可悬。这类钟属于巴蜀文化的产物，是变了形的西周甬钟的仿制品。

第四节滇、黔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地处我国西南高原地带的云南、贵州，早在东周至秦汉时期就是西南夷各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商晚期·钺出土了数量极多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独特艺术风格的青铜器。

云南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主要分布范围在滇池和洱海两个区域。滇池地区青铜器

的出土地点有昆明、呈贡、晋宁、澄江、江川、新平、陆良、曲靖、富民、安宁、禄丰、路南12个县市的39个地点。洱海地区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有剑川、祥云、大理、德钦、楚雄、元谋、姚安、永胜、宁蒗、巍山、昌宁等县市。这两个区域的青铜器在器形和纹饰上都存在一定差别。以滇池为中心地区的青铜器，一般种类较为复杂、铸造精致；而洱海地区的青铜器则制作粗糙简朴，种类也较为单纯，且大多数器物上没有纹饰。

云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十分繁杂，按用途可分为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乐器。兵器有剑、矛、戈、斧、钺、戚、啄、叉、矢镞、箭箙、弩机、盔甲等。生产工具有锄、、镰、锯、凿、削、鱼钩、针、锥和纺织工具。生活用具有壶、洗、釜、甑、樽、斗、耳杯、案、盆、贮贝器、伞盖、枕、镜、带钩、印章、干栏式房屋模型、动物透雕饰牌等。乐器有鼓、编钟、芦笙等。

在生活用器中，如盒、枕、贮贝器以及干栏式房屋模型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也是其他各地青铜器中所见不到的。

贵州毗邻云南之处，根据史书记载，在西汉时曾是西南夷夜郎国的地域。青铜器主要出土地点是黔西北的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另外在贵阳、盘县、兴义、普安、清远等地，也发现有少量的青铜器。

第九章 华夏族以外地区的青铜器（4）

就这一地区目前所发现的青铜器的断代来说，上限为战国时期，下限为汉代。在这一时期，青铜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器和装饰品等各个方面。出土青铜器的造型、花纹风格，很明显地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如镜、鼎、弩机、錾、镞、铜钱、印章等，完全是由中原汉文化地区输入的产品；第二类是与云南滇文化中出土的青铜器造型、花纹风格相同或一致，如贵阳、盘县、兴义、赫章出土的锄，威宁、清镇、普安出土的剑，清镇出土的钺，以及戈、矛、釜和鼓改装的釜、镂花铜饰牌等；第三类如威宁出土的戈、剑、矛等，都与四川地区出土的巴蜀文化的同类器物的风格一致。第二、三类器形都具有地方色彩，属于滇文化系统，并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

第五节湘、桂、粤地区

出土的青铜器

湖南、广西、广东三省是中国古代百濮、百越族的聚居之地，这一地区发现和出土了一大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湖南的资兴、衡阳、长沙、宁乡、益阳、常德、石门等地，陆续出土了很多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多达四五百件。其中以宁乡一带出土最多。这些青铜器均为窖藏出土，造型奇特、纹饰精美、铸造技术精湛。西周中晚期以后，湖南地区地方土著青铜文化的特征较为明显，如西周的双索耳圈足簋形器、资兴出土的侈口圜底垂腹高足变形夔纹鼎和直腹雷纹鼎，都是春秋时代仿铸西周早期的越式鼎之器。稍晚出现了立耳盘口鼎，也是越式鼎的一种。此外，还有战国时期的剑、镞、刀等。

广西出土青铜器的地点分布很广，包括桂北、桂中、桂东、桂南、桂西南等地区，其地域占广西大半境，器形有卣、钟、罍、尊、鼓、鼎、剑、戈、矛、匕首、镞、钺、斧、弩机、匜、筩、镜、羊角

钮钟、人首柱形器等。从上述青铜器的造型、铭文、纹饰特征来分析，广西青铜器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器形、纹饰、铭文与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风格一致或相近，如武鸣全苏、灌阳钟山、忻城大塘、横县镇尤、恭城会加等地出土的商周时期的卣、甬钟、鼎、罍、编钟、剑、戈、矛、匕首、镞、斧、削，贵县、合浦出土的汉代鼎、镜、灯、印章、弩机等，恭城的蛇噬蛙纹尊和菱形几何纹尊，都是春秋晚期时仿铸西周形式之器，而纹样全是土著风格。越式盘口鼎在贵州也有发现。第二个类型是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器物，如贺县、象州、德保、恭城、平乐出土的各式铜钺，贵县出土的很有特色的羊角钮钟，以及提梁筩（一种桶形容器）。同时，广西出土的各式铜鼓也是非常可观的。

广东出土青铜器的地点有信宜、饶平、清远、德庆、肇庆、四会、广宁、怀集、佛岗、龙川、罗定、惠来、博罗、连平、海丰、惠阳、龙门、揭阳、佛山、广州，以及香港地区，其中主要出土地为西江地区，少部分在北江、东江、韩江及其支流两岸。在出土的青铜器中，包括炊器、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器形有鼎、罍、鉴、盉、壶、盘、缶、编钟、钲、于、甬钟、剑、戈、矛、钺、镞、斧、凿、刮刀、匕首、锥、削、人首柱形器等。在上述地点发现的青铜器中，信宜县松香厂出土的盉时代最早，约为西周时期。但是早期青铜器的数量很少。春秋战国时期是广东地区青铜器的发达时期，出土的数量比较多。

第九章 华夏族以外地区的青铜器（5）

第六节苏、皖、浙、赣地区

出土的青铜器

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和太湖、钱塘江、鄱阳湖流域，系吴越文化的分布地区之一。

在江西的清江流域，发现了一批相当于商朝早期和中期之际的青铜器，有兽面纹斝、虎耳扁足鼎、兽面纹卣工具和兵器等，并发现了铸造工具和不知名容器的石范。如：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了475件青铜器，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这些器物既有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也有商器经后人加工或改造过的，这种器的形制、纹饰既具有本地域特色，也带有南方土著民族独特的创造性，如瓿形鼎、折肩鬲、假腹盘、三足卣、双面神人像、伏鸟双尾虎。其中兵器的形式与陕、晋等地相同。

商代·鼎

吴越青铜文化的分布地区，主要在长江以南。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乐器等青铜器出土的数量也不少。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代的宜侯矢簋，便是一著名的青铜器。丹徒大港母子墩的一批青铜器中铭为“伯作宝尊彝”的方座簋，更是西周中期偏早之器。此外，还有武进淹城内城河出土的三轮盘、斝及七件钩、大港磨盘墩等。在安徽屯溪的墓葬中，出土了铸铭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尊。这些吴越文化特色浓厚的青铜器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模仿西周器，但是形制或多或少变了形的，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当时的新设计式样，是少数。这第一类的有鼎、簋、尊、卣、双耳扁壶、盘、匜等，器形模仿一般很少能严格地保持西周的式样，如：鼎为浅腹斜支足；簋为多敛口有肩浅腹双耳式，且双耳有的成为两道镂雕的棱脊；筒形尊腹部鼓出而圆或扁圆；大口垂腹尊器体极阔；卣的肩部特别丰满而使整个造型显得偏高而且臃肿；盘多直口紧附耳和直圈足等，都

是不甚精确或很不精确的模仿件。另外，这些器物除个别以外，器壁都比较薄或很薄，这和中原地区西周器乃至春秋早期器是全然不同的。此类仿铸的器，其纹饰没有什么规定的格式，如屯溪卣的纹饰为不太相似的仿西周凤纹卣的式样，鼎类亦是如此，其余大多数的器上纹饰，都是吴越文化分布地区所特有的式样。这些纹饰以屯溪和丹阳出土的器最为集中，其主要者有以下一些形式：一、传统窃曲纹的变形，同地所出的鼎即有这类纹饰的前型，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通行式样；二、窃曲纹的复杂变形和交连；三、双勾式的窃曲纹的变形和交连；四、交连和不交连的变形兽纹；五、棘刺纹，密集的方格状的简单线条中有棘刺状突出；六、动物变形的几何纹等。设计式样新颖的青铜器有盂形器、方缶等，纹饰与以上大致相同。